



报告发起方介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CCIRM）成立于2008年4月29日。中心得到了国际著名保险机构苏黎世保险集团的大力支持。

中心使命：建成国际一流的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基地，特别是在保险市场发展和监管研究方面，成为亚洲一流的研究中心。

中心主要目标：不断提高清华经管学院在保险与风险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中国与世界在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政府与保险业界有良好声誉并值得信赖的咨询与合作中心。

中心主要工作：定期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活动，不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来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承接国家和部委及保险业的研究课题；与相关的政府部门，保险业界和学术机构开展理论实证研究。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全球人寿）由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Aegon）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THTF）各出资50%组建而成，公司于2003年正式获得营业执照，在中国开展寿险业务。截止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24亿元，资产规模超过170亿元，为全国逾百万客户提供周全的保险保障。迄今，公司已在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天津、青岛、河北、湖北、福建、四川、深圳等省市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同方全球人寿凭借股东百年寿险经验和领先科技能力，致力于帮助客户未雨绸缪，实现财务保障，安享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值得推荐的人寿保险公司。





1 · 摘要

1.1 退休愿景与预期：延续乐观预期，信心稳中有进	02
1.2 退休准备：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继续上升	03
1.3 退休规划：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仍需完善	03
1.4 专题研究结论	04

2 ·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06
2.1.1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06
2.1.2 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攀升	07
2.1.3 现行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存在不足与失衡	08
2.2 项目概况	09
2.2.1 项目的提出	09
2.2.2 调查对象、内容及目标	10
2.2.3 问卷设计	11
2.2.4 调研过程	11

3 ·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

3.1 退休生活愿景	20
3.1.1 总体情况	20
3.1.2 客观因素对退休生活愿景的影响	21
3.1.3 主观因素对退休生活愿景的影响	23
3.2 退休年龄预期	26
3.2.1 总体情况	26
3.2.2 财务状况与退休预期：高收入人群延迟退休意愿更加强烈	27
3.2.3 工作认同与退休预期：更强的工作认同会激励居民延迟退休	27
3.2.4 家庭责任与退休预期：照看责任激励提前退休，而婚姻关系鼓励延迟退休	29
3.3 退休过渡方式	30
3.3.1 未退休者对退休过渡方式的设想	30
3.3.2 已退休者对退休过渡方式的回顾	31
3.3.3 中国居民提前或延迟退休的原因	32
3.4 退休生活信心	34
3.4.1 总体情况：整体信心程度强，已退休者信心稍逊	34
3.4.2 年龄与信心程度：退休信心随年龄递增，但在 70 岁后发生骤降	35
3.4.3 工作与信心程度：高级别、高收入工作者退休信心水平更高	36
3.4.4 对后代的退休生活信心：对后代退休信心相对保守	38
3.5 退休生活压力	39
3.5.1 退休压力来源：压力来源多样化，身体健康状况是首要担忧	39
3.5.2 退休财务压力：退休后财务压力普遍存在，但强度较低	39
3.6 退休与健康	40
3.6.1 退休后健康困扰：普遍对退休后身体健康状况表示担忧	40
3.6.2 退休后健康习惯养成：缺乏专业指导，工作压力为主要阻力	41
3.6.3 对雇主健康支持的期待：期待健康配套设施和锻炼机会	42

4 ·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

4.1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44
4.1.1 2021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继续上升	44
4.1.2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全球排名上升	48
4.1.3 国内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的比较	50

4.2 高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50
4.2.1 个人特征：性别差异基本消除，准备指数随年龄增长	51
4.2.2 家庭特征：已婚的稳定家庭指数更高	51
4.2.3 地域特征：西部欠发达地区指数更高	52
4.2.4 工作特征：高层级工作、收入满足基本生活的居民指数更高	53
4.2.5 教育特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指数更高	55
4.2.6 健康特征：高指数居民的健康习惯良好，医疗储蓄重视度高	56

5 · 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

5.1 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	58
5.1.1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	58
5.1.2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	59
5.1.3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60
5.1.4 我国三支柱体系发展现状	61
5.2 政府责任	62
5.3 企业责任	63
5.4 个人责任	67
5.4.1 退休收入预期	67
5.4.2 退休收入来源	69

6 · 专题研究

6.1 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	74
6.1.1 中国居民金融素养客观上存在不足	74
6.1.2 金融素养自我认知不足，存在过度自信现象	79
6.1.3 金融素养对退休准备的影响	82
6.2 中国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	84
6.2.1 退休健康责任	84
6.2.2 个人财务责任	86
6.3 中国居民对延迟退休的态度	91
6.4 对青年群体的特别分析	91
6.4.1 青年群体的退休生活预期	96
6.4.2 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和退休准备情况	96
6.4.3 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青年群体产生的影响	98
6.4.4 针对青年群体的建议	99
6.5 新冠疫情对中国居民退休准备带来的影响	100
6.5.1 新冠疫情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101
6.5.2 新冠疫情对退休生活预期的影响	104
6.5.3 新冠疫情对退休储蓄的影响	105
6.5.4 后疫情时代对退休准备的相关建议	106

7 · 建议

7.1 政府可发挥的作用	108
7.2 企业应做出的改善	108
7.3 个人应做出的努力	108
7.4 保险可作为的领域	109

8 · 附录

8.1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方法	111
------------------	-----



01. 摘要

1.1 退休愿景与预期：延续乐观预期，信心稳中有进

2021 年中国居民对于退休生活的愿景延续了 2020 年较为乐观的基调，对退休生活的信心程度进一步提高。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经济开始复苏，居民对于退休后拥有舒适的生活具有更强的自信。具体而言：

- 居民对退休生活具有丰富的联想，普遍期待退休生活拥有丰富多彩的活动；由于存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的退休愿景存在差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 居民预期退休年龄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普遍希望正常退休，延迟退休和提前退休的受访者比例较为均衡；财务状况、工作认同及家庭责任为影响居民退休意愿的主要因素。
- 居民普遍期待过渡性地离开工作岗位，但实际仍以退休后立即停止工作为主；财务、健康和工作是决定居民提前或延迟退休的主要因素。
- 居民对于自身退休后拥有舒适生活具有较强信心，但对后代未来退休生活预期相对保守；更好的物质条件可以提升居民退休信心。
- 居民退休生活的压力来源多样化，身体健康状况为主要担忧；财务压力普遍存在，但强度较低。
- 居民对身体健康状况有着较强的忧患意识，但缺乏养成健康习惯的专业引导，普遍期待雇主提供引导性的健康支持。



扫码查看电子版报告



扫码查看报告重点内容摘要

摘要



1.2 退休准备：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继续上升

2021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上升至 6.78，在“退休准备充分度”以及“退休计划完善度”方面较去年有大幅提升，而在“取得预期收入的信心”方面有下滑趋势，其他方面有小幅提升。根据调查结果，得出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的整体画像：**已婚且家庭稳定、所处地区欠发达、高层岗位就业、生活收入充裕稳定、受教育水平高、生活习惯健康。**

具体而言：

- 女性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略低于男性，但差异很小。
- 全国各地退休准备指数之间的差异变化较大，整体上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 工作特征方面，高层岗位就业的居民有较高的退休准备指数。工作收入方面，居民退休准备指数随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增长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退休准备指数增长不再明显。

1.3 退休规划：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仍需完善

我国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仍存在较大不足与失衡。调查显示，中国居民预期退休收入较多得来源于一、三支柱，一方面说明社会基本养老已经深入人心，但也说明第二支柱亟待发展。养老保障三支柱的平衡发展离不开居民观念的进一步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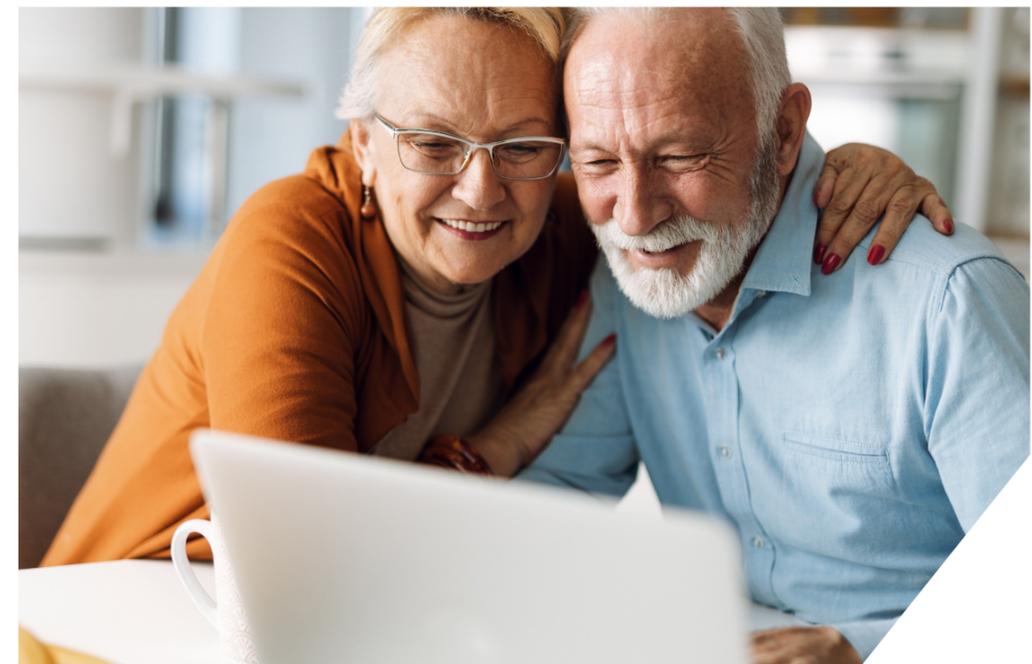
具体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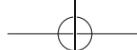
- 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比例逐年增加，延迟退休已经逐渐得到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认同，现在是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恰当时机。
- 2021 年企业提供的退休帮助在各个方面有所提升，尤其在“雇主提供退休医疗保健服务”和“可以选择从全职转为兼职工作”提升较为明显。然而，企业仍有必要在为员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财务建议和更灵活的方案等退休帮助方面进一步努力。
- 完善金融市场、稳定居民信心、普及金融知识，将对居民退休准备产生积极影响，而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则会抑制居民进行退休储蓄，因此加快复工复产、做好疫情防控十分必要。

1.4 专题研究结论

专题研究分别从“居民金融素养”、“退休责任意识”、“对延迟退休的态度”、“对青年群体的分析”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五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

- 中国居民金融素养普遍有待提升，且自我认知不足，普遍存在对自身金融素养过度自信的现象；较高的金融素养有助于提升个人退休准备，而对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则会抑制个人实际的退休准备。
- 居民在退休收入方面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但在个人健康方面的责任意识仍需提高，在养成健康习惯的同时应当增强对重大疾病和失能风险的防范意识与应对能力。
- 居民普遍对延迟退休政策表示支持，但不一定真正具有延迟退休的意愿，不同特征居民对于延迟退休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此，单一的退休制度难以符合所有人的意愿，延迟退休的年龄标准需要有一定的弹性。
- 青年群体距离退休还有较长的时间，面对经济压力和社会老龄化压力，对退休生活的信心有所不足，应当进一步提升金融素养和退休责任意识，为退休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 居民对新冠疫情的感受以负面为主，但并未因此降低对退休生活的信心。在疫情的压力下，中国居民更多地减少日常开支，动用储蓄账户度过危机；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对退休储蓄在未来恢复具有更强的信心。





0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2.1.1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也给居民的养老准备带来了巨大挑战。我国自 1999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就成为了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中国社会在养老保障方面呈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显著特征：人口老龄化态势高速化、高龄化；退休人口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化水平低、自我养老和社会化养老意识低。与持续增长的经济总量相比，我国在老龄人口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居民如何做好退休准备，政府和企业如何帮助缓解养老压力，成为近年来持续关注的话题。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¹

如图 2.1 所示，近年来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不断攀升。按照国际公认标准，一个国家 65 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 7%，或者 60 岁及其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10%，即为老年型人口国家。中国目前的老龄化占比达到 13.5%，已经属于老年型人口国家，预计在 2021 年老龄化占比将超过 14%，成为深度老龄化社会，在 2033 年左右成为占比超过 20% 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中国大陆总人口为 141178 万人，其中 0-14 岁人口为 25338 万人，占 17.95%；15-59 岁人口为 89438 万人，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上升 1.35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6.79 个百分点，60

此外，人口老龄化在全国各省份、地区均十分严重。2020 年，在大陆 31 个省份中，除西藏外，其他 30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 7%，其中 12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达到了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由此来看，人口老龄化是目前全中国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正从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转向人口负担期，未来在养老、医疗、社保支出等诸多方面都将面临极大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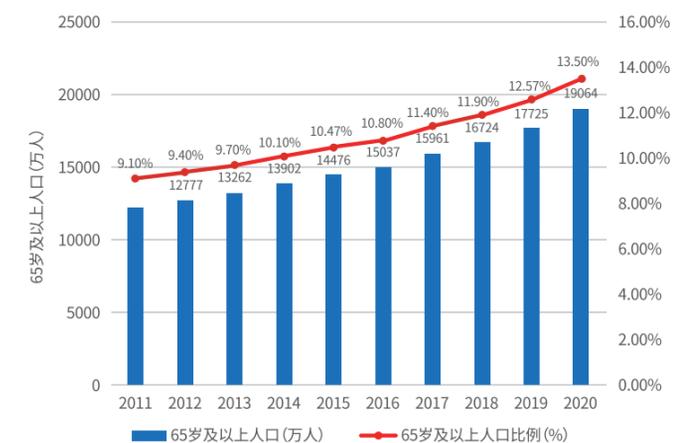


图 2.1 2011-202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比重²

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

²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2 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攀升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的同时，我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 年新生儿数量仅为 1203 万人，较 2019 年 1465 万人有所下降，降幅达到 18%，在不少城市降幅甚至达到 20-30%。总体来看，2020 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 8.52‰，人口自然增长率仅有 1.45‰。生活压力、子女养育成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目前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低迷。

为了缓解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在 2013 年决定松动已经长达 35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出“单独二孩”政策，但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从 2013 年到 2015 年的出生人口分别为 1640、1678 和 1655 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2015 年，为了进一步刺激生育，中央决定推出“全面二孩”政策，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6 年的出生人口上升至 1883 万；“二孩”生育率也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 2013 年的 30% 左右提升至 2017 年的 50% 左右。但随着近五年来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年轻一代晚婚晚育现象严重，二孩政策的刺激效果并没有维持更长的时间，出生人口从 2017 年开始下降至 1765 万，并在随后几年内逐年断崖式下降，2018 至 2020 年的出生人口分别为 1523、1465 和 1203 万，如图 2.2 所示。由此可见，开放生育的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对缓解生育率下降的效果仍十分有限，尤其是难以提高年轻一代中的一胎生育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生育观念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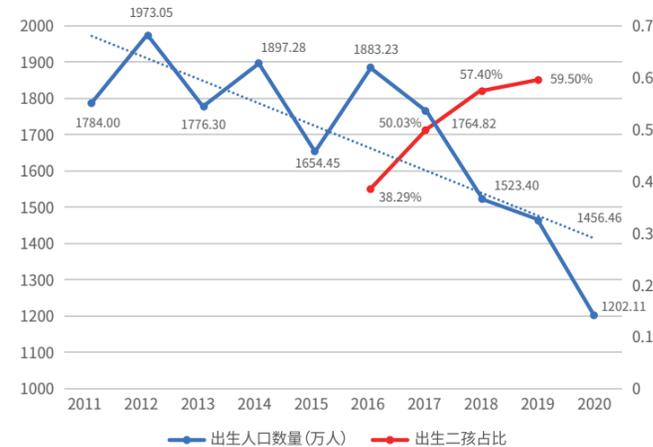


图 2.2 2011-2020 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及 2016-2019 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

为了进一步激励生育，表明国家希望改善人口问题的决心，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今年 7 月 20 日，中央正式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就“三孩政策”及配套的支持措施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将入学入户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加强住房支持等。由于三孩生育本身必须建立在二孩生育的基础之上，而二孩政策有限的实施效果决定了符合三孩生育条件的家庭基数本身相对较少，因此，相对于补贴生育三孩的家庭，该政策更重要的是推动全社会子女抚养的

成本下降，转变年轻人的生育观念，鼓励他们从无子女家庭转变为一孩家庭。三孩政策是否能有效缓解人口出生率下降，将主要取决于其是否能真正地落实生育补贴政策，降低年轻人生育的成本，保障妇女生育和就业的权利。

另一方面，即使开放的生育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出生率下降，但由于人口增长存在一定的惯性，人口结构的改善需要时间，在未来 15-20 年的时间内，人口老龄化现象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在过去二十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我国的老年抚养比在不断上升。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数（65 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数（15-64 岁）的比例，表示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抚养比越高，人口老龄化社会面临的经济压力越严重。如图 2.3 所示，我国老年抚养比在过去十年逐年增长，在 2020 年已经接近 20%，表明每名老年人需要约 5 名劳动人口来进行抚养。倘若在未来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继续下滑，可以预测中国的老年抚养比还将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将面临更加持久、更加严重的老龄化挑战；若在未来几年内生育政策能够取得有效的成果，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得到改善，我们能够期望在 15-20 年后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的趋势有所缓解。但至少在近二十年间，我国将面临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直接挑战，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提升将面临着沉重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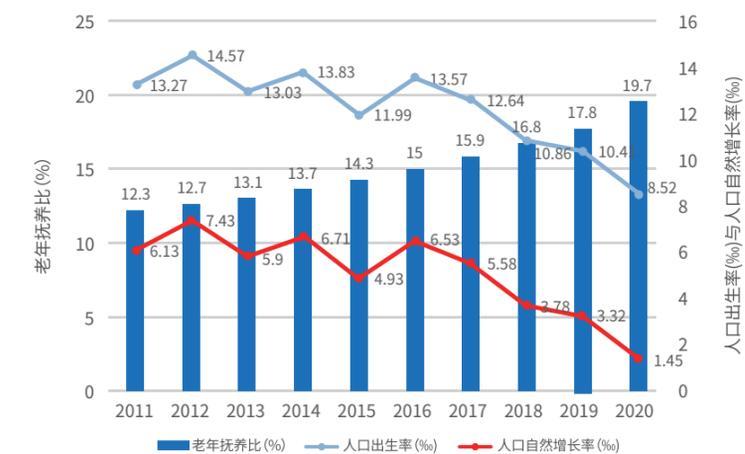


图 2.3 2011-2020 年中国老年抚养比 (%)、人口出生率 (%) 与人口自然增长率 (%)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³

2.1.3 现行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存在不足与失衡

从世界银行 1994 年在报告《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中首次提出三支柱退休收入体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形成规模庞大、参与人数众多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社会成员的老年经济保障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其中，第一支柱为政府主导的公共养老金，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为企业主导的各类退休计划、年金计划，包括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为个人主导的个人养老金，包括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基金、银行理财等。

然而，我国现行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存在明显的不足与失衡。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老金总资产占 GDP 的比重严重偏低。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0

³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5.81 万亿元，较 2019 年末 6.29 万亿元有所下降；年末企业年金积累基金 2.25 万亿元；第三支柱刚刚起步，规模尚小。2020 年，我国第一、第二支柱养老金仅占到 GDP 的 7.93%，而这一数值在 2019 年为 8.20%。其次，在养老金结构方面，我国目前第二与第三支柱养老金的规模严重偏小，发展较为落后，基本养老保险在我国居民退休后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2020 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不少省份对企业降低了社保缴费要求，这也导致我们国家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近年来首次出现缺口。如图 2.4 所示，2020 年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92 万亿元，低于支出金额 5.47 万亿元，累计结存金额也在近五年首次出现下降。在日趋严重的社会老龄化背景下，可以预见我国基本养老金缺口在未来可能持续扩大，为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目前基本养老金的保障水平还十分有限，城镇职工的年平均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不足 50%，仅能支付基本的生活开支，难以抵御风险和满足美好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在未来更加积极地发挥第二、第三支柱的作用至关重要。老龄化社会面临的老年人口抚养压力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面对和解决。



图 2.4 2016-2020 年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支出与累计结存 (单位: 亿元)⁴

2.2 项目概况

2.2.1 项目的提出

为科学系统地了解居民个人对未来退休生活的准备情况，2012 年起，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启动了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调查范围主要在欧洲、北美等地区。从 2013 年开始，中国作为亚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被纳入调研范围。调研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无锡等五座城市进行抽样，发放了问卷 1000 多份。2014 年，中国区的调研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了 29 个省、市、自治区，样本数量也增加到了 2000 个，由 1800 名在职人员和 200 名退休人员构成。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是荷兰全球人寿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成果的一部分。由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根据调研公司 Cicero Consulting 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施的问卷调查回收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撰写而成。

⁴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2.2 调查对象、内容及目标

本次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国居民对退休准备的预期及采取的行动，调查对象来自中国 33 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的 2000 名居民，调查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受访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预期、态度以及已经或即将采取的行动，具体分为以下几部分：

(1) **受访者对经济发展、自身财务状况和退休生活的预期。** 受访者对自身未来财务状况和国家未来经济状况的看法，对退休后的经济来源、退休生活年数、退休方式的预期。

(2) **对待退休生活的态度。** 受访者对待退休生活的态度，例如：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期待的，还是恐惧的。

(3) **退休准备指数——综合反映居民在退休准备认识和退休准备行动方面的指数。** 这个指数是根据对受访者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方面的得分，经过加权求和计算出来的。

(4) **退休收入来源。** 受访者的退休收入来源、理财方式。

(5) **退休收入责任。** 受访者对退休收入责任的认识，即退休责任应该如何对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的认知情况。

(6) **雇主提供的福利及服务。** 中国雇主为其职工提供的养老金福利和其他职业福利情况，以及职工对雇主提供的福利和服务的预期。

(7) **退休理财计划。** 退休储蓄与支出的情况、退休储蓄的信息与建议的来源、对退休理财产品的希望和建议。

(8) **养老危机感与对外依赖性。** 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对养老产生了危机感，对外部（来自政府、雇主、子女等方面）支持的依赖性有多强。

(9) **居民是否已经开始了对退休生活的合理规划。** 如果已经开始，又是从哪些方面着手的，购买了什么样的理财产品；如果还没有开始，他们又有哪些理财方面的预期和需求。

(10) **影响对退休计划的认知与行动的因素。** 哪些因素影响了受访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和所采取的行动。

本次调研的最终目的是：**针对中国居民在退休准备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与政策、企业了解员工的退休生活需求并据此制定和完善员工福利计划、个人制定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退休养老计划提供参考。**

2.2.3 问卷设计

本次调研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在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设计的全球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居民养老准备的现实情况，进行了本土化修订，形成了既能体现中国居民退休准备专属特色、又能与全球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进行横向比较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共包括 9 个方面：

- (1) 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主要居住地、工作状态、年收入、婚姻状况、子女、学历、受雇单位类型、职位等；
- (2) 对未来经济和财务状况的预期，包括：对一年后中国经济和受访者自身的财务状况的预期；
- (3) 对退休生活的感性愿望和理性预期，包括：退休生活的设想、如何取得退休后的经济支持、（预期）退休年龄、（预期）退休后生活年限、对今后退休者情况的简单预期等；
- (4) 退休准备情况，包括：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应对自己在财务方面的退休计划负责、对其在退休计划的认识水平进行自我评估、退休计划的实际制定情况等；
- (5) 退休储蓄的动机，包括：受访者退休进行储蓄的原因和措施、阻碍其为退休而储蓄的障碍、与金融危机的关联等；
- (6) 为退休生活所购买的金融理财产品，包括：产品的种类、选择的原因、相关信息来源、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可持续的时间等；
- (7) 政府和雇主责任，具体指在受访者看来，政府和雇主应该在帮助其步入退休生活这个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 (8) 受访者预期的退休储蓄的支出方式；
- (9) 受访者的金融素养，包括基本金融知识和对金融产品及其风险的理解。

2.2.4 调研过程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先由调研公司 Cicero Consulting 植入问卷调查系统，通过互联网呈现给受访者，由受访者在线独立填写，调研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22 日。

此次调查共分层抽取了 2000 个样本，样本分别来自中国 23 个省（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四川、辽宁、山东、湖北、安徽、陕西、山西、福建、湖南、江西、云南、吉林、黑龙江、河南、

甘肃、青海、贵州、海南、台湾），4 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5 个自治区（广西、内蒙古、新疆、宁夏、西藏），1 个特别行政区（澳门），共计 33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特别行政区。其中，在职职工占 90%（含全职、兼职、半退休，不包括学生、无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等），退休者占 10%（不含仍参加工作的退休者）。在性别构成上，男性和女性受访者的比例大体相当。

1. 问卷基本情况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000 份，所获样本基本情况如下：

- (1) 受访者年龄分布较为平均，45 岁以下的青年群体较多，所有年龄段的受访群体均超过了 100 人，平均年龄 41.5 岁，见图 2.5。
- (2) 受访者性别分布均衡，男女比例接近 1: 1，见图 2.5。
- (3) 受访者教育背景以大学本科及以上为主，占比超过 80%；高中以下仅占 1.1%，见图 2.6。
- (4) 受访者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比超过 80%，见图 2.7。
- (5) 受访者分别来自 33 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其中样本数量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和广东，数量最少的是台湾、澳门和西藏，见图 2.8。
- (6) 受访者职位以基层管理人员与中层管理人员为主，占比分别为 36.4% 与 36.1%；体力劳动者（包括熟练、半熟练与不熟练劳动者）占比较少，不超过 10%，见图 2.9。
- (7) 受访者个人税前年收入与家庭税前年收入分布，见图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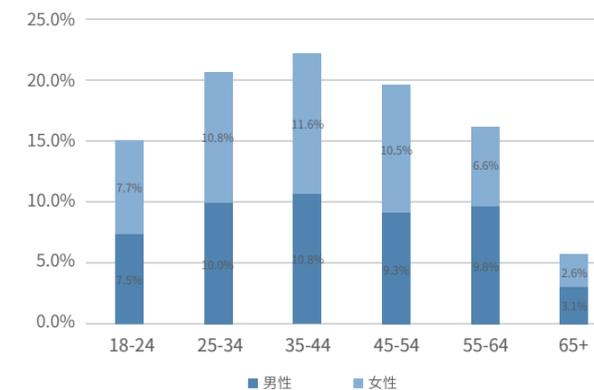


图 2.5 受访者年龄与性别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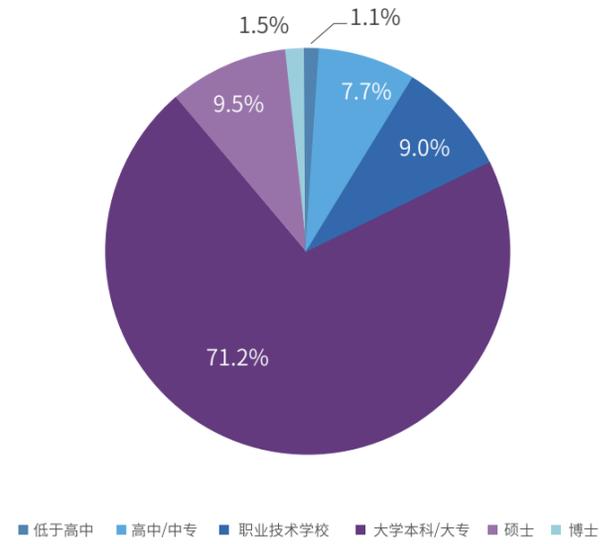


图 2.6 受访者受教育水平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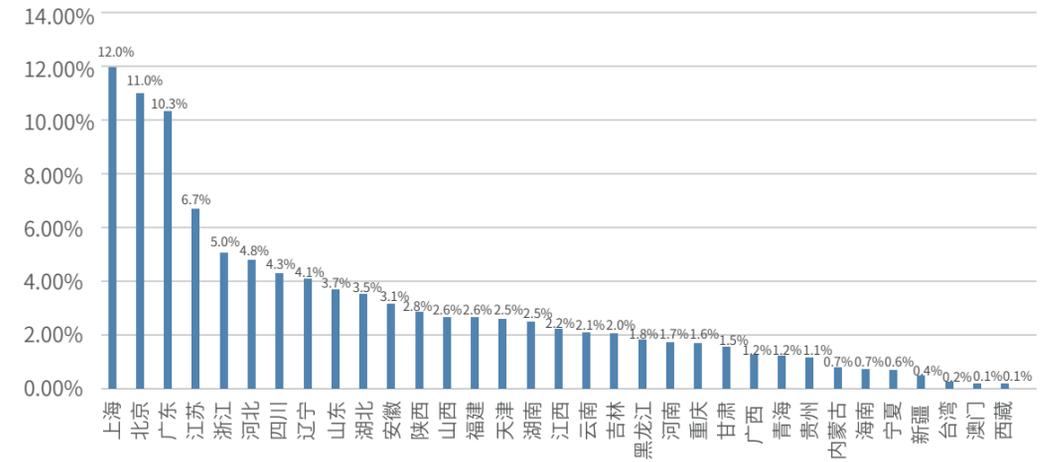


图 2.8 受访者地域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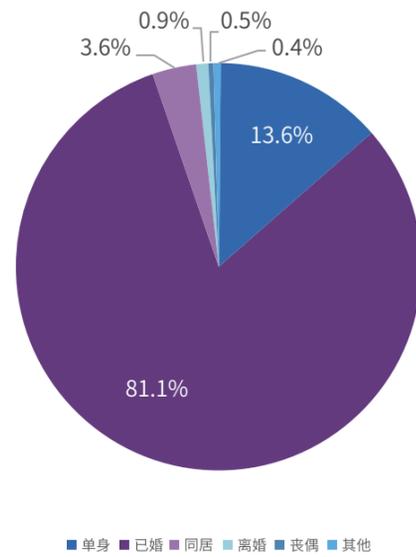


图 2.7 受访者婚姻状况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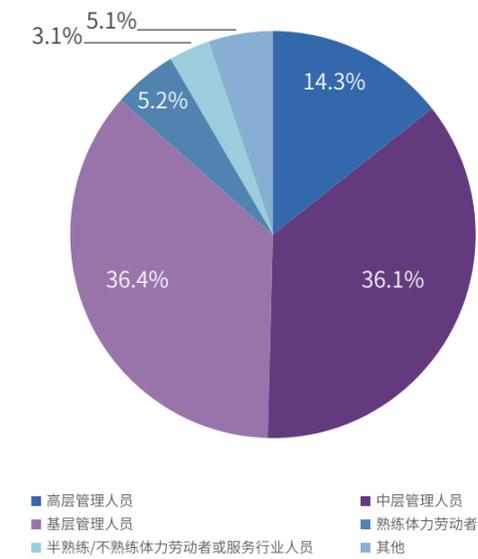


图 2.9 受访者职位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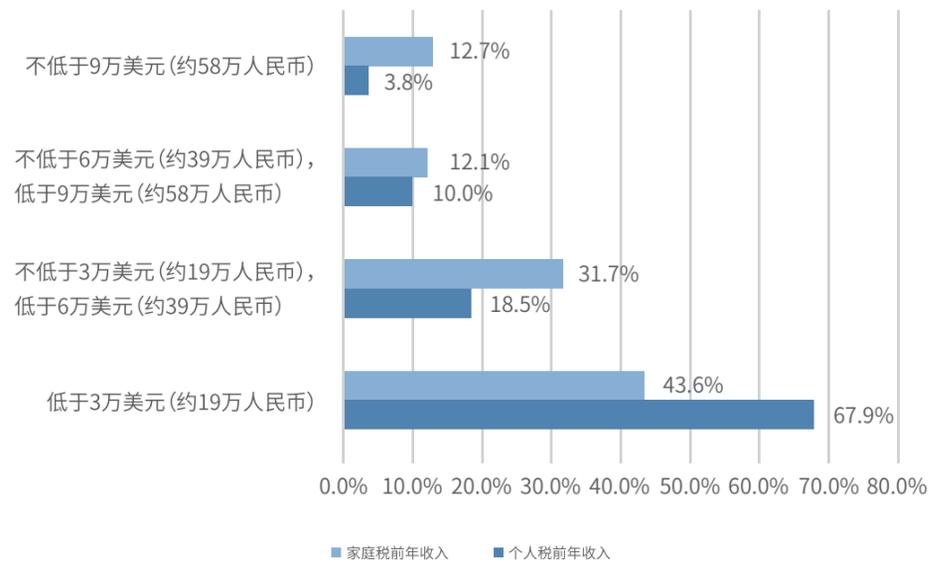


图 2.10 受访者个人税前收入与家庭税前收入分布

2. 受访者的代表性分析

为了解此次调研的受访者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们将全国人口的相关数据分布与受访者的数据分布进行对比。

根据 2019 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全国人口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年龄分布来看，将 20 岁及以上的人口作为基数，45-54 岁人口占比最多，达到 22.1%，而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 16.1%，见图 2.11。

(2) 性别分布来看，在各年龄段男女比例接近 1: 1，见图 2.11。

(3) 受教育水平分布来看，6 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学历人口占比最多，达到 37.3%，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仅有 14.6%，见图 2.12。

(4) 婚姻状况来看，15 岁及以上人口中，超过 70% 的人口具有配偶，见图 2.13。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地区人口基本情况如下：

(5) 地区人口分布来看，在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广东、山东、河南人口数量最多，宁夏、青海、西藏人口数量最少，见图 2.14。

根据 2020 年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全国人口的收支基本情况如下：

(6) 收支情况来看，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189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3834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131 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21210 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27007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3328 元。

(7) 家庭总收入分布来看，以本次调研问卷的分类标准，超过 90% 的家庭总收入低于 3 万美元（约 19 万人民币），见图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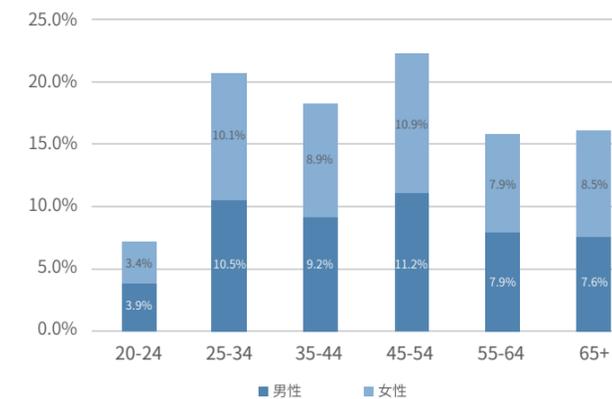


图 2.11 全国人口年龄与性别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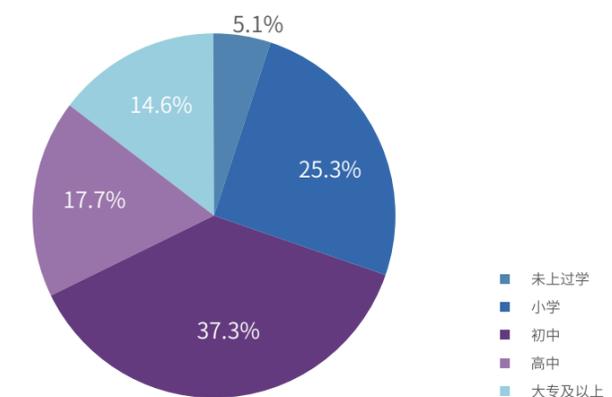


图 2.12 全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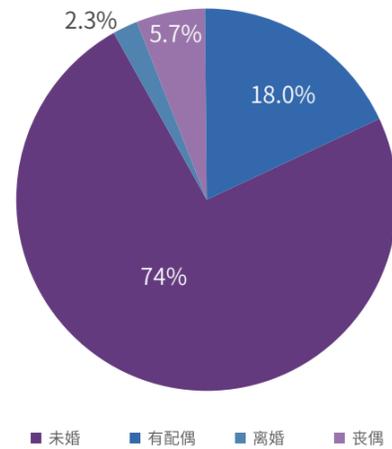


图 2.13 全国人口婚姻状况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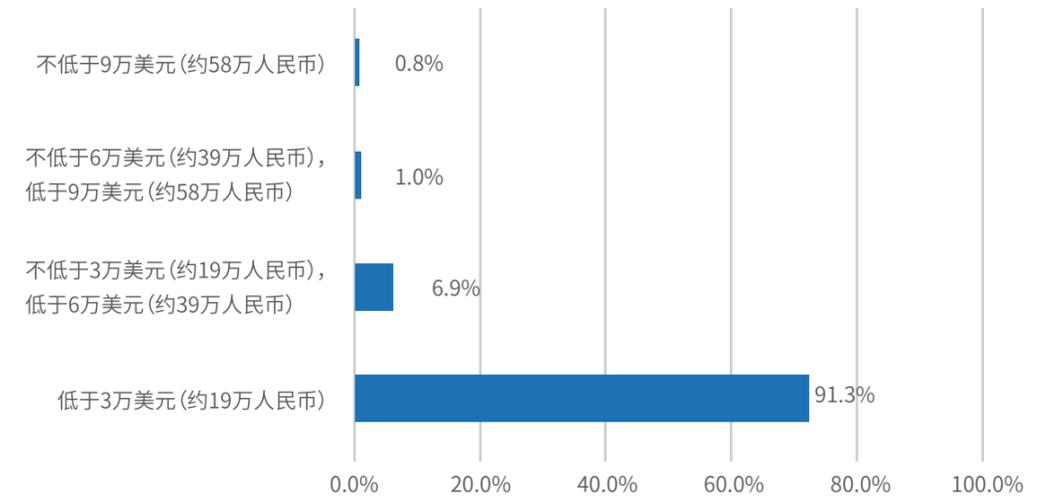


图 2.15 全国家庭总收入分布

3. 对比分析

将本次调研收集的样本数据与全国数据进行对比, 可以发现**样本在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上均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具体而言, 本次调研的受访者在年龄结构上更加年轻化, 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较少; 在地域上更多集中于发达省市, 家庭收入水平更高, 受教育程度也远高于全国水平。因此, 本文的结论对于了解小康家庭和具备大学学历的城镇居民的退休准备更具有参考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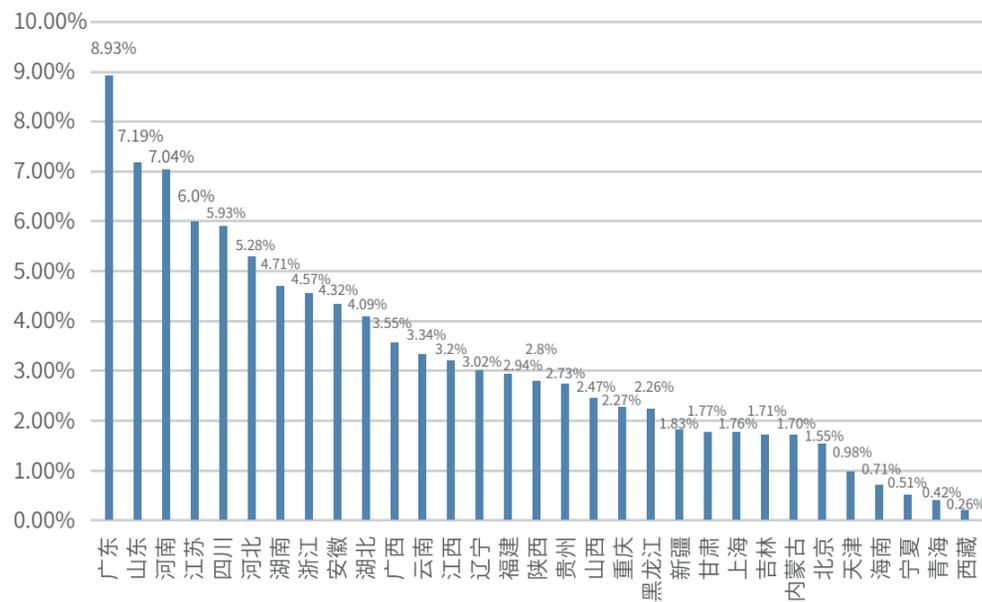


图 2.14 全国人口区域分布





03.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

3.1 退休生活愿景

3.1.1 总体情况

为了考察中国居民退休后生活意愿，我们在问卷中为中国居民提供了“多花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旅游”、“发展新的爱好”、“学习”等九个选项，并让受访者选出他们想要在退休生活中囊括的活动。问卷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期待休闲娱乐、自我放松的退休活动**，如图 3.1 所示，在受访者当中最受欢迎三项的活动是“多花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旅游”和“发展新的爱好”，分别得到了 55%、52% 和 46% 受访者的选择。

另外一个主流选择是在退休之后继续参与工作。本次调研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希望能够以在退休后继续在不同领域参加工作或创业，延续自己的职业生涯。22% 的受访者希望能够在退休后继续学习，20% 的受访者希望能够投身志愿者工作。

疫情的延续并没有影响人们移居国外的热情，今年的调研当中有 12% 受访者希望跳出“舒适区”，在退休后移居他国生活，体验全新的生活环境，这一比例与 2020 年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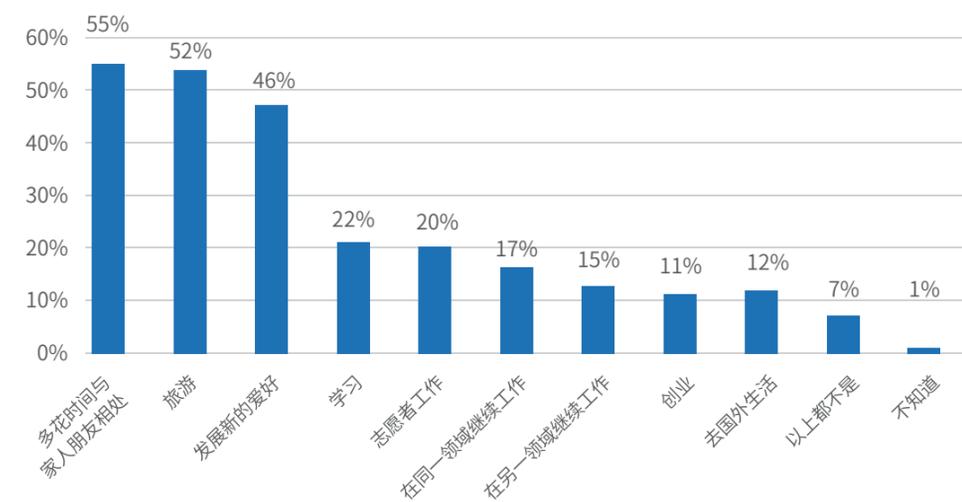


图 3.1 中国居民退休生活愿景

通过对“仍在工作”和“已经完全退休”两个群体调研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调研结果在这两个群体当中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在已退休群体当中，**受访者继续工作的意愿显著低于未退休受访者的继续工作意愿**。只有 6% 的完全退休受访者表示将在同一领域继续工作，希望在另一领域继续工作或创业的受访者只有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

约3%。同时，已退休者的个人发展意愿也普遍低于未退休者。退休受访者选择“发展新的爱好”、“学习”的比例分别低于未退休受访者10个、8个百分点。与以上情况相反的是，在退休人群中愿意花时间陪伴家人朋友、希望去旅游的受访者占比更高了。

对于已退休者和未退休者退休意愿的分化，有如下三种可能的解释：已退休者经济条件相对有限，难以承受高风险活动；已退休者相对年长，基于身体状况和自身精力形成不同预期；已退休者事业暂停，重新开始工作有进入门槛。值得注意的是，在已退休人群当中，有高达17%的受访者表示上述选项都不是自己退休后想要参与的活动，说明已有选项不能够精准地圈定已退休者的退休生活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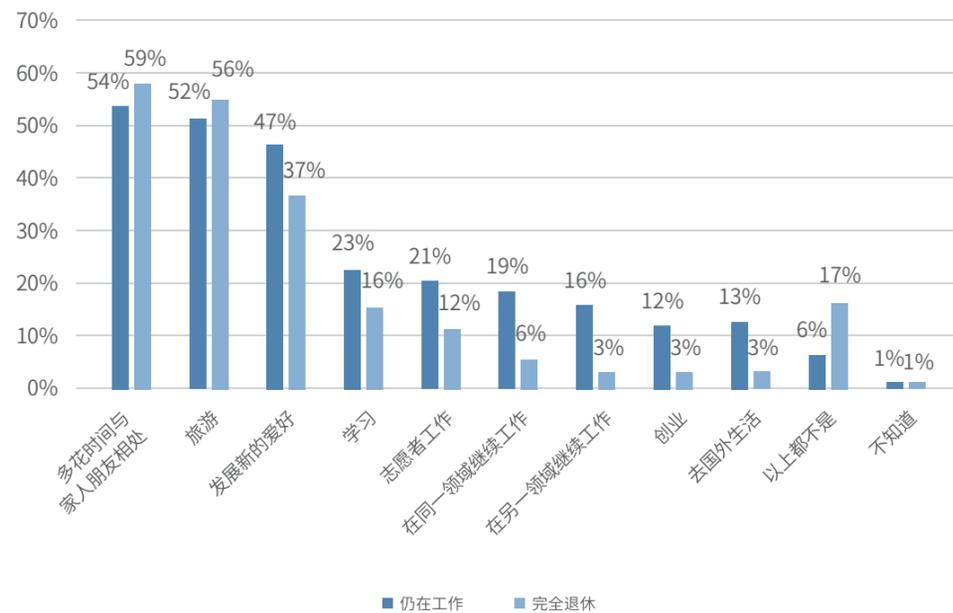


图 3.2 不同工作状态居民退休生活愿景

3.1.2 客观因素对退休生活愿景的影响

受访者的退休生活意愿会受到自身的客观条件的影响，薪水、家庭收入情况会成为他们的形成退休活动愿景时的预算约束。同时，年龄也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心理状况，不同年龄的人处在不同人生或职业发展阶段，因此年龄也会对人们的退休生活愿景造成影响。在问卷选项中，创业、前往国外生活等等选项都有较高风险，而其他如学习、旅游、发展新爱好等选项也需要较大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处于不同的年龄、有不同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受访者对于退休后参与如上活动的愿望有明显差异。

(1) 年龄：青年期待享受休闲的退休生活，50 岁后工作热情减退

在不同年龄层当中我们发现，年龄在 20 岁到 39 岁之间的受访者选择“旅游”、“花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发展新爱好”等具有明显休闲性质的选项的比例更高。青年人处于事业

的起步期，他们的休闲时间必然地逐渐受到工作和生活等多方面的限制，这种休闲的受限可能导致他们产生退休后能够摆脱事业的束缚的期待，希望在退休后自由地掌控自己生活，用更多时间参与休闲活动，进一步发展爱好、娱乐自己、陪伴家人。同时，青年人也是退休后的学习意愿最强的群体。很大一部分青年人仍保持着校园生活中所培养出的学习习惯，他们更加渴望汲取新鲜知识、了解新兴事物，并且有足够精力和专注力来投身学习活动，这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期待自己能够在退休后继续保持学习的习惯。

40-49 岁年龄段受访者将“旅游”和“多花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两个休闲选项作为自己退休活动的比例相对于青年群体显著下降，然而随着受访者年龄段升高到 50-59 岁、60-69 岁，休闲活动的热度又有明显回升。可见中国居民对于退休生活中的休闲活动的渴望会在 40-49 岁这个年龄段跌至谷底，这一时间节点也与大多数人的事业发展的成熟期相重合。事业成熟的中年人群往往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更加专注、投入、有较高的工作热情，在这一人生阶段人们的追求也往往和个人发展、工作成就高度相关。年富力强的中年工作者兼具健康工作的客观条件和多年积累的宝贵工作经验，距离退休年龄仍然较远，事业还有上升的空间，这也就决定了与青年人和老年人相比，休闲娱乐活动更难以给他们带来满足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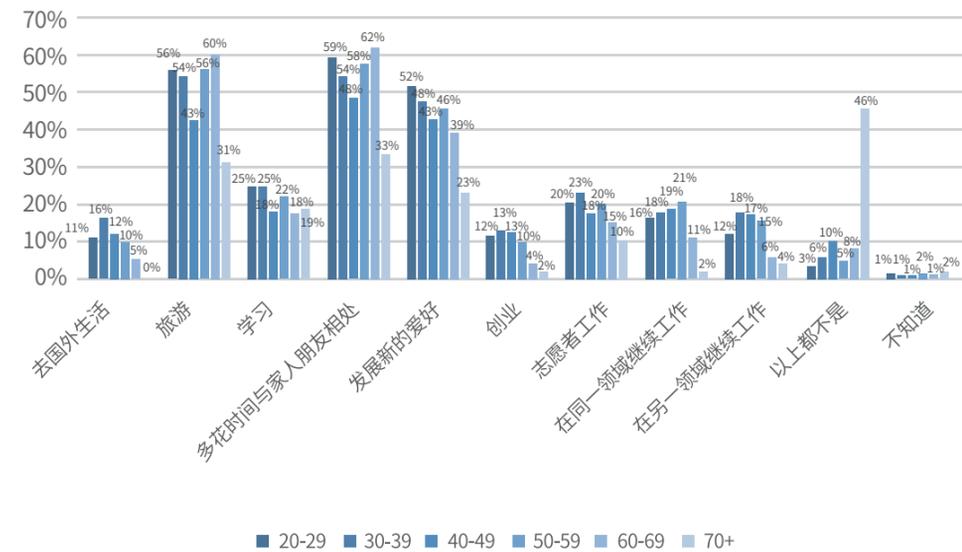


图 3.3 不同年龄段居民退休生活愿景

(2) 收入水平：高收入者退休后学习、工作意愿相对更强

调研将中国居民依据收入被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收入三个收入层级。通过调研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受访者的收入水平提升，选择退休后继续学习的比例升高。并且，收入越高的人群在退休后继续从事某种形式工作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有 17% 的中等收入受访者和 18% 的高收入受访者表示希望在他退休后继续从事同一领域的工作，然而只有 6% 的低收入受访者表示将继续在同一领域工作。这有可能是因为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影响了他们对于自己所在领域的价值认同，从工作中获得更高收入的人群会倾向于认为这一领域的工作值得他们在退休后继续坚持。低收入同样会挫折居民退休后在另一领域工作的热情，只有 4% 的低收入受访者表示会在退休后从事另一领域的工作。

志愿工作在不同收入的水平人群当中与其他工作形式相比都更加受欢迎，志愿工作回馈社会的性质更强，志愿工作也可以很好地充实退休居民的生活。对于退休人群来说，他们的工作目的也恰恰不再是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继续进行有偿劳动对他们的精力投入和身体状况都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志愿工作不失为一种好选择。同时，高收入人群希望在退休后参与志愿工作的比例高于低收入人群的现象仍然存在。

创业需要创业者有较高的时间、金钱上的投入，同时需要承担较大风险。调研结果显示，具有如上条件的高收入人群在退休后希望创业的比例明显高于低收入人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收入人群更可能有用于创业的额外积蓄，也更能具有承担更高风险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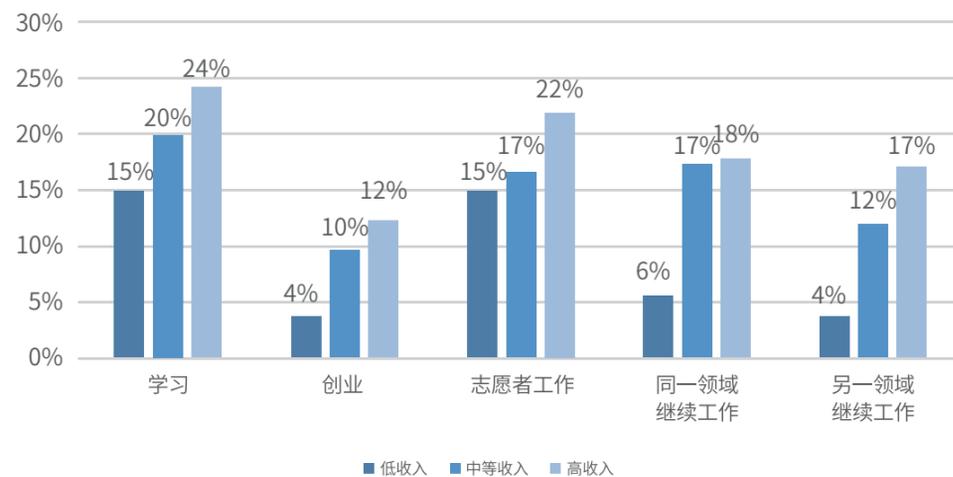


图 3.4 不同收入水平居民退休生活意愿

3.1.3 主观因素对退休生活愿景的影响

每个人的退休生活愿景很大程度上是由自己主观的个人观念决定的。本次调研考察了受访者人生追求和责任意识两个方面的个人主观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退休生活愿景。

(1) 人生追求：回馈社会成为退休后学习工作的重要动力

在探究受访者的个人追求与其在退休生活意愿的关联时，我们发现大部分受访者的个人追求并没有体现在退休生活愿景当中。以回馈社会为目标的受访者是普遍情况中的特例，与将职业发展或家庭生活作为人生追求的居民们相比，他们在退休后进行学习、工作的意愿更加强烈。

有 41% 的以回馈社会为人生追求的受访者希望在退休后继续参与志愿者工作，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人群，由此可见，他们认为参与志愿者工作是帮助自己实现回馈社会的目标的重要方式。不仅如此，有回馈社会的抱负的居民也更加有意愿学习、继续工作甚至通过创业以不断为社会创造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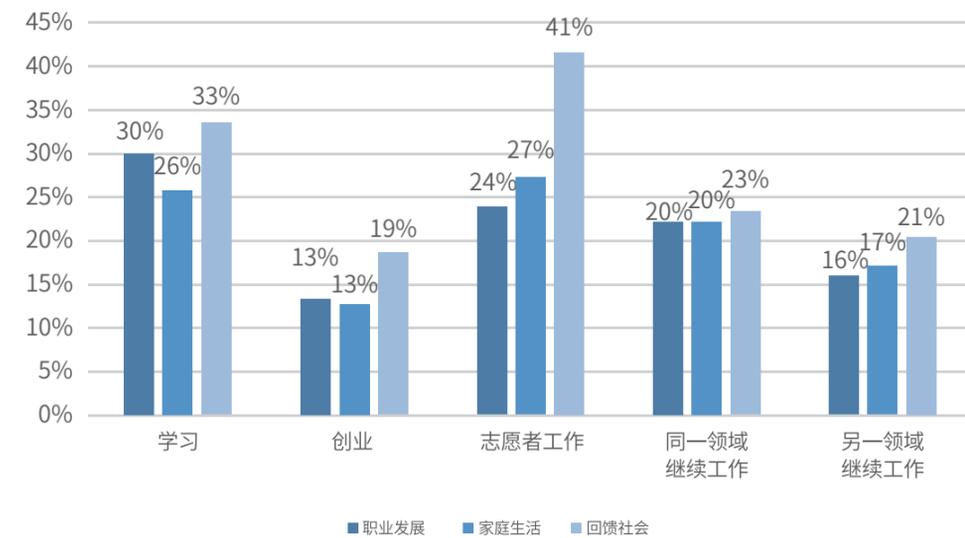


图 3.5 人生追求与退休生活愿景

(2) 责任意识：居民对自身责任意识评级高，与退休生活愿景关联程度低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为受访者设置了对自己的责任意识进行自我评价的问题。选项当中的数字 1-5 代表了受访者对自己责任感由弱到强的 5 个评级。绝大多数受访者都为自己的责任感选择了三级或以上的评级，有 30%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有极强的责任感。我们统计了不同的责任感自评等级受访者的退休生活愿景，结果显示，除了样本数量较小的责任感自评结果为“1”的受访者以外，责任感自评为其他评级的受访者的退休生活愿景几乎一致，说明中国居民的责任意识自我评价与其退休后希望参与的活动没有明显的关联。

在中国传统语境下的责任感通常是指一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感。然而在此次调研中，受访者的对自己责任意识的评价不一定基于自己对于家庭和好友的陪伴的意愿，在责任感自评等级为“2”的受访者当中，有 65% 选择在退休之后将与家人朋友相处，这一比例高于责任感自评为“5”的受访者 7 个百分点；而责任感最强的群体选择退休后创业的比例高于其他受访者约 9 个百分点，这个现象表明中国居民对自身责任感的理解并不一定完全基于退休后对于家庭的责任，人们在对自己的责任意识进行评价时考虑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期待和回馈社会的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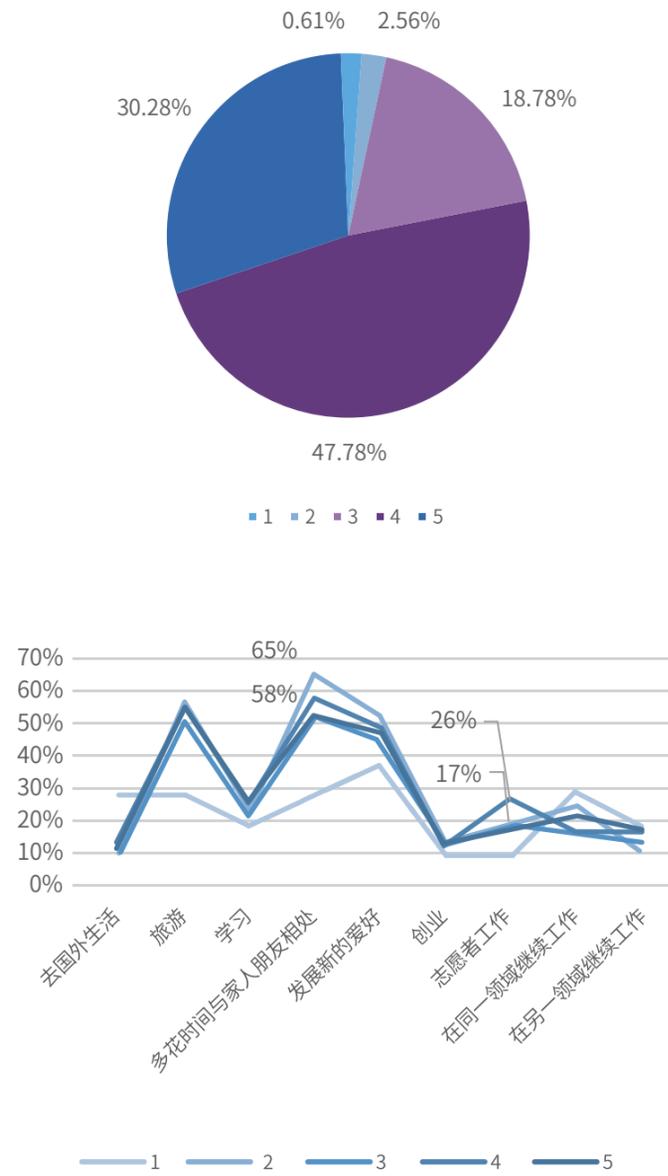


图 3.6 责任意识与退休生活愿景

3.2 退休年龄预期

3.2.1 总体情况

我国整体退休预期集中在 51-60 年龄段，共有 62% 的受访者表示将在 51 岁至 60 岁的年龄段中退休，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57.4 岁。整体来说，女性的预期退休年龄普遍低于男性。以上两个现象基本符合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即男性 60 周岁、女性干部 55 周岁、女性工人 50 周岁退休。可见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退休年龄预期，人们倾向于工作至法定退休年龄后正常退休。期望在 60 岁后继续工作和期望在 50 岁前退休的受访者比例均为约 19%，由此可以粗略判断：中国居民中持有希望延迟退休和稍早退休的人群占比大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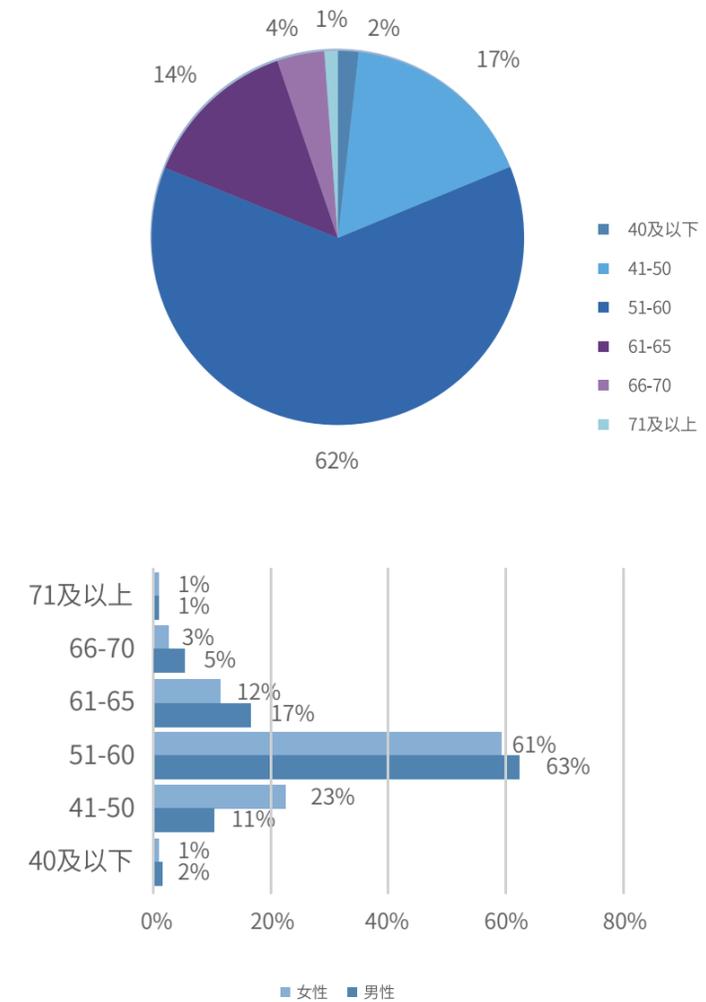


图 3.7 中国居民预期的退休年龄

3.2.2 财务状况与退休预期：高收入人群延迟退休意愿更加强烈

不同个人、家庭收入水平的受访者对于自己退休年龄的期待与总体情况相类似，集中在 51-60 这一年龄段，然而收入这一因素影响了人们延迟或提前退休的选择。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将受访者的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水平，其中，中等收入水平和高等收入水平的门槛分别为 34700 元和 208200 元。调研结果显示虽然不同收入层级的人们仍然将按计划正常退休作为第一选择，但对比收入较高的群体与收入较低的群体后，我们发现高收入群体有更强的延后退休倾向，而低收入人群有希望提前退休的倾向，如图 3.8 中所示，个人收入水平为“高”的受访者有 16% 的比例表示希望在 61-65 岁时退休，有 7% 的比例希望在 66-70 岁退休，都高于低收入人群 4 个百分点；而低收入人群有高达 24% 的比例希望在 41-50 岁退休，有 8% 希望在 40 岁前就退休，这两项数据分别高于高收入人群 7 个、6 个百分点。

这种高收入希望延后、低收入希望提前退休的现象在以个人收入作为收入高低的评判标准时更加显著，如果以家庭收入来划分收入的高低等级时，上述现象有所减弱，说明与个人收入相关的工作性质影响了受访者的退休年龄期待。可能的原因包括：一些低收入工作是体力劳动，对从业者精力的消耗过大；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人群更有可能认为为之牺牲自己的休闲时间不划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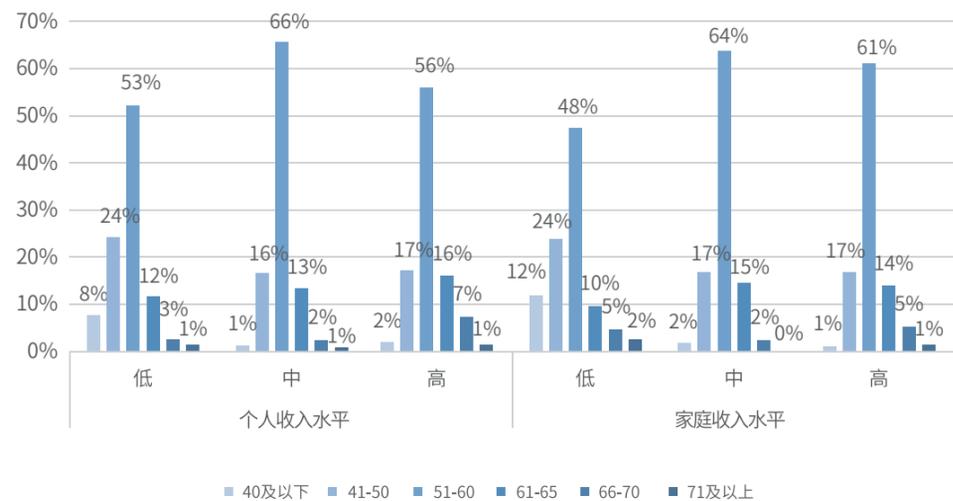


图 3.8 个人、家庭收入水平与预期退休年龄

3.2.3 工作认同与退休预期：更强的工作认同会激励居民延迟退休

企业规模是影响工作认同感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说，更大规模的企业会有更加稳定的经营状况，能够给雇员更加慷慨的薪资、福利待遇，形成能够让员工认可的企业文化，雇员们也有更好的职业生涯前景和发展空间。上述因素都更容易让雇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更强的认同感。在本次调查中，雇主规模少于 10 人的受访者有 7% 的比例希望在 40 岁之前就退休，而这一占比随着企业规模增大递减，雇主规模大于 250 人的受访者希望在 40 岁前退休的比例仅为 0.42%；另一方面，随着雇主规模增大，希望在 70 岁以上退休的极端情况出现的比例开始缓慢升高。由

此可见，雇主规模的大小会影响居民对于退休时间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形成可能受到的是雇主认同感的影响。**更大规模的企业能够给雇员带来的工作认同感、稳定感更强，从而鼓励他们相对更晚地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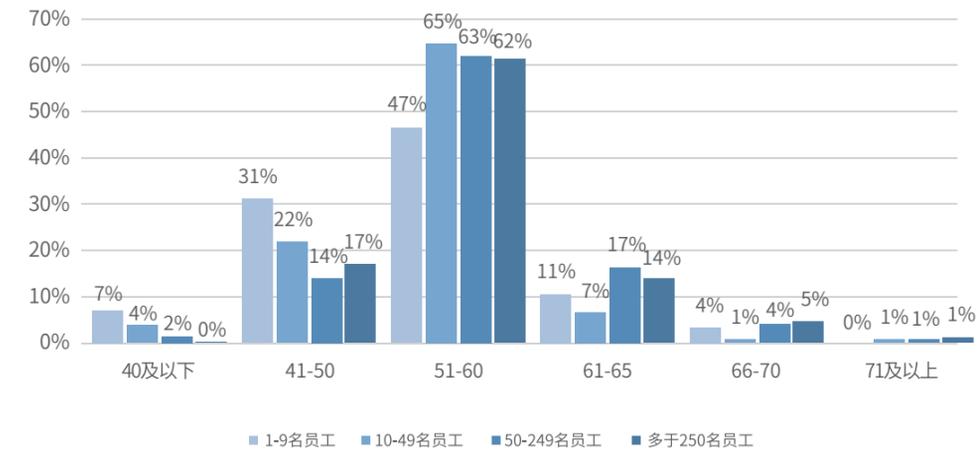


图 3.9 受访者雇主规模与预期退休年龄

影响工作认同感的另一因素是工作职位和级别。在图 3.10 当中可以看出，**从事管理、行政等非体力劳动的居民，会倾向于工作更长的时间**，具体体现为：希望在 71 岁或更晚退休的比例随着级别的升高由 0.15% 递增至 1.82%；希望在 66 岁至 70 岁这一年龄段退休的比例由 3.07% 递增至 7.64%。从事体力劳动的受访者相比于非体力劳动者，延迟退休的愿望相对较弱，提前退休的愿望更加强烈。相比于非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的退休时间预期普遍要更早。**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体力劳动不适合年龄过高的人群，并且体力劳动可能相比于非体力劳动更难以让劳动者获得对这份工作的认同。**

在体力劳动者中，我们也区分了门槛更高、需要经验积累的技术型劳动者以及一般体力劳动者或服务者，二者的预期退休年龄差异非常明显，技术型劳动者希望在 66 岁至 70 岁之间退休的比例为 5.56%，而一般体力劳动者或服务者希望在这一年龄段退休的比例仅为 1.96%。一般体力劳动者或服务者有高达 29% 的比例希望在 50 岁以前就退休，显著高于技术型劳动者的 8.89%。熟练体力劳动者的工作一般更加重要，因为他们岗位上积累了较多难以替代的经验。**熟练体力劳动者工作的重要性、经验积累等因素会让劳动者对自己工作有更强的认同感，使他们倾向于在岗位上工作更长时间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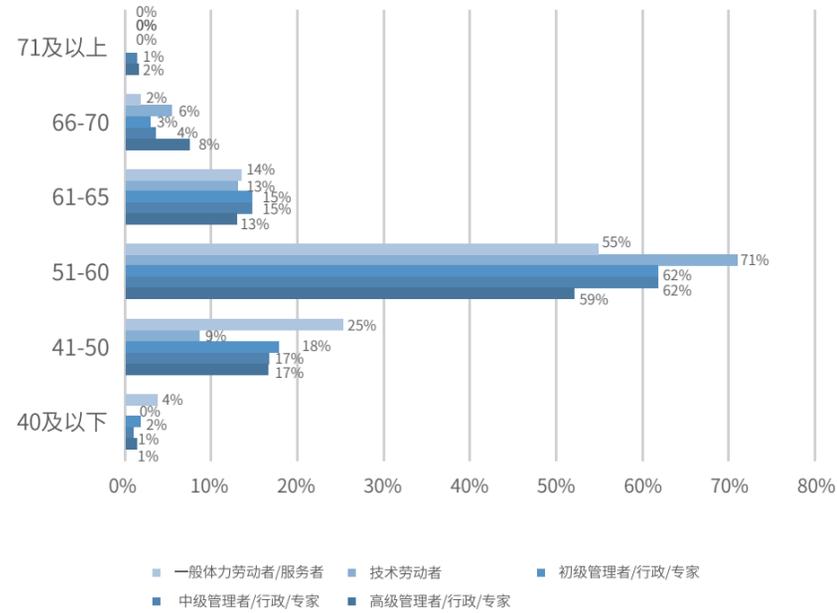


图 3.10 受访者职位水平与预期退休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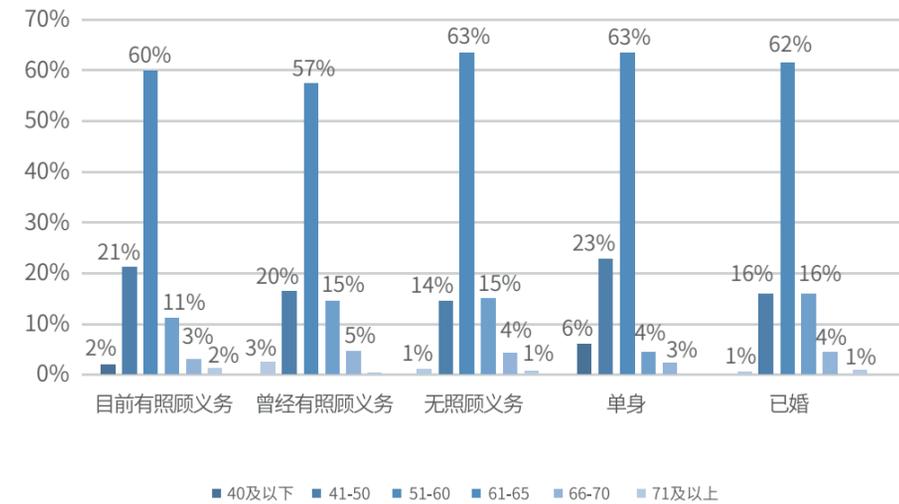


图 3.11 受访者家庭责任与预期退休年龄

3.2.4 家庭责任与退休预期：照看责任激励提前退休，而婚姻关系鼓励延迟退休

中国居民在事业上的发展和退休选择往往与家庭情况相关，正在工作者通常需要对家庭中的老人、儿童履行照看义务，作为家庭成员照顾者的身份会和他们选择何时结束事业是有关联的。另外，结婚前后在家庭和事业侧重点上的变化，也是影响人们预期退休年龄的一个因素。

如图 3.11 所示，**目前有照顾他人义务的人群和曾经有照顾他人义务的人群有更强的提前退休倾向**，目前或曾经正在照顾他人的受访者分别有 21%、20% 的比例希望在 41-50 岁这个年龄段就提前退休，显著高于没有照顾义务群体的同一比例（14%）。40 岁至 50 岁虽然是人们事业的上升期，也是接近于成熟期的人生阶段；但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中年人，大多数上有年迈的老人，下有未成年的子女，家庭责任最为繁重，因此将早日卸下工作担子，回归家庭、照顾家人作为心愿的中年人不在少数。

婚姻关系会让人们产生延迟退休的愿望。单身受访者和已婚受访者的数据对比显示，有 23% 的单身受访者希望在 41 岁至 50 岁的年龄段退休，高于已婚受访者 7 个百分点；而已婚受访者有 16% 希望在 61-65 岁之间退休，单身受访者希望在这一年龄段退休的比例仅为 4%。由此可见，婚姻与事业在中国居民看来并不是互斥的，不仅如此，身处稳定的婚姻关系当中还能够激励人们工作更长时间。

3.3 退休过渡方式

3.3.1 未退休者对退休过渡方式的设想

为了探究人们希望怎样从工作状态过渡到退休生活当中，我们为未退休的受访者设置了“立刻停止工作，完全退休”、“改变工作方式，再离开有偿工作岗位”、“改变工作方式，未来将继续进行有偿工作”、“不改变工作方式，像目前一样继续工作”等选项。问卷结果显示，仅有 33%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在自己退休时立刻停止工作，开启退休生活，而比例高达 64% 的受访者选择了在由工作向退休转变的过程中将参与有偿的工作。这一现象说明大多数中国居民不希望过于突然地脱离工作状态，他们更倾向于逐渐完成由工作到退休这一状态的转变，并且在过渡期从事一定程度的工作。

在众多过渡方式当中，最主流的选择是先改变工作方式（转为兼职或临时工作），再完全结束有偿工作，占全体受访者的 31%，占希望过渡退休的受访者的近 50%，这种过渡的方式相对来说更加平缓，实现了工作强度的递减。有 23%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转为兼职或者临时工作，并且在退休后继续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有 10% 的受访者表示在未来将不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像目前一样继续工作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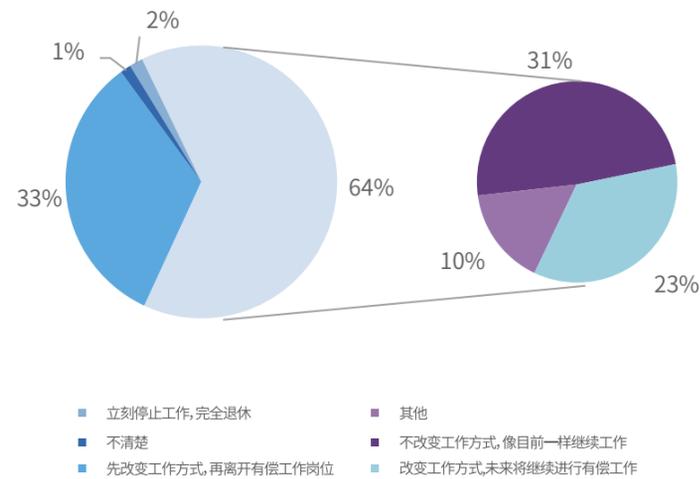


图 3.12 未退休者的退休过渡方式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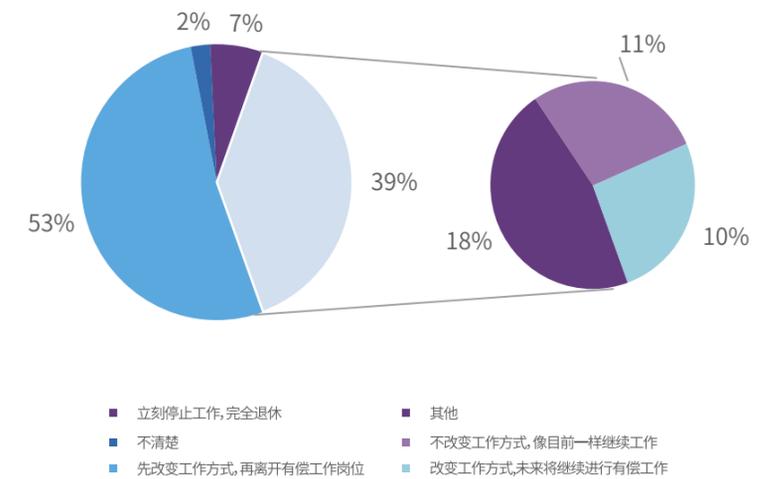


图 3.13 已退休者的退休方式回顾

3.3.2 已退休者对退休过渡方式的回顾

对于已经退休的受访者我们也设置了同样的退休过渡方式选项，并让受访者回顾自己是如何从自己的岗位上退休的。虽然未退休居民普遍期待有过渡地退休，但是对已退休居民的退休方式回顾显示，实现了过渡退休的居民仍然占少数。有比例高达 53% 的已经退休受访者表示自己退休时是没有缓冲地立刻停止了工作。改变工作方式后离开有偿工作岗位、改变工作方式并继续进行力所能及的工作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11% 和 10%。退休受访者中，表示将在退休后不改变生活方式并像退休前一样工作的比例为 18%，这一比例高出未退休者选择同一选项的比例 8 个百分点。

退休会给人们的身份和日常生活方式带来巨大改变，如果没有过渡期作为缓冲，人们往往会在退休后感到不适应，并且会因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的转变而产生心理落差，因此未退休居民对于过渡性的退休有较高期待。然而已退休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已退休居民在过去实现了过渡退休的比例并不高**，主要原因可能包括：国家政策划定了退休年龄，大多数从业者工作到退休年龄后就完全离开了工作岗位，没有考虑过渡性地退休；通过兼职、临时工作作为全职工作的过渡对于退休人群来说可能并不现实，适合较为年长、已退休人群的兼职、临时工作机会可能较为稀少。

3.3.3 中国居民提前或延迟退休的原因

基于未退休居民的退休过渡预期和已经退休的居民实际退休情况之间较大的差距这一情况，我们调查了中国居民实际退休情况与预期退休情况之间的存在差异的原因。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可能导致受访者提前或晚于计划退休因素，并且让已经退休的受访者选择自己为何早于或晚于自己计划的退休年龄退休。

在提前退休的受访者当中，较为积极的提前退休原因主要来自于财务方面。有 11%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是因为得到了一大笔意外收入而提前退休，还有 6% 的受访者因为已经提前拥有了足够的积蓄所以退休。**由此可见，在一部分中国居民的观念当中，保证退休后财务上的稳定是他们提前退休的重要条件。**

因负面原因而提前退休的受访者更为普遍。首要的负面影响因素是个人健康问题，有高达 20% 的受访者提前退休的原因是因为个人健康的原因被迫提前离开岗位。另外一大因素是因为失业而被迫结束职业生涯，比例高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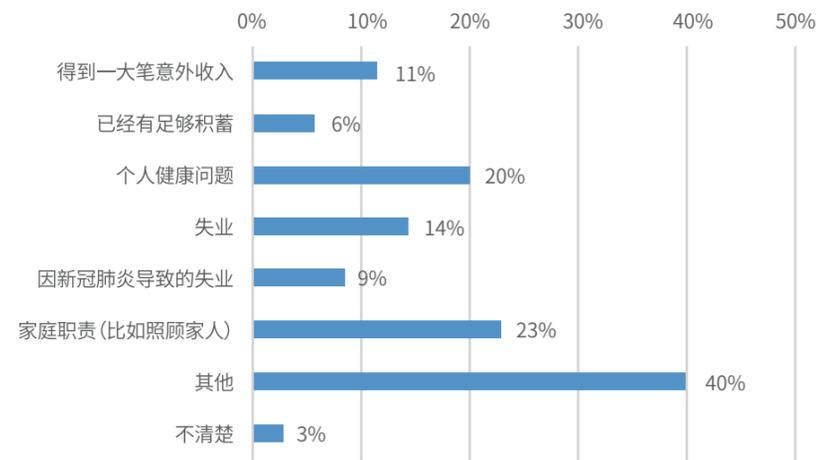


图 3.14 提前于计划时间退休的原因

另一方面，晚于自己计划退休的退休居民更多是因为较为积极的原因做出了延迟退休的决定。有高达 45% 的晚于计划退休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延迟退休的原因是很享受目前的工作，还有 27% 的受访者认为延迟退休可以让自己继续焕发活力而选择了延迟退休。由此可见，大部分中国居民选择延迟退休是源于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喜爱，或者认可工作对人精神状态积极的调节作用。

导致中国居民晚于计划退休的负面因素主要来自财务方面。有的受访者会因为对退休后收入降低存在担忧，具体来说，有 4%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担心经济衰退导致的退休收入降低而延迟退休，此外分别有 18%、14% 的受访者是因为担心来自政府、雇主的养老金低于预期，有 9% 的受访者是因为担心退休后的开销会消耗储蓄。除了对于退休后收入和花销的焦虑和担忧，也有受访者因为自己的客观财务状况而选择延迟退休，有 14%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因没有足够的积蓄所以晚于计划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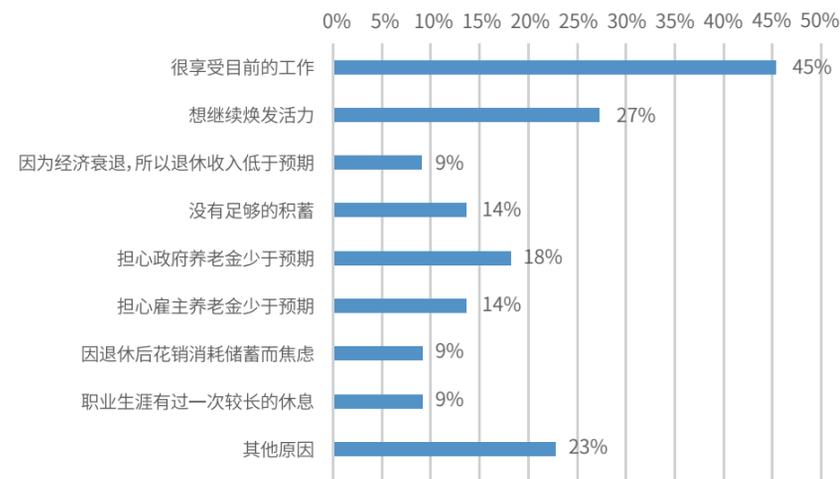


图 3.15 晚于计划时间退休的原因

3.4 退休生活信心

3.4.1 总体情况：整体信心程度强，已退休者信心稍逊

为了探究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信心，我们向未退休受访者询问了他们对于未来自己能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的信心程度，同时也向已经退休的受访者询问他们对于自己能够在退休期间能够一直过上退休生活的信心程度。两个群体总体退休信心程度都较强，约有 83% 的未退休者和 76% 的退休者都选择了对退休生活有信心（包括略有、很有、极有）。但如果横向对比已经退休的人群和尚未退休的人群，我们会发现**已经退休受访者信心程度稍逊于未退休的受访者**，具体表现为三个有信心的选项在已退休人群中的被选率都低于在未退休人群中的被选率。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退休者经历过了退休生活中的具体困难，这可能会让他们对未来的退休生活产生更加悲观的预期，进而影响了他们的退休生活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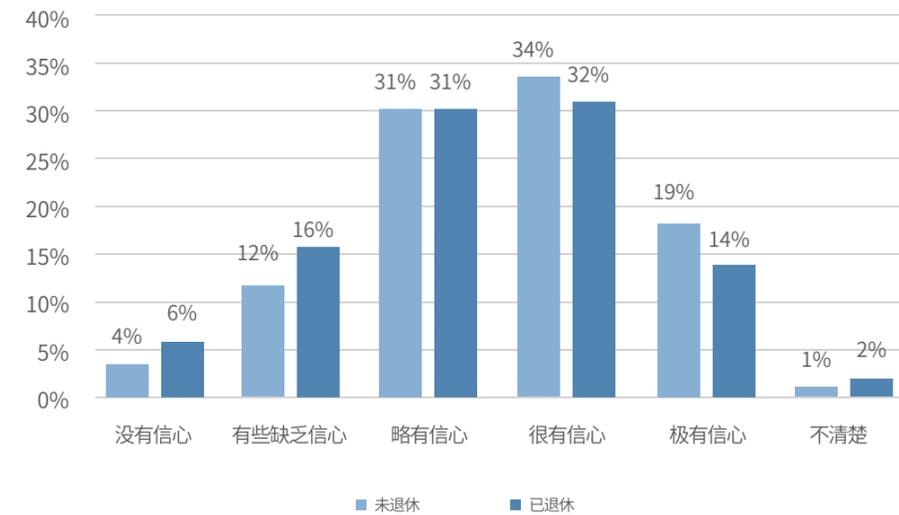


图 3.16 中国居民退休生活信心

未退休居民的总体信心水平相对于 2019、2020 年小幅度升高，这也是中国未退休居民的退休信心水平在经历了退休信心水平在 2019 年的骤降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之后首次回暖。2020 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严格而有效的防疫措施之下，中国经济运行复苏，人们感受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也逐渐减少，生活将逐渐回归常态，这都有利于人们对退休生活的舒适度产生积极的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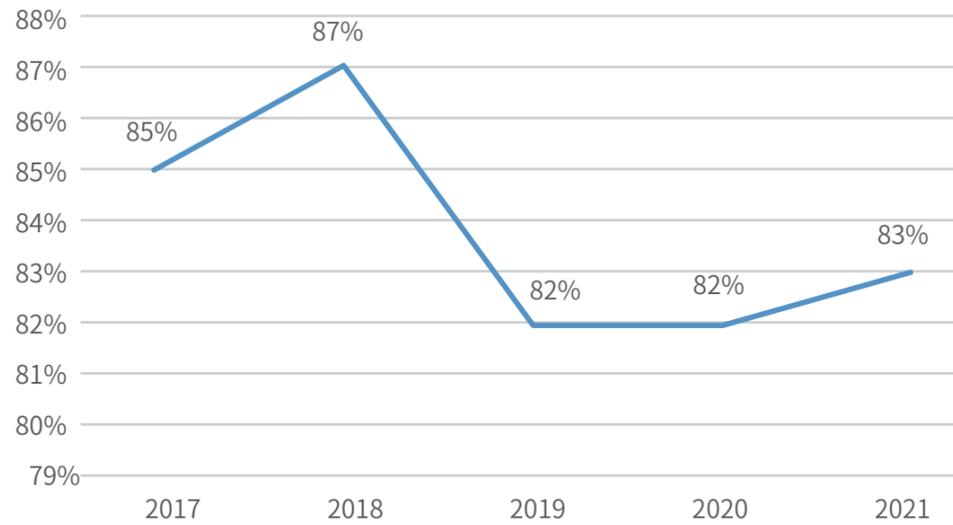


图 3.17 未退休受访者有信心过上舒适退休生活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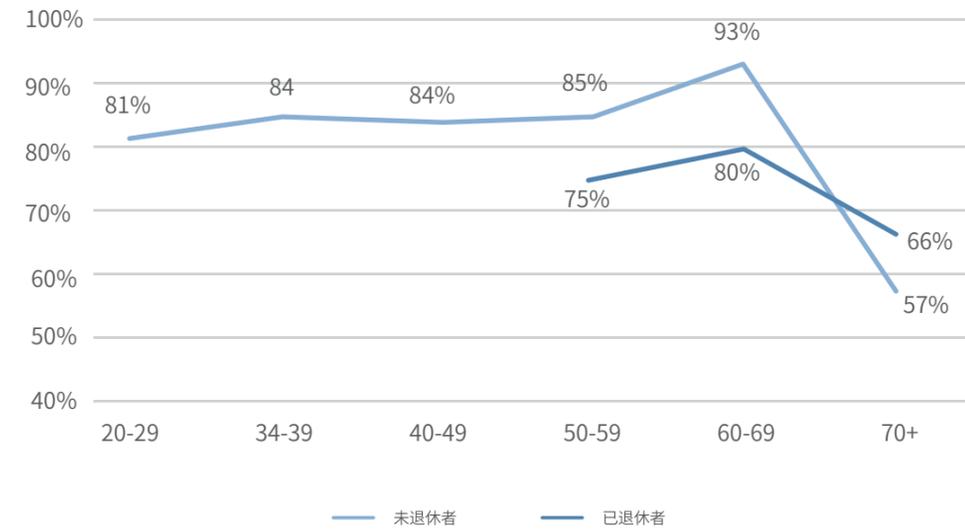


图 3.18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退休信心程度

3.4.2 年龄与信心程度：退休信心随年龄递增，但在 70 岁后发生骤降

为了探究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信心是否会受其年龄因素影响，我们将每一个年龄段当中对退休后有信心（包括略有、很有、极有）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数占比作为该年龄段的退休信心程度，并比较不同年龄段之间的退休信心程度差异。由图 3.18 可以看出，无论是未退休者还是已退休者，**人们的退休信心程度总体而言会随年龄段的增加而升高，但高于 70 岁这一年龄段的退休信心程度会骤降至最低水平。**

未退休的受访者的退休信心水平总体而言普遍高于已退休者的信心水平，同时，年龄更大的未退休者普遍有更强的退休信心，随着年龄段由 20-29 岁增长 60-69 岁，受访者的退休信心程度也由 81% 递增至 93%，但 70 岁以上受访者的信心水平会骤降至 57%。已退休的受访者信心水平也有类似的走势，60-69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信心水平明显高于 50-59 岁受访者，但 70 岁以上的受访者信心水平会下降至 66%。不同年龄段受访者信心水平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物质上和心理上对于退休开始逐渐有所准备和预期，进而会提升他们的退休信心。然而 70 岁以上高龄人群的健康状况和个人精力普遍开始衰退，这可能会打击他们对于拥有舒适退休生活的信心。

3.4.3 工作与信心程度：高级别、高收入工作者退休信心水平更高

未退休、仍在工作的这一群体虽然整体来说比已经完全退休的群体有更高的退休信心水平，然而在这一群体内部仍然有较为明显的分化。对于尚未退休，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居民来说，一个影响他们退休信心水平的重要因素是自身工作状态。从图 3.19 中可以看出，选择“很有信心”、“极有信心”两个选项的人数比例随受访者的级别升高而递增，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的受访者的退休信心水平为极有信心和很有信心的比例分别为 27% 和 39%，然而工作级别较低的受访者选择“没有信心”、“有些缺乏信心”和“略有信心”的比例更高。居民的工作级别影响居民的社会地位、工作认同感和个人价值感，并且决定个人和家庭的财务状况，**较高的工作级别可以增强居民退休信心。**

工作收入与工作级别对于人们退休信心水平的影响效果类似。图 3.20 中显示，随着收入等级由低到高的递增，受访者选择“很有信心”、“极有信心”的比例升高，选择“没有信心”、“有些缺乏信心”的比例降低。未退休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是他们的工资，个人收入高的人群的退休信心水平更高的现象说明了**高薪的工作可以从财务方面给人们更强的安全感，并提升他们对于退休生活舒适度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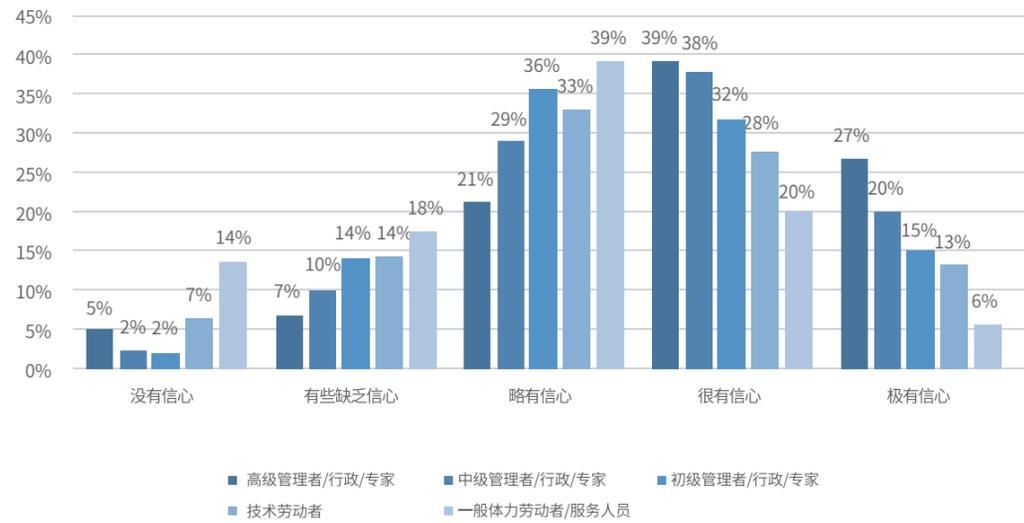


图 3.19 未退休者工作级别与退休信心程度

个人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受访者本身的财务状况，但由于中国居民普遍比较注重家庭的概念，人们通常更在乎家庭整体的财务状况，因此如果以家庭收入作为高、中、低收入的划分标准，并分析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受访者的退休信心，我们能够得到关于财富水平怎样影响退休信心的结论。从图 3.20 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收入越高的人群普遍对退休生活的舒适度更有信心。这也印证了收入主要通过改善人们的财务状况而提升人们对于退休生活舒适度的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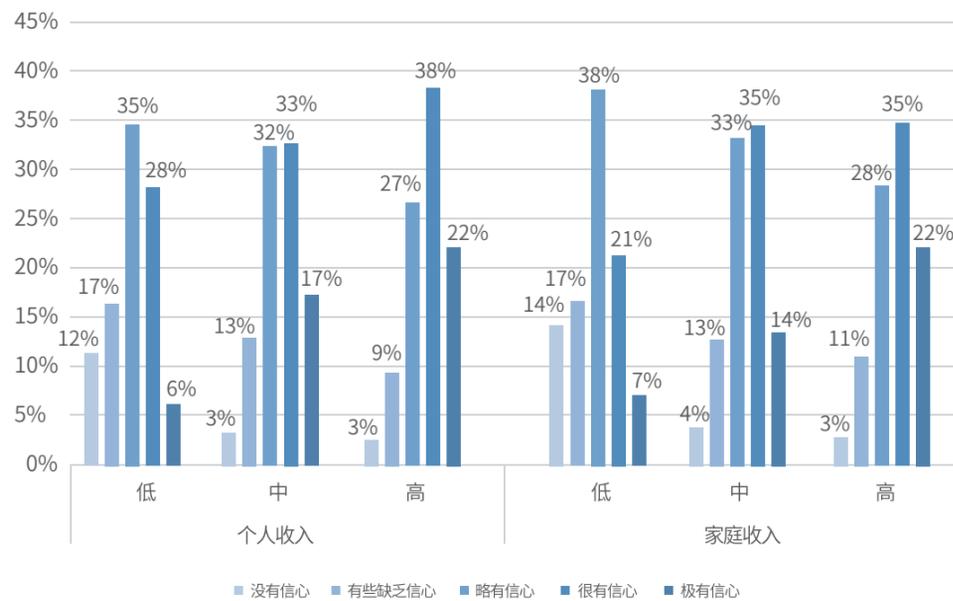


图 3.20 未退休者收入水平退休信心

3.4.4 对后代的退休生活信心：对后代退休信心相对保守

我们向受访者询问他们认为今后几代人退休时的生活情况会更好还是更坏，以考察受访者对于今后几代人退休情况的预期。如图 3.21 所示，有 52%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几代人的退休生活情况会更好，这一比例与 2020 年相比下滑了 9%，认为未来后代的退休生活情况将变得更差或者基本一致的受访者比例与 2020 年基本持平。即便今年我们为受访者新设置了“不清楚”这一模糊选项，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可以初步判断出**中国居民对于后代的退休生活水平的预期相对保守**。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式严峻，未来中国可能面临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家庭、社会养老负担加重的压力，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了人们对于未来几代人退休后生活的信心。但与此同时，选择“更差”这一选项的比例降低了 1 个百分点，并且有更多人相信未来几代人的退休生活与当今退休者的生活情况将没有什么不同，这都表明了中国居民对未来几代人退休形势并不悲观，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趋势下，人们相信未来几代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将有所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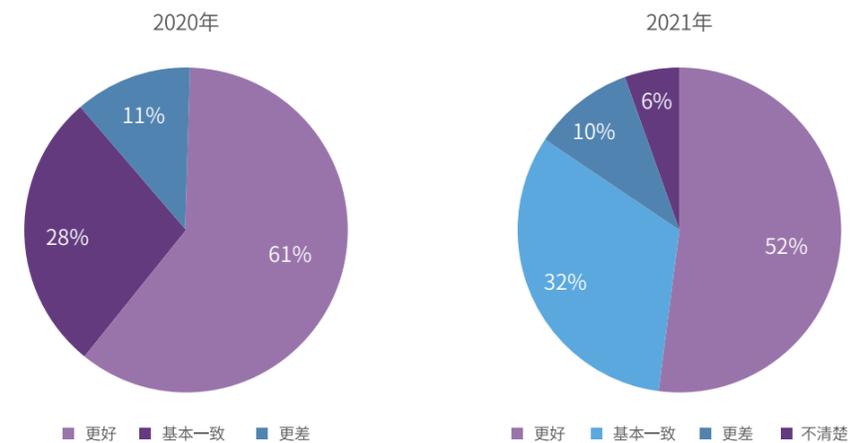


图 3.21 受访者对于后代退休情况的预期



3.5 退休生活压力

3.5.1 退休压力来源：压力来源多样化，身体健康状况是首要担忧

为了探究人们退休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压力来源，我们为受访者列举了 13 个选项，并让受访者选出会让他们对退休生活产生担忧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让受访者对退休生活感到有压力的前三因素分别是“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能保持活力”、“孤独，无人陪伴”，被选中的比例分别为 40%、30% 和 26%，这三个因素主要与人们的身体、心理健康以及心态相关。人们普遍比较担心自己退休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另外，如果不能有充沛的精力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缺乏他人的陪伴，人们也会担心退休生活的枯燥和孤独。

我们列举的其他种种因素被选中的比例分散且平均，包括生活自理、生活方式及习惯、财务状况、退休心态等等因素都能够让人们对于退休生活产生担忧，其对应选项的被选率集中在 17% 到 23% 的区间，说明在身体健康这一首要因素之后，人们退休生活的压力来源十分多样化、差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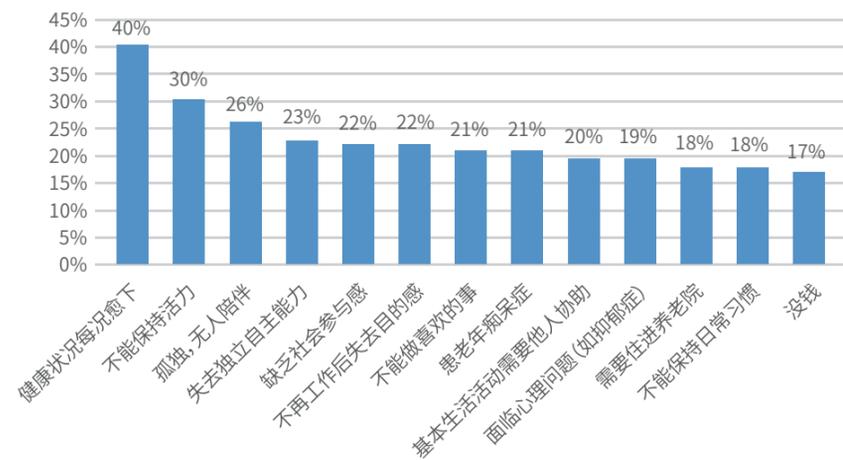


图 3.22 中国居民退休压力主要来源

3.5.2 退休财务压力：退休后财务压力普遍存在，但强度较低

人们退休后也需要足够的收入来保证自己的退休生活的舒适，然而离开工作岗位后，人们可能会经历收入上的下降，进而产生财务方面的压力。为了考察中国居民预期到或感受到的退休后来自财务方面压力的强度，我们向受访者询问了他们为退休后收入而担心的频率，并主要考查了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对于退休财务压力的感知有何不同。

结果如图 3.23 所示，中国居民普遍来说对于退休后财务压力的感知强度较弱，主要集中于至少每月一次或每季度一次。总体而言，青年人相比于更年长的群体更容易因为退休后的收入问题感到焦虑。但更大的年龄段体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现象，随着年龄增长至大多数居民刚刚

退休或接近退休的 55-64 岁这一年龄段，有 4% 的处在该年龄段受访者每天都会为退休后的收入而焦虑，但也有 26% 的受访者从不为此担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退休这一概念离青年群体较为遥远，他们当前的收入或生活状况与退休后的财务状况关联度较低，他们感知到的压力还比较遥远、强度也不大；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年长受访者退休后的收入情况基本确定，生活状态也已经接近定形，如果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足，那么他们就不会对退休后的收入问题感到困扰，而条件相对更困难的老人则会感知到十分现实、十分具体、高强度的退休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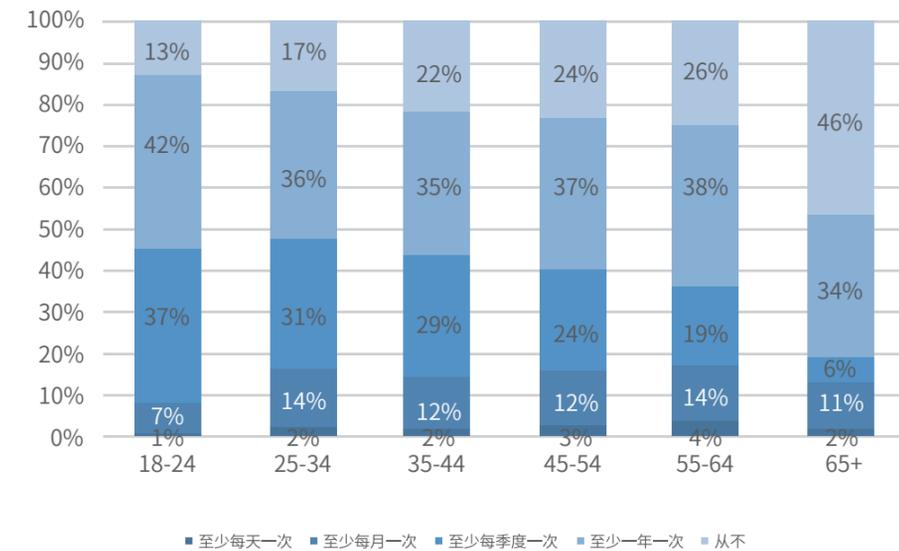


图 3.23 受访者感到退休财务压力的频率

3.6 退休与健康

3.6.1 退休后健康困扰：普遍对退休后身体健康状况表示担忧

在问卷中我们让受访者描述了自己年老时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程度。总体而言，中国居民对于身体健康较有忧患意识，仅有 11% 的受访者表示不担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达了较强的担忧（非常担心或极度担心）。

分年龄段来看，我们发现年轻人对于自己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有比平均水平更高的担忧，年龄段为 18-24 岁的受访者有 14% 的比例表示自己对于老年时期的身体健康极度担忧，仅有 6% 的 18-24 岁受访者表示不担忧，这一数字在各年龄段当中最低。而中年受访者对健康状况普遍更有自信，其中对老年后健康状况最自信的群体是 45 岁 -54 岁年龄段的居民，有 19% 的比例表示自己对于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丝毫不担忧，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而调研中年龄最大的一组受访者则表现出了最强的担忧，有 25% 的比例的 65 岁以上受访者表示自己对于老年后健康状况极度担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随着年龄增长至比较高龄的阶段后逐渐开始遇到了健康问题，因此对于健康问题的感知更加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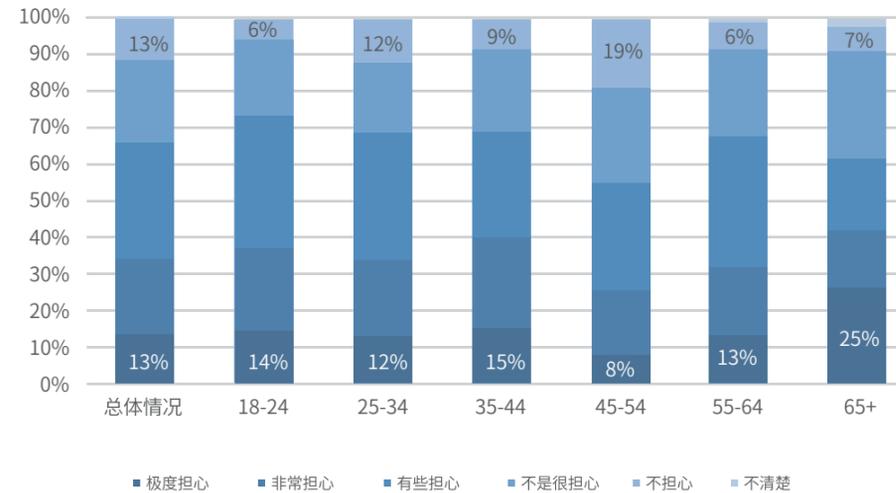


图 3.24 受访者对健康状况的担忧程度

3.6.2 退休后健康习惯养成：缺乏专业指导，工作压力为主要阻力

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维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态十分重要。中国居民普遍对退休后的健康状况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因此对于养成健康的习惯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接下来我们探究了有哪些客观因素影响了中国居民对健康习惯的养成和追求。我们列举了一些可能的阻碍因素，并让受访者在其中选出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追求健康。

得票率第一的阻碍因素是“工作忙碌”，有 25% 的受访者认为忙碌的工作阻碍了自己更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排在第二、第三、第四的因素分别是“不知道做什么”，“容易被周围人的不健康行为影响”、“难以改变坏习惯”。从问卷结果可以看出，人们可能会因为工作原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自己的健康，其次，人们即便有意识去照顾自己的个人健康，也可能缺乏指导和积极的影响而不知所措，被身边人的不健康行为印象，或者是自己没有毅力来改变坏习惯。这一现象提醒了我们**中国居民的健康生活的积极性依赖于周围环境的带动，健康习惯的养成较为需要引导**。社区、雇主可以加强注重个人健康的氛围营造，这样有助于促进中国居民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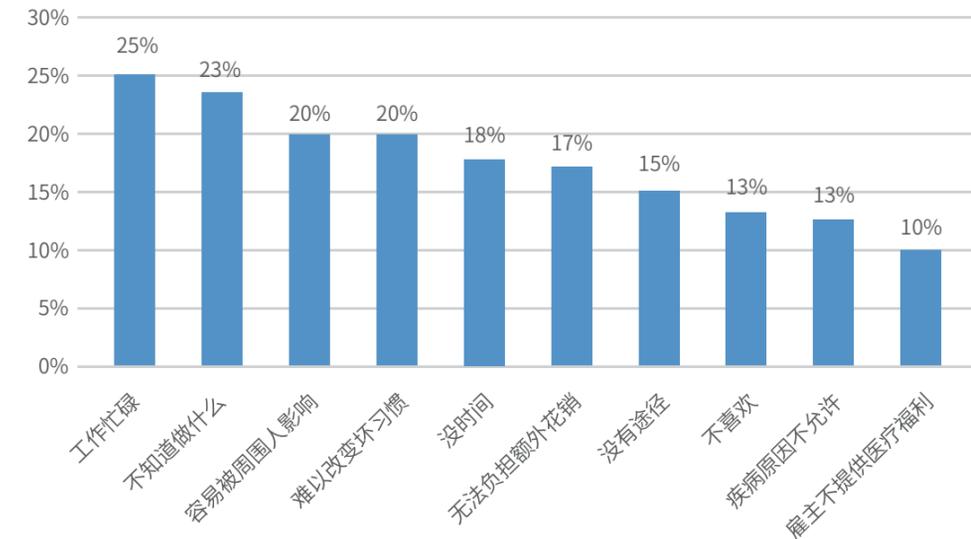


图 3.25 受访者不注重健康习惯的原因

3.6.3 对雇主健康支持的期待：期待健康配套设施和锻炼机会

雇主可以作为促进中国居民注重健康的一个切入点，雇主一般也会为雇员提供身体健康相关的支持。为了探究人们希望能够在工作单位享受到怎样的健康福利，我们为未退休的受访者列举了一系列可以在工作场所开展的健康保健项目，并让他们选出最能吸引他们的健康保健项目。最受欢迎的 5 项保健项目如图 3.27 所示，人们最希望工作场所能够提供检测身体健康指标（身体质量指数 / 体重减轻、胆固醇水平、血压）的工具，这体现出了**人们对于身体健康的关注有一定的自觉性**。其次，人们希望公司能够组织户外活动、锻炼身体的机会，或者提供锻炼场所的折扣，为自己实现健康目标创造便利条件和外在激励。最后，人们也对被动式的健康支持十分感兴趣，比如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工作区和参与健康保健相关教育，**工作环境的改善和健康知识的输入都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中国居民的健康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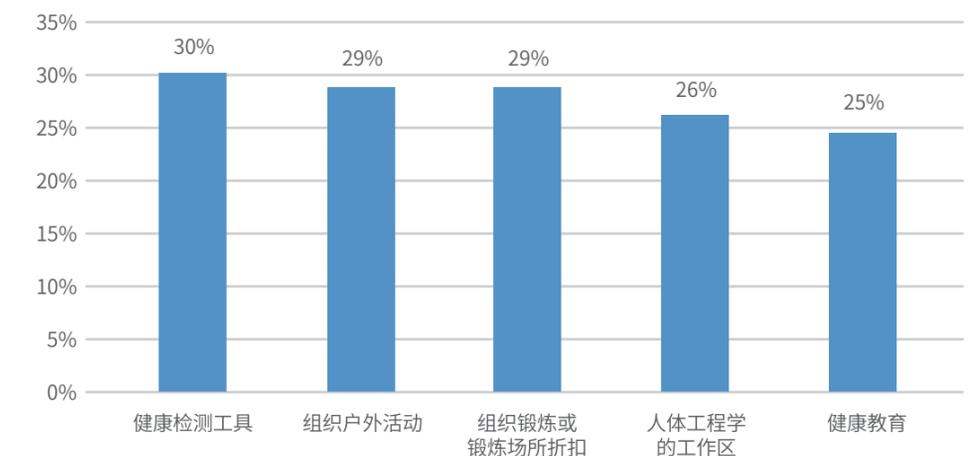


图 3.26 受访者对工作场所健康保健项目的期待



0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

4.1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为了对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科学评价和分析，我们选取了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六个指标作为退休准备指数的衡量标准，并赋予相应权重，构建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退休准备指数的取值在 0-10 之间，数值越大表明退休准备越充分，其中 8-10 为高准备指数，6-7.9 为中等准备指数，6 以下为低准备指数。



4.1.1 2021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继续上升

2021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6.78，相较于 2019 年的 6.15 和 2020 年的 6.23 继续提升，达到 2016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具体观测每一个指标，可以发现除去“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稍有下降，大部分指标中高分段（4~5 分）受访者人数占比明显增多，这也是中国居民整体退休准备指数上升的背后因素。即使如此，我们发现各指标高分段（5 分，即准备最完全）的居民占比仍未达到理想水平，表明中国居民在财务能力、退休计划和退休储蓄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还发现在具体退休准备行为的问题中，受访者准备程度有所下降，说明我国居民部分退休准备意识可能尚未落实至行动上。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帮助。



图 4.1 2016-2021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5 计算方法详见附录 1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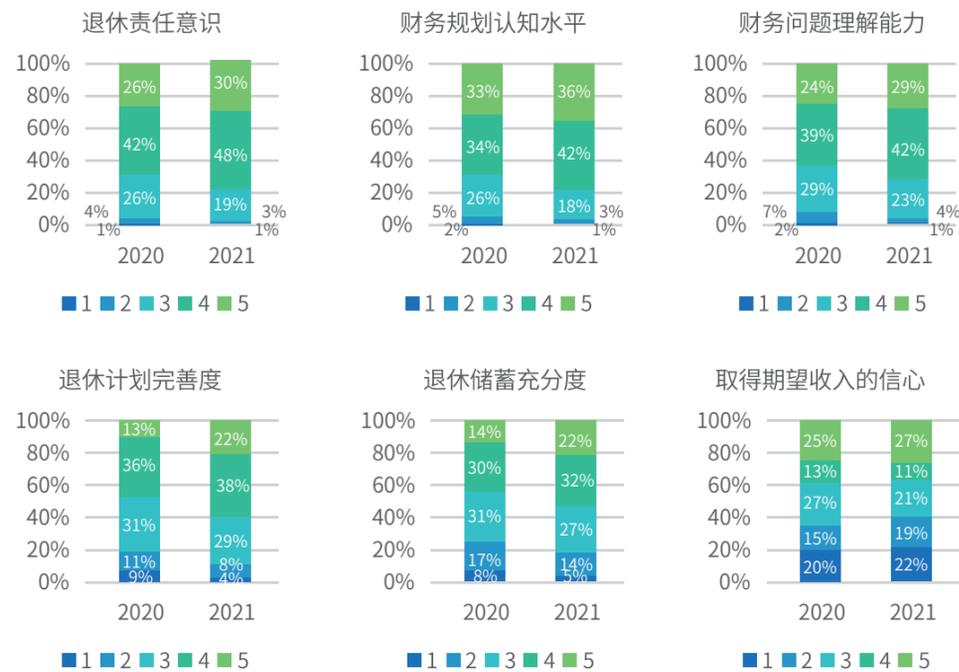


图 4.2 2020 与 2021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各部分得分情况



首先，2021 年中国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高于 2020 年。我们将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分为最强、较强、中等、较差和最差五个类别。其中，有 78% 的居民处于责任意识中等偏上水平，占受访者比例最大；而责任意识最强的群体在受访者中占比 30%，虽然有所提高，但整体来看不足半数，仍有提升空间。以上数据说明，较多居民认为自己应该为退休后的收入负大部分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退休责任的提升主要由于居民在财务收入方面更为自立，更具有责任感，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财务依赖降低。报告 6.2 的退休责任分析将会进行更细致的阐述说明。

其次，2021 年中国居民的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较上年度均有较大提升。2020 年处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初期，中国居民可能因为准备不足，缺乏应对能力，受访者财务规划认知水平指数仅 1.29，财务问题理解能力指数 1.06；2021 年，居民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做好资金使用预算，有意

识地为可能发生的疫情灾害做提前储蓄，这些提高了居民财务方面的准备意识，因此两个财务相关的准备指数提升较大，分别提升至 1.39 和 1.13。

然而，对比 2021 年两组数据，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高分段受访者占比 29%，较大幅度低于财务规划认知水平高分段受访者占比的 36%。这说明中国居民在退休财务方面有较强的准备意识，但可能受限于受教育水平和信息获取渠道，无法学习财务相关的基本知识，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不能达到高标准。

同时，2021 年中国居民退休计划完善程度高于 2020 年水平。在这个指标上，高分段的受访者占比依然不高，占比 22%。而在退休规划的制定情况方面，中国受访者有 21% 的居民有详尽的书面计划，超过半数的居民处在“有计划，但没有书面落实”的阶段，这与计划完善程度的统计数据基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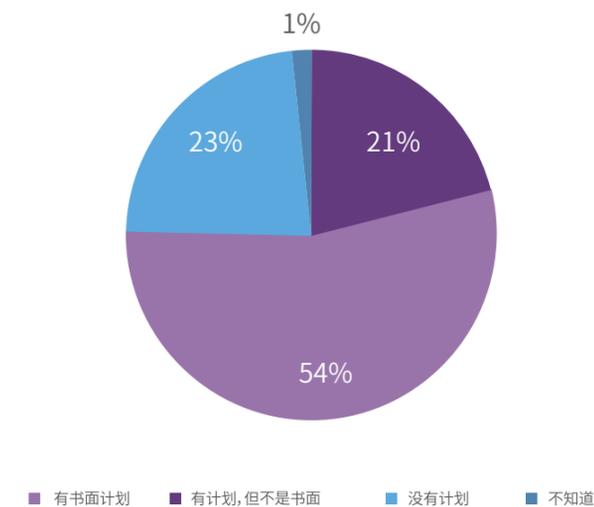


图 4.3 中国受访者退休计划制定情况

在退休储蓄方面，2021 年中国受访者的准备充分度高于 2020 年。准备充分度高是指受访者为退休储蓄了充足的资金，这部分储蓄受到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在促使人们进行退休储蓄的原因中，雇主的帮助尤为重要。47% 的受访者表示，雇主和工作单位在员工养老金、退休计划方面的支持成为他们进行退休储蓄的主要动力。因此，工作单位的员工退休相关福利政策有望提升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除此之外，33% 的受访者表示“到达年龄”是自己开始进行退休储蓄的原因，“开始新工作”和“组建家庭”也能有效激励居民为退休生活进行储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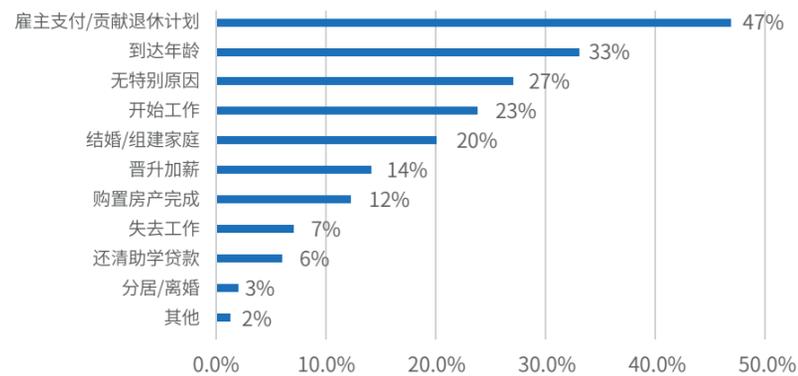


图 4.4 促使中国受访者退休储蓄的原因

而在限制中国居民退休储蓄准备的原因中，占比最多的是“正在为更紧迫的事项进行储蓄”，如购房、进行其他家庭规划等等，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和收入不足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大阻碍原因。中国社会家庭成员之间更紧密的纽带使得其在财务方面需要为家庭更多考虑，在家庭甚至庞大的家族中有成员面临资金短缺时，中国居民往往提供支持，这削弱了居民为自己退休后生活储蓄的准备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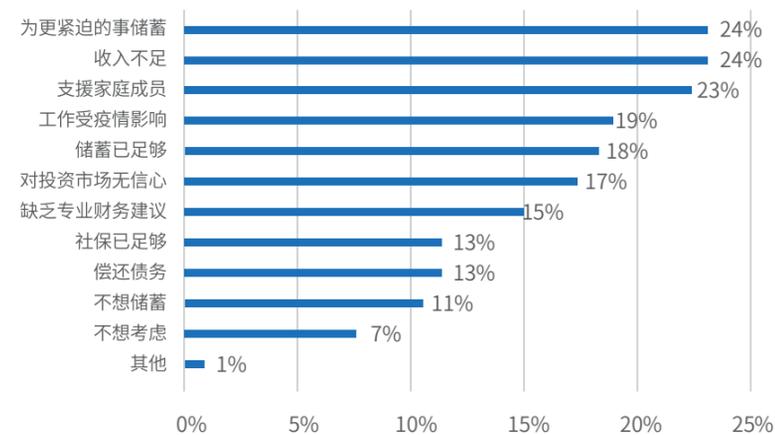


图 4.5 阻碍中国受访者退休储蓄的原因

中国居民整体对于退休后取得预期收入的信心下降。尽管最高分段的居民人数占比 27%，较上年度有所提升，但低分段人数也相应增多，完全失去信心的居民占比 22%。我们分析了 2020 年和 2021 年居民预期最重要的退休收入来源，对比数据后发现，虽然 2021 年居民预期的退休收入更加依赖于社保养老金，但在公司养老金、储蓄、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单等能够产生持续稳定收益的项目上依赖程度均有明显下降。居民预期退休收入来源变窄，多元化程度下降，这可能是 2021 年中国居民取得预期收入信心下降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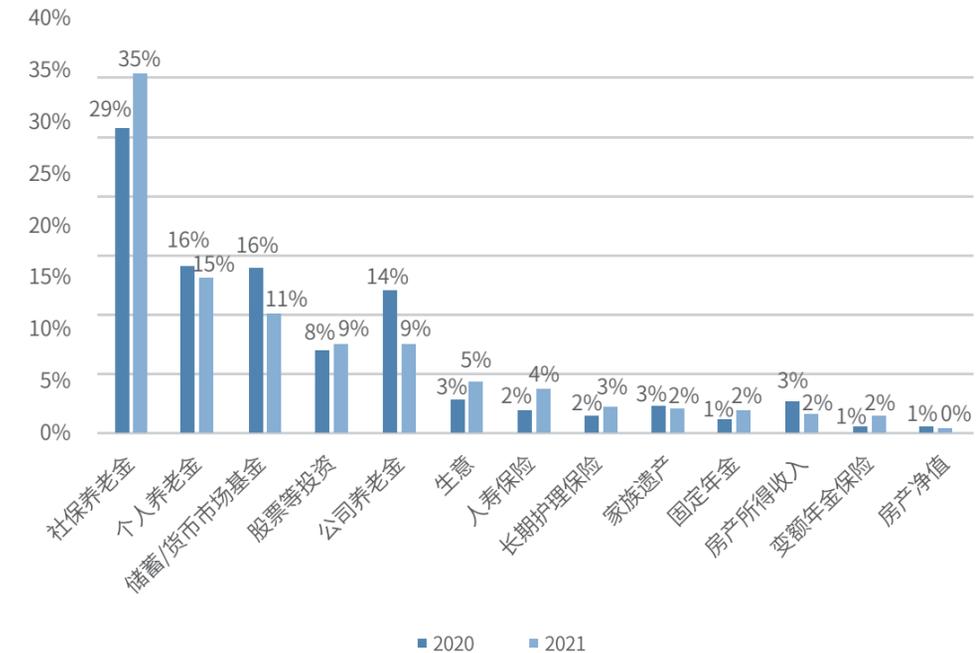


图 4.6 中国居民退休后最主要收入来源

4.1.2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全球排名上升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世界排名在 2021 年度有所提高，在被调查的 15 个国家中仅次于印度和美国，位列第三，相较 2020 年的世界排名第四有所上升。

细分各个指数来看，中国与世界居民平均的退休责任意识差别不大。中国居民的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较大幅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居民取得退休后期望收入的信心较大幅度低于世界水平。22% 的中国受访者表示自己完全不确定退休后收入是否能达到预期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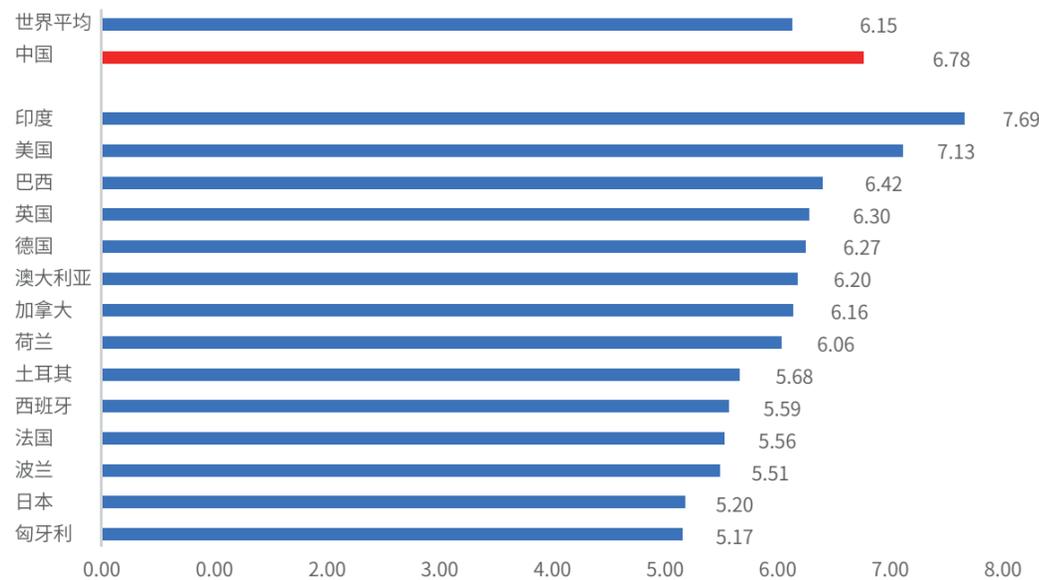


图 4.7 2021 年世界各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我们还发现，**2021 年全球各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较 2020 年整体上升**，代表国家的平均值由 2020 年的 5.95 升至 2021 年的 6.15。从全球发展的大背景而言，这可能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所致；此外也可能受到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扩张蔓延的影响，各地居民在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过程中提高了危机意识，从而更多地从退休计划、退休责任、财务规划等方面提高退休准备度。

发达国家 2021 年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多处于平均值 6.15 之下，而发达国家中几个大型经济体——如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准备指数高于平均值。我们推测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受到经济水平和经济期望两方面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由于退休后社会福利不如发达国家优渥，居民会进行比发达国家更充分的退休准备；而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较大，居民有所感知后也会进行较为充分的退休准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4.1.3 国内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的比较

为比较国内不同地区居民退休准备的差异，我们对各省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21 年各省居民的退休指数与 2020 年存在一些差异，个别省份的变化引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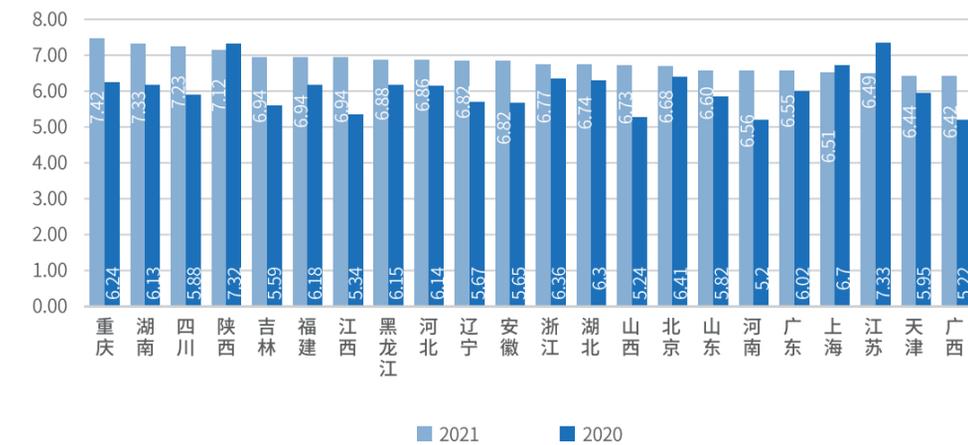


图 4.8 部分地区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可以看出，相比 2020 年，2021 年各省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波动较大，其中江西省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比 2020 年上升了 1.6，是所有省份中变化最大的；其次是山西省和河南省，分别上升了 1.49 和 1.36。

从整体排名看，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今年不再位居前列，各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排名与往年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各地区指数间的差异再次拉大，极差由 2.13 增加到 2.21，标准差由 0.59 下降到 0.54，可见 2021 年不同地区居民的退休准备水平仍处于不均衡。这种变化我们估计主要是因为受到了短期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长期看地区间退休准备指数的均衡性会逐步提升。

4.2 高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根据 2021 年调查结果，中国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具有部分相似特征。男性居民退休准备指数高于女性，但双方差距较小；从收入来看，高准备指数人群更多在高层级岗位就业，具有稳定的、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从教育背景来看，高指数人群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健康方面来看，高指数居民具有更多的健康习惯，且更重视退休后的医疗储蓄。

整体来看，**高准备指数人群具有较为年长、已婚且家庭稳定、所处地区欠发达、高层岗位就业、生活收入充裕稳定、受教育水平高、生活习惯健康等特征**。在下文中，我们将对高准备指数人群的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4.2.1 个人特征：性别差异基本消除，准备指数随年龄增长

2021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男性略高于女性。继此前 2018、2020 年女性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超过男性居民后，退休准备指数的性别对比重新回到长期以来男高女低的水平，但差距明显缩小。我们认为，**近年来退休准备指数已不再存在固化的性别差异**，即将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和家庭地位的提升可能使得女性居民整体对于退休计划和退休后的生活有了更加充分的准备。

中国女性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方面明显优于男性，这也是 2017 年以来女性居民优于男性居民的几个指标。而在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则有一定差距。



图 4.9 不同性别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在年龄方面，与往年调查结果相似，越接近退休年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越高。从退休准备指数的六个构成要素来看，由于年龄产生的退休准备差异主要体现在“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准备充分度”两个维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和更多的储蓄来进行退休计划的完善；同时，随着退休的临近，人们退休后收入、退休相关政策和退休后生活情况的不确定性大幅降低。而另一方面，对于年轻的群体，由于缺乏对未来的预期和财务储蓄，他们对于财务规划的完善度和退休准备的充分度相对较低。

4.2.2 家庭特征：已婚的稳定家庭指数更高

已婚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最高，为 6.95。主要原因是已婚家庭夫妻双方保持正常就业的情况下，退休储蓄较为充分，“退休储蓄充分度”这一指标显著高于其他群体，退休后的收入来自于夫妻双方，故取得预期收入的信心也较高。同时，在和睦家庭环境中，居民生活较为稳定，不易出现巨大波动，更有利于居民形成完善的退休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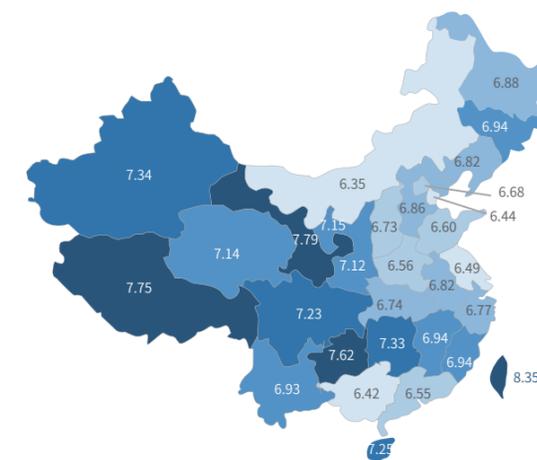


图 4.10 不同婚姻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4.2.3 地域特征：西部欠发达地区指数更高

我们按照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分布情况，对各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区域划分，并且分别计算不同区域的退休准备指数，再进行对比。可以看出，**2021 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较上年度降低，低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我们认为，西部地区居民的退休收入中来自政府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相对较大，居民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度和信任度相对比较高。因此，居民退休后财务收入的不确定性较低，可以据此制定更加详细完备的退休计划，对退休收入更有信心。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对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及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都相对较强，这对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也是重要的。但总体来看，在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波动之下，退休收入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作用，导致西部地区居民退休准备指数高于东部地区。



4.2.4 工作特征：高层级工作、收入满足基本生活的居民指数更高

高层级工作者退休准备指数较高。平均来看，高层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或专业人员退休准备指数 7.50，在所有类型工作者中居首。高层级工作者的优势在各个指标均有体现，特别是稳定而待遇优厚的工作使得其拥有充分的退休储蓄，高层环境中的防老意识和享受意识使其有更高的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更完善的退休计划，高层级工作者普遍较高的能力和知识储备也增强了其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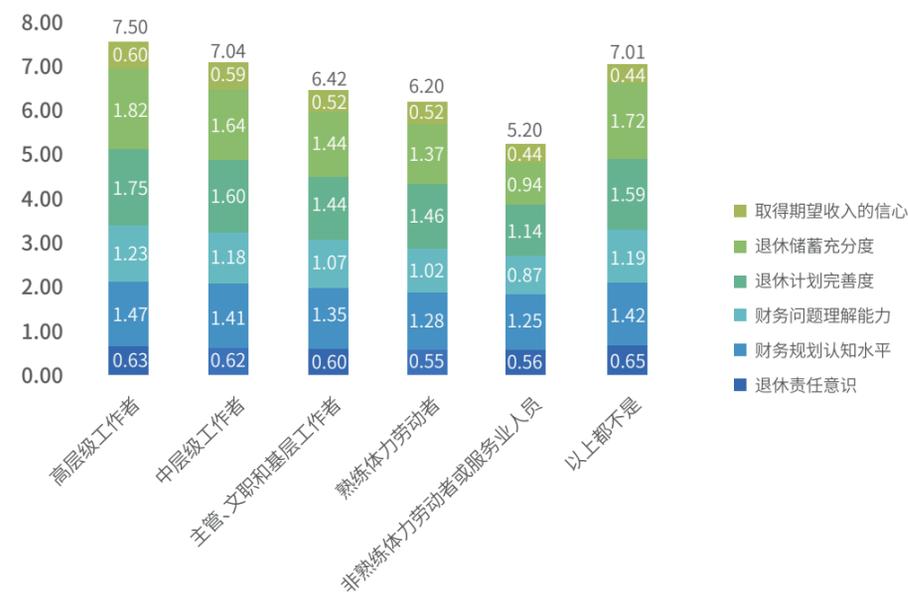


图 4.12 中国不同工作性质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和居民的个人税前年收入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两个变量拟合优度 R^2 为 0.7189。调查将个人税前年收入分为 27 个区间，在统计结果分析中，我们计算了每个收入区间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平均值，并绘制在下方的散点图中。在大约 0-10 万元的个人税前年收入区间内（即图中红色点及其左侧部分），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增长幅度较大，表明在这个范围内收入对于居民的退休准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高于 10 万元的个人税前年收入区间内（即图中红色点及其右侧部分），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增长放缓，且存在波动。以上结果可以说明，**在基本生活花销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时，居民的退休准备受到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在生活水平达标转向生活富裕的过程中，居民的退休准备受到收入增长的影响较小，居民可能根据自我喜好，在当下生活享受和退休后生活享受之间进行收入分配。**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和居民的家庭税前年收入也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两个变量拟合优度 R^2 为 0.7681。调查将家庭税前年收入分为 27 个区间，在统计结果分析中，我们计算了每个收入区间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平均值，并绘制在下方的散点图中。根据相关系数计算，家庭税前年收入对于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弱于个人税前年收入，同样呈现出“低收入区间影响显著，高收入区间影响较小”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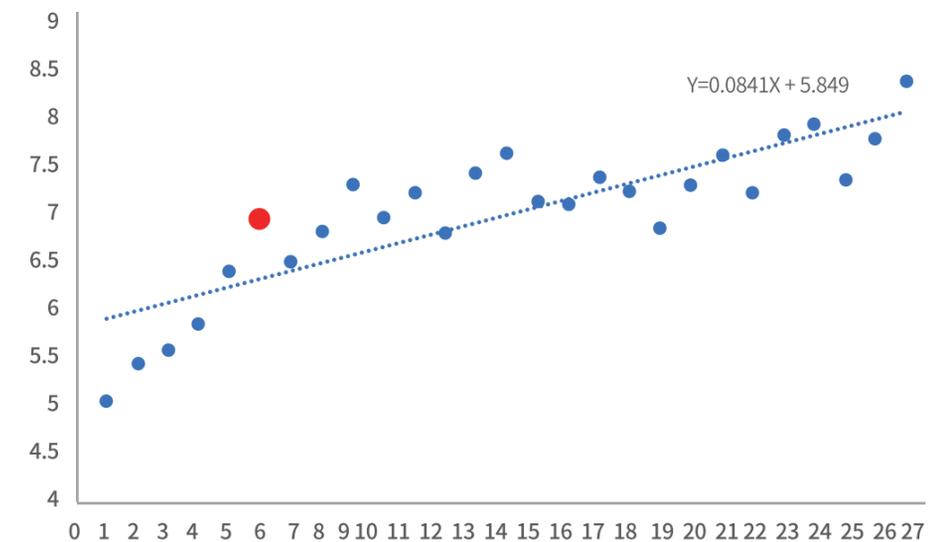


图 4.13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与个人税前年收入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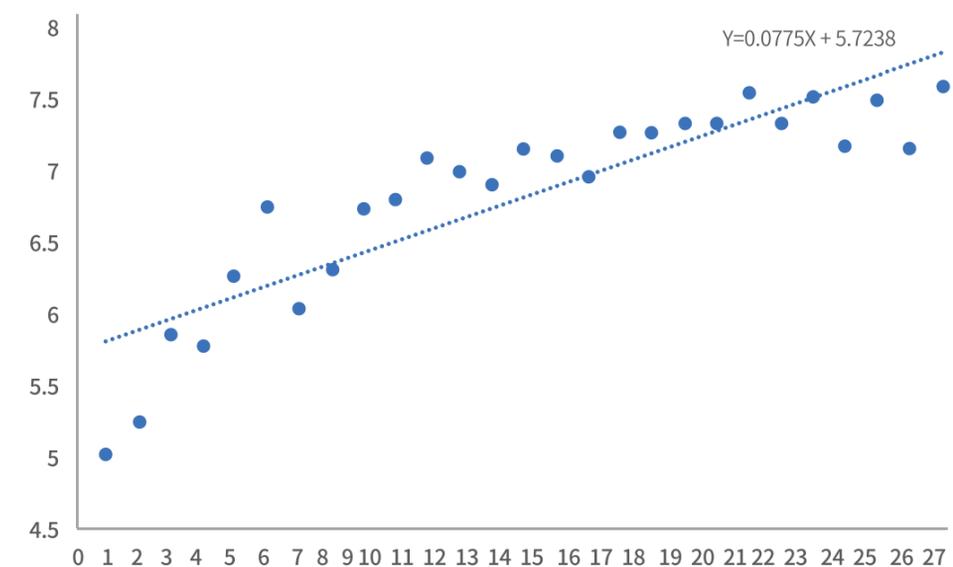


图 4.14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与家庭税前年收入的相关性

此外，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居民的工作带来较大影响，5% 的受访者历经失业后找到新工作，26% 的受访者经历一段时间的待岗，5% 的受访者工作时间减少并永久减薪，其余 64% 的受访者未受到任何就业方面的影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就业状况未发生任何变化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显著较高**，平均值为 6.98。相比之下，就业受到疫情影响的居民退休准备明显不足，重点原因是收入和生活保障的下降，这也可以说明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对退休准备程度的正面作用。

4.2.5 教育特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指数更高

接受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小学教育水平的受访者较少，仅有 3 人，数据结果可能受到样本容量中一个异常值的影响。除此之外，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并在博士群体中达到了 7.79 的最高水平。

从各个细分指数来看，受教育影响最大的是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受教育者更易获取与财务相关的培训和知识储备，进而拥有更好的财务素养，在退休时有更充分的财务准备。因此，提升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可以从财务的相关培训入手，使居民有更多机会接受有关教育。此外，退休责任意识、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也与受教育程度存在较大相关性，这些可能是在居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心理思想状态发生变化，自身责任感增强使得退休责任意识增强，同时自我能力素养的提升带来了更大的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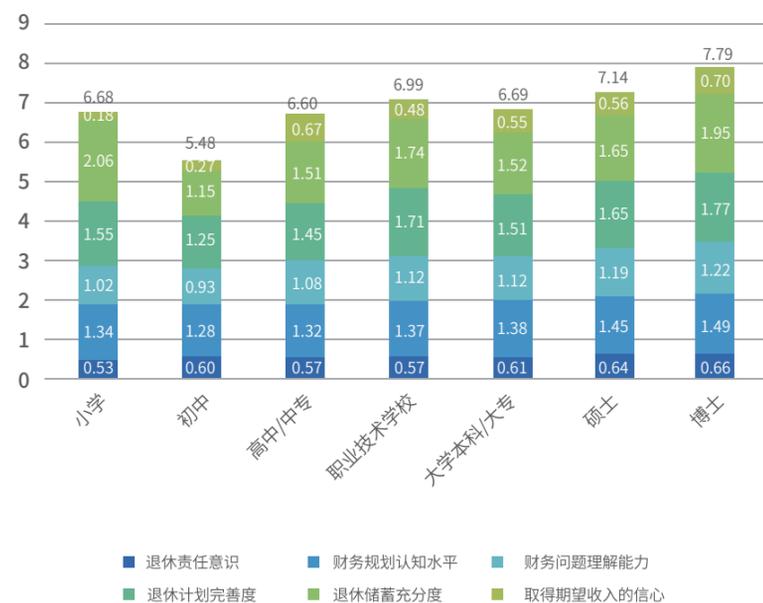


图 4.15 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4.2.6 健康特征：高指数居民的健康习惯良好，医疗储蓄重视度高

高退休准备指数居民更注重健康习惯。按照退休准备指数将居民分为三个群体：准备指数低于 6 的低准备指数居民、准备指数在 6 到 8 之间的中等准备指数居民和准备指数超过 8 的高准备指数居民。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各类居民的健康生活习惯，我们发现，在以下六个大类的健康习惯中，低准备指数人群人均拥有 2.75 个习惯，中等准备指数人群人均拥有 2.88 个习惯，高准备指数人群人均拥有 2.96 个习惯。随着指数的上升，居民健康习惯的数量具有增加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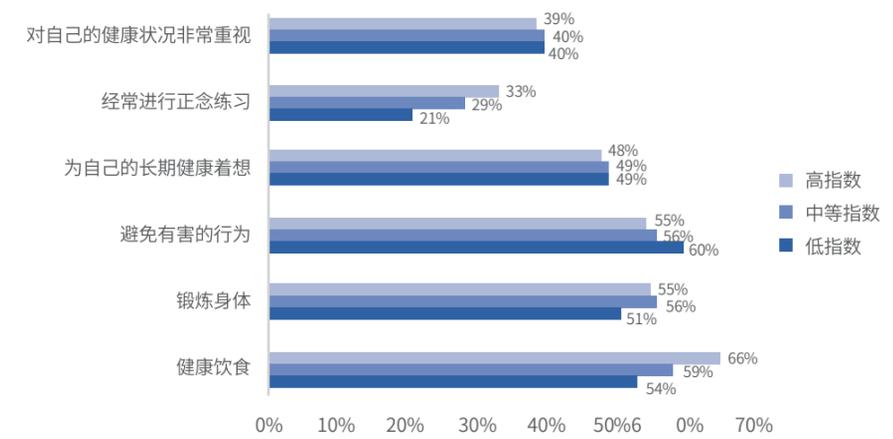


图 4.16 高、中、低退休准备指数受访者的健康习惯

分项来看，高退休准备指数的居民在健康饮食和正念练习（包括冥想和放松运动等）两个健康行为上具有明显更好的习惯。66% 的高退休准备指数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具有健康饮食的习惯，高于中等指数和低指数人群中的 59% 和 54%；33% 的高准备指数被调查者经常进行正念练习，高于中等指数和低指数人群的 29% 和 21%。

高退休准备指数居民较少担心自身老年后的健康状况。根据调查结果，将“对自己老年后健康状况的担心程度”由低到高分 1~5 五个等级，低准备指数居民健康担心指数 3.18，中等准备指数居民健康担心指数 3.01，高准备指数居民健康担心指数 2.93。随着退休准备逐渐充分，居民能够对维护自身健康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对于自身健康状况和医疗情况有所了解，对于年老后健康状况的担心程度有所下降。

在医疗费用储蓄方面，高退休准备指数的居民明显更加重视这份储蓄。高达 71.84% 的高退休准备指数居民表示会将医疗费用纳入退休储蓄计划，此比例在中等指数和低指数受访者中仅有 68.22% 和 64.20%。



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

05. 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

5.1 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

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多支柱养老金制度改革模式的研究和探索，并于 1994 年 10 月发表的《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报告，首度提出了“三支柱”养老金制度改革模式，其实质是政府、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养老责任。此后，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并建立了这样的体系。当前，中国也在积极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又涵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专门为职工建立的附加保险；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政府给予税收优惠、以个人名义自愿参与的养老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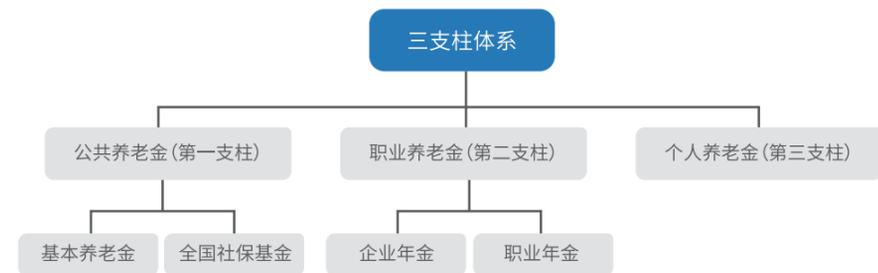


图 5.1 中国居民退休后最主要收入来源

5.1.1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构成我国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由省级政府管理、现收现付的统筹账户制度。目前基本养老保险由两大部分构成，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城镇，凡是有单位的职工和部分自愿的个体工商户均被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中。其中，有雇主的职工缴费模式是雇主缴纳职工工资的 20%，划入社会统筹，雇员缴纳个人工资的 8%，划入个人账户进行积累，个体工商户仅缴纳 20%；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由以前的城镇居民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合并而来。凡是没有固定收入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被纳入城乡居民保险计划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下，基础养老金均由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承担，参保人个人缴费不仅能够享受地方政府的补贴，还可以享受村集体组织、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与个人的补助或资助，个人缴费与各类补贴、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广，基金收支规模大，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核心。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高，全民覆盖率达到 70.7%。截至 2020 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0 亿人，同比 2019 年增加 0.3 亿人，其中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高于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但城镇职工的基本规模远高于城乡居民：2020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4.6 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5.4 亿人；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占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的 90.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占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的 9.8%。我国基本养老金收支规模庞大，截至 2020 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 4.9 万亿元，支出达 5.5 万亿元，累计结余 5.7 万亿元。高覆盖率及庞大的收支规模决定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一支柱在我国养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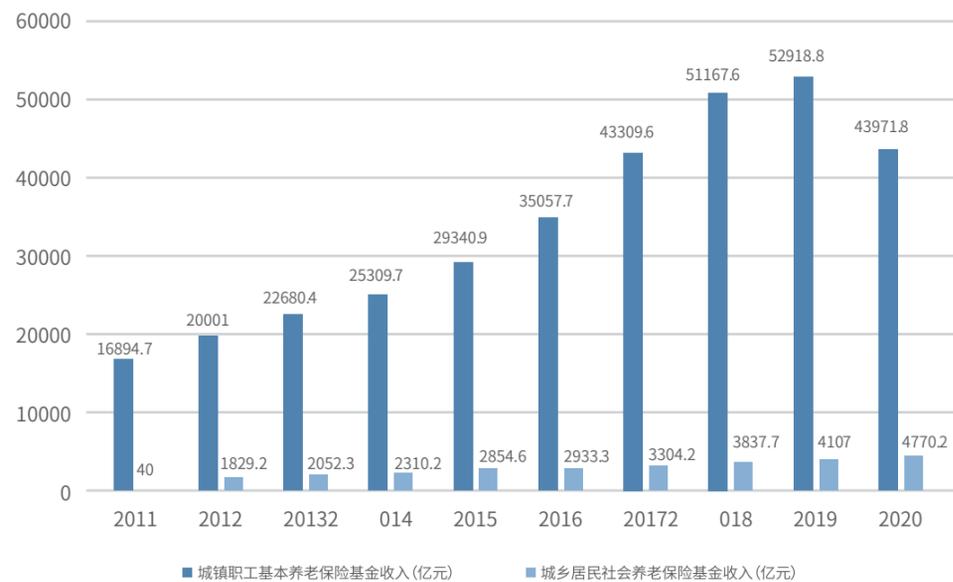


图 5.2 基本养老金收入基本规模及占比⁶

5.1.2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方案构成了我国养老金体系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企业缴费、职工个人缴费和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账户方式进行管理，采取市场化投资实现企业年金基金的保值增值。

职业年金是为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提供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职业年金计划适用的单位和工作人员范围与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一致。职业年金基金构成包括单位缴费、个人缴费、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收入。

我国企业年金规模相对 GDP 比重较低，职工参与率及企业覆盖率较低。截至 2020 年，我国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达 2.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1%，占 GDP 比重仅为 2.21%，与丹麦、瑞士、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年金资产占 GDP 比重超过 60% 的情况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此外，我国企业年金的覆盖率水平较低。根据人社部统计，截至 2020 年，我国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数为 10.5 万个，不到全国法人单位的 1%。参加企业年金职工人数仅有 2718 万人，仅占参与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 2.72%。企业年金覆盖率较低，主要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占比较高，而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高和税务优惠措施不足导致中小企业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动力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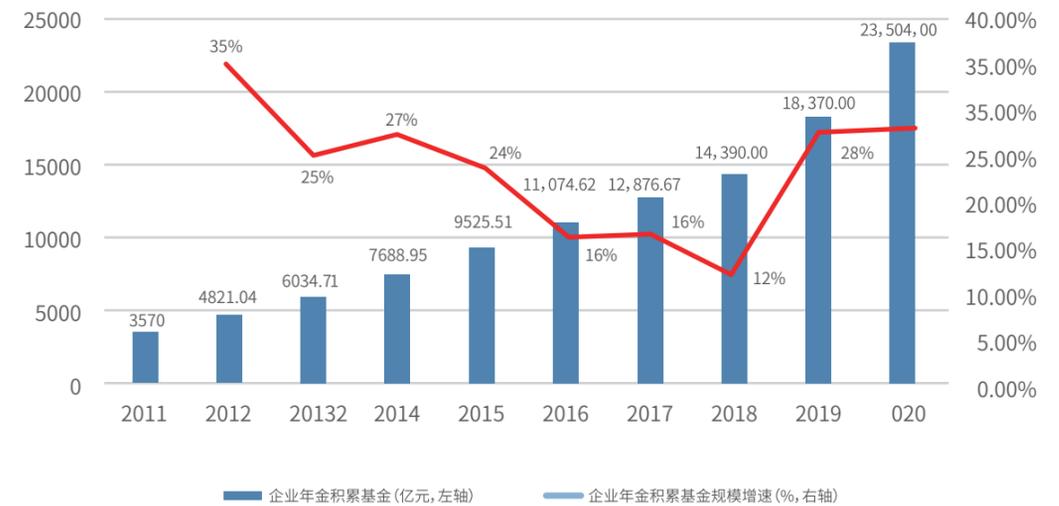


图 5.3 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增速及占 GDP 比重⁷

职业年金覆盖率广，但提升空间有限。据人社部统计，截至 2019 年 5 月末，职业年金累积结余规模约 6100 亿元，参与职工共计 2970 万人，在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 3612 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占比超过 82%；参与职工中，缴费人数达 2867 万，缴费率超过 96%，职业年金覆盖率较广，但覆盖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

5.1.3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我国养老体系第三支柱为个人养老金，2018 年开启税延养老保险产品的试点。2018 年 4 月，我国在上海、福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展个人养老金税延试点，对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规定商业养老产品采取缴费和投资环节的税收优惠。2021 年 2 月，在国新办举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中，人社部表示，要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2021 年 5 月，监管部门发布《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专属商业养老试点政策落地。

税延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个人通过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一定标准内税前扣除；计入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领取商业养老金时再征收个人所得税。具体规定包括：（1）个人缴费税前扣除。取得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其缴纳的保费准予在申报扣除当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限额据实扣除，扣除限额按照当月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的 6% 和 1000 元孰低办法确定。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其缴纳的保费准予在申报扣除当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限额据实扣除，扣除限额按照不超过当年应税收入的 6% 和 12000 元孰低办法确定。（2）账户资金收益暂不征税。计入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在缴费期间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3）个人领取商业养老金征税。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可按月或按年领取商业养老金，领取期限原则上为终身或不少于 15 年。个人身

⁷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故、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全残或罹患重大疾病的，可以一次性领取商业养老金。对个人达到规定条件时领取的商业养老金收入，其中 25% 部分予以免税，其余 75% 部分按照 10% 的比例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计入“其他所得”项目。

前期的养老税延试点优惠力度有限，规模不大：2020 年，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进展平稳，截至 2020 年 4 月底，共有 23 家保险公司参与试点，19 家公司出单，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3.0 亿元，参保人数 4.76 万人。尽管试点进展较为平稳，但业务总体规模不大，市场普遍反映政策吸引力不足。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积极协调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完善税延保险试点政策，扩大试点地区范围。

5.1.4 我国三支柱体系发展现状

基本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财政负担加重。在现有的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上，养老金的收支过度依赖人口的年龄结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深化，将为养老金带来巨大的资金负担。以中国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缴费者多且老年人少，资金压力较小；但根据目前对 2050 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相比于 1953 年，60 岁以上人口比重将大幅增加，届时缴费者少且老年人多，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将难以为继。

基本养老金保障水平有限，替代率水平较低。养老金替代率 = 人均养老金收入 / 平均工资收入，用以衡量养老金的保障水平。2020 年，城镇职工养老金支出 5.13 万亿元，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职工人数为 1.276 亿人，平均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为 3350.3 元，当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月均工资为 8114.9 元，替代率仅为 41.3%，不足 50%，养老金替代水平较低，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开支。

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面临着基本养老金缺口扩大、第一支柱替代率较低等多重问题的叠加，因此更为积极地发挥第二、第三支柱的作用至关重要。为此我们调查了不同职业受访者对于未来退休收入来源于三支柱比例的评估。图 5.4 显示，受访者预期退休收入较多得来源于一、三支柱，一方面说明社会基本养老已经深入人心，但也说明第二支柱亟待发展。同时，随着职级升高，受访者对第二支柱的预期有所增加，说明收入较高的高职级员工更希望所在企业能建立诸如企业年金等第二支柱养老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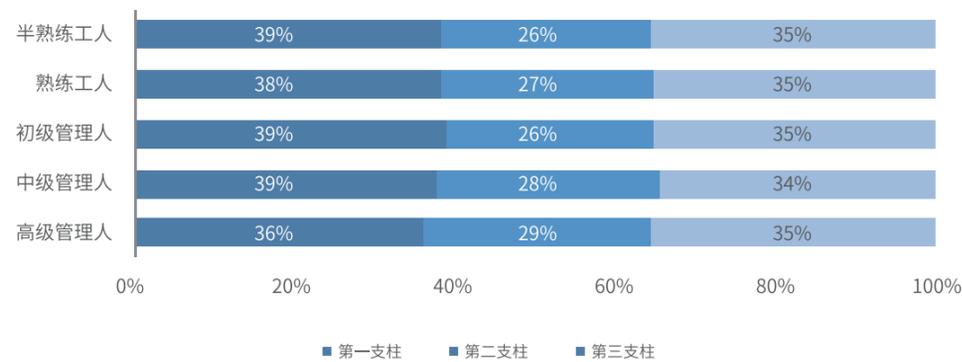


图 5.4 受访者对于未来退休收入来源于三支柱比例的评估

5.2 政府责任

政府提供的作为第一支柱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始终是中国居民最重要的退休收入来源和基本保障。**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当期结余已呈现下滑趋势，2020 年全国性缺口首现。**除 2017、2018 年外，近十年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速大都低于支出的增速，且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呈现趋势性下滑，养老金缺口较大。2020 年，受疫情导致的企业减税降费影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大幅下降，仅为 48742 亿元，同比减少 14.5%，而支出不减反增，达到 54563 亿元，同比增加了 4.2%。同期，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首次出现当期结余为负的情况，缺口额达 5821 亿元。

在省级层面，有 14 个省基本养老金出现缺口，黑龙江省累计结余已经连续 4 年为负。人口老龄化、就业形式多样化、人口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等因素造成我国个别省份城镇职工社会基本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现象，出现养老金当期缺口的省份由 2014 年的黑龙江、宁夏、河北等 3 个省扩大至 14 个省（黑吉辽、内蒙古、河北、浙江、江西等）。近年来，东北三省人口的净流出加速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缺口的扩大，黑吉辽三省养老金缺口分别由 2014 年的 -293.7 亿元、-2.8 亿元、-343.8 亿元扩大至 2019 年的 -309.4 亿元、-120.8 亿元、-463.5 亿元。

未来基本养老金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亟待破局。2020 年 4 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提出：随着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和社保缴费基数下调，未来几年养老金很难维持当前的上涨速度，将在 2035 年耗尽累计结余。

针对全国和部分的现状，政府已采用一系列应对措施：加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力度，进一步均衡地区之间的养老负担；加大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投入，保证养老系统的可持续性；大力推进第三支柱发展，政策推动商业养老体系加速落地。本次调查统计了不同类别受访者对如何解决养老金支出不断增加问题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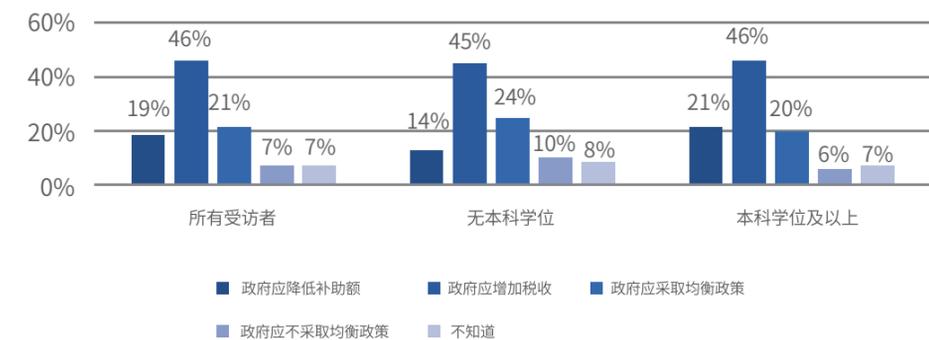


图 5.5 受访者对解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断增加问题的看法

如图 5.5，可以看到，高学历从业者支持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和降低补贴的比例最高，这说明高学历从业者认同应该从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方面获得更多支持，且个人财富的积累使其对政府养老金政策调整有更高的容忍度。

近年来，“延迟退休”一直是个热门话题。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1年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的改革方案。由于延迟退休年龄涉及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在方案研究制定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吸收各界建议。为此，我们在此次调研中继续了解了受访者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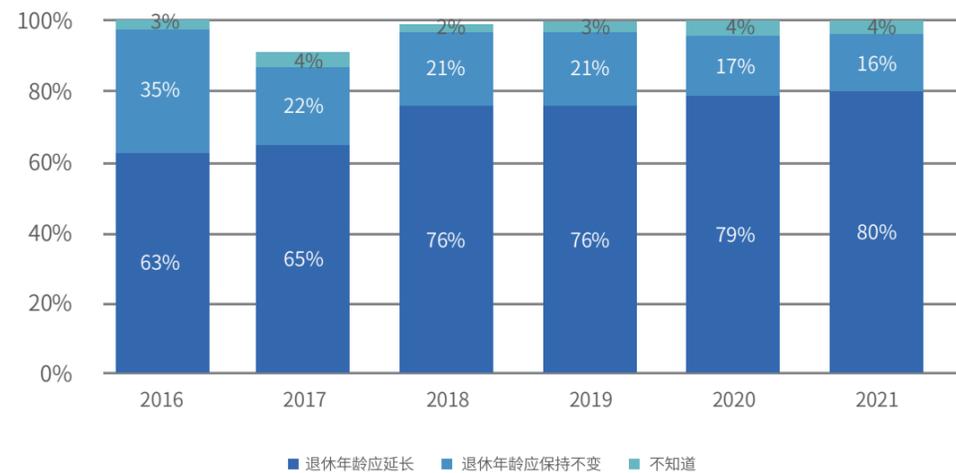


图 5.6 受访者对延迟退休的态度

通过本项挑战近 6 年的观察（如图 5.6）发现，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比例从 2016 年的 63% 增加到 2021 年的 80%，支持退休年龄保持不变的比例从 2016 年的 35% 下降到 16%。**延迟退休已经逐渐得到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认同，现在是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恰当时机。**在精算平衡的前提下，渐进式地延迟退休年龄，实现平滑过渡，破解基本养老金缺口扩大的问题。

5.3 企业责任

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 / 职业年金也在居民退休规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企业年金在我国的发展比较缓慢。截至 2020 年，我国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达 2.2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仅为 2.21%，这主要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占比较高，而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高和税务优惠措施不足导致中小企业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动力不足。相比之下，作为养老金并轨改革的产物，职业年金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我国职业年金基金规模增速高于企业年金，有利于倒逼企业年金的发展。

除企业年金外，企业也可以提供其他类型的养老保障。图 5.7 给出了此次调研的受访者所在单位的员工福利计划情况。总体来看，大部分受访者获得了有雇主参与的退休计划，这表明企业在支持雇员退休准备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然而，仍有小部分雇员尚不了解员工福利，并不知晓他们可以获得的福利；同时，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福利更多地还是集中在基本薪资、医疗健康保险、假日福利、加班补贴等基本待遇方面，而对于员工持股计划、退休过渡安排等

与退休帮助相关的福利方面，提供仍显不足。因此，**企业应在为员工提供包括退休福利在内的更全面的福利计划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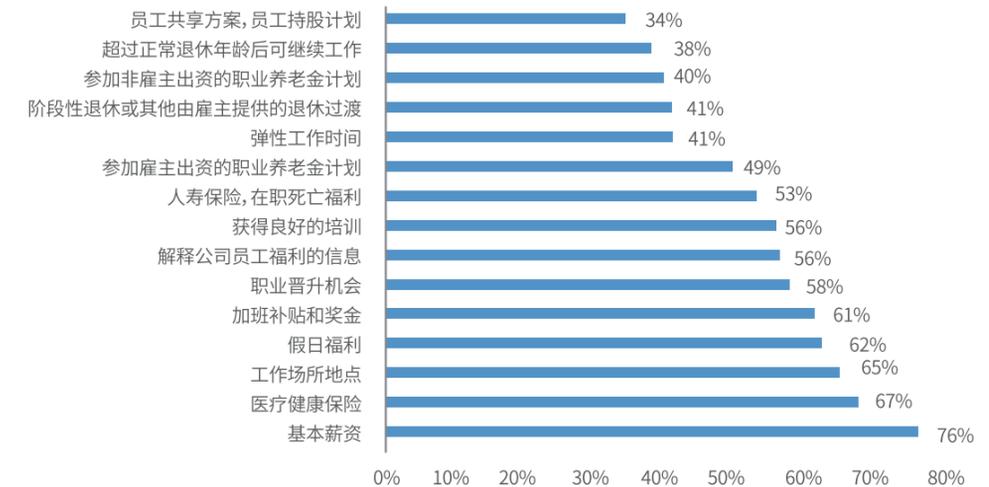


图 5.7 受访者拥有的员工福利计划状况

同时，我们继续观察了其他国家受访者获得企业员工福利计划的情况。图 5.8 给出了英国和德国的统计结果。英国采取的是典型的福利国家型养老金，而德国属于社会保障型。我们看到，43% 的德国受访者获得有雇主参与的退休计划，该比例在英国则达到了 66%，可见企业在支持员工退休准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英国、德国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福利不仅较多集中在工资、医疗保险等基本待遇方面及舒适的工作环境、带薪休假等软性福利方面，还包括退休过渡计划、弹性工作时间等福利的提供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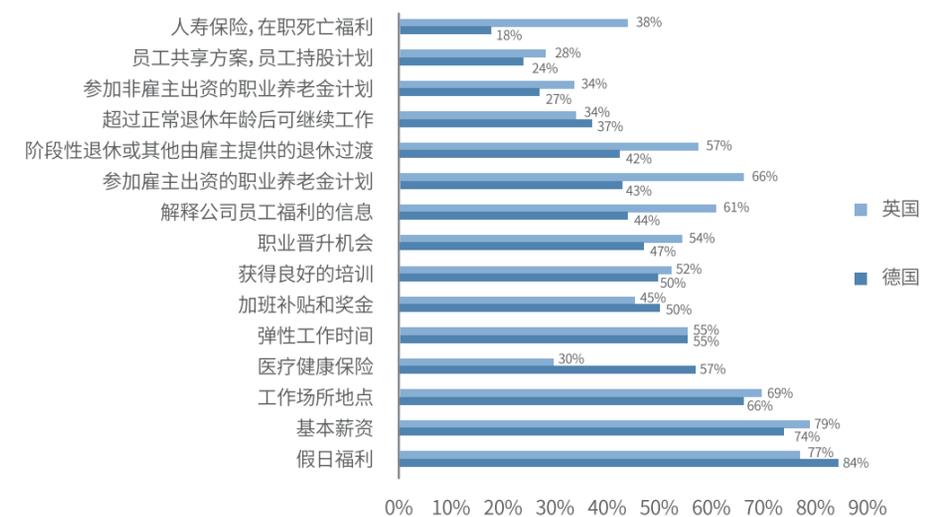


图 5.8 英国、德国受访者拥有企业员工福利计划的状况

出于提高员工劳动生产率、支持员工的终生学习和发展的目的，企业往往会提供培训，帮助员工跟上专业技能的发展并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同时提供培训相关福利来调动员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因此，问卷调查了雇主为支持雇员保持就业能力提供的培训与配套福利。结果见图 5.9。仅有 14% 的雇员未接受过任何培训，表明企业对于员工技能培训的重视程度比较高。近二分之一的雇员（44%）接受过雇主提供的软性、可转移技能的培训，如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和沟通技巧，这有助于提高其再就业能力。值得一提的是，36% 的雇员接受过雇主提供的能够帮助平衡工作与生活、履行其他职责的生活技能，例如照护、育儿、保健，这一比例相较往年有所上升。在提供的培训福利方面，大部分雇员（83%）都获得了企业提供的相应福利，这些福利包括津贴、费用、薪水补偿与职业规划等，能有效帮助雇员接受培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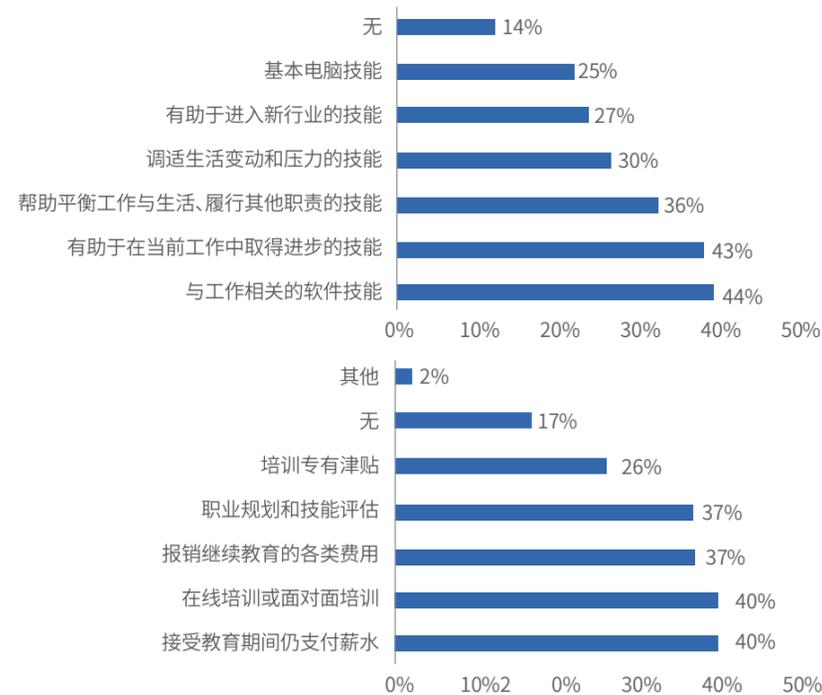


图 5.9 企业为帮助员工保持就业技能提供的培训及福利



企业还可以提供适当的财务建议、医疗服务等，帮助其员工实现逐步退休。2021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68% 的受访者认为其雇主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和支持，帮助其制定退休计划。具体而言，如图 5.10 所示，相比 2020 年，2021 年企业提供的退休帮助在各个方面有所提升，尤其在“雇主提供退休医疗保健服务”和“可以选择从全职转为兼职工作”提升较为明显。然而，**企业仍有必要在为员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财务建议和更灵活的方案等退休帮助方面进一步努力。**可以看出，2021 年仅有 14% 的受访者得到了来自企业的财务建议，这不利于企业员工财务规划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也需要企业进一步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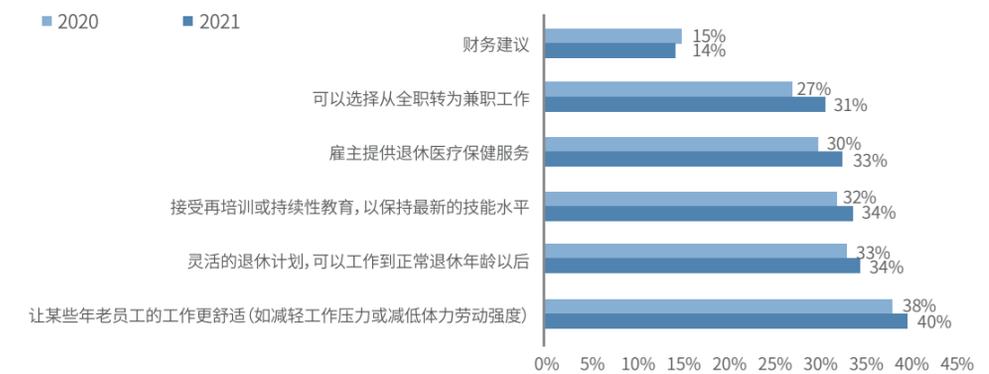


图 5.10 中国企业为员工提供退休帮助的形式

我们同时调查了其他国家企业为员工提供退休帮助的情况，并将英国、德国的结果及全球平均情况呈现在图 5.11 中。我们发现，企业普遍在“从全职转向兼职工作的选择”方面提供的帮助比其他形式的退休帮助更加充分，但获得该帮助的受访者占比仍低于三分之一。此外，企业在“财务建议”、“雇主提供医疗服务”和“再培训或继续教育以获得新技能”方面，为员工提供的帮助均明显不足。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企业为员工提供的退休帮助比例显著高于全球平均，这表示中国企业较好地承担了企业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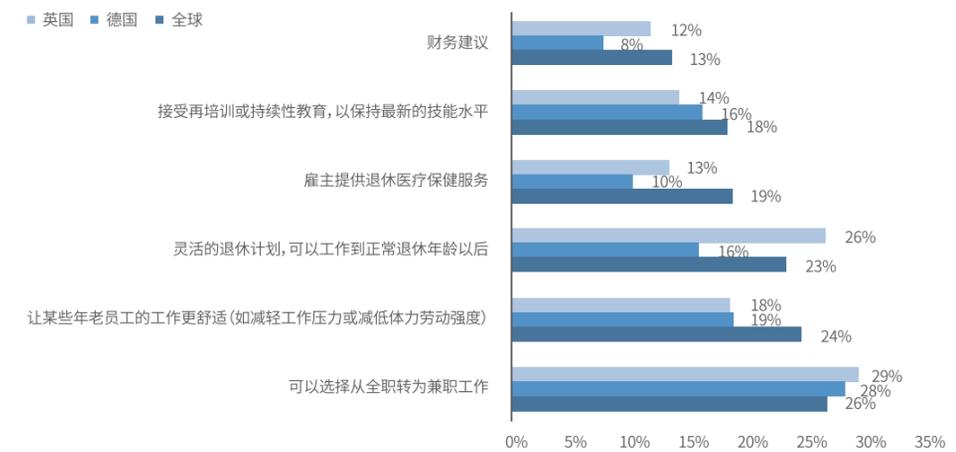


图 5.11 各国企业为员工提供退休帮助的形式

5.4 个人责任

退休规划的完备性以及退休收入的来源取决于个人退休准备是否充分。我们从退休收入预期、退休收入来源分别进行分析。

5.4.1 退休收入预期

我们统计了“你期望未来的退休收入占当前收入的比例”。我们发现，受访者回答的平均值是 65.19%，较 2020 年相比下降两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与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有很大关联，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降低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但从国际比较上看，受访者对退休后收入的预期水平基本合理，符合大多数人退休前后收入水平的变化，与全球平均的未来收入预期 66% 接近，是一个适当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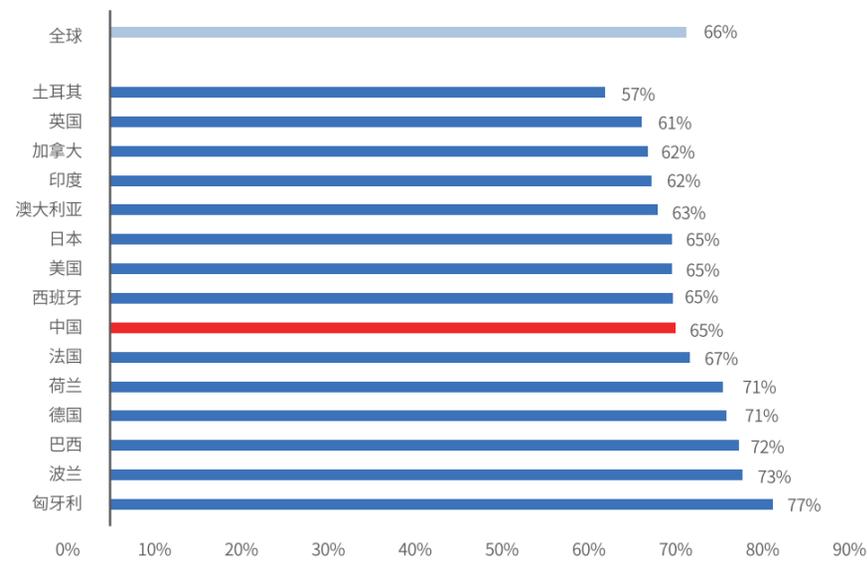


图 5.12 各国受访者期望的退休收入占当前收入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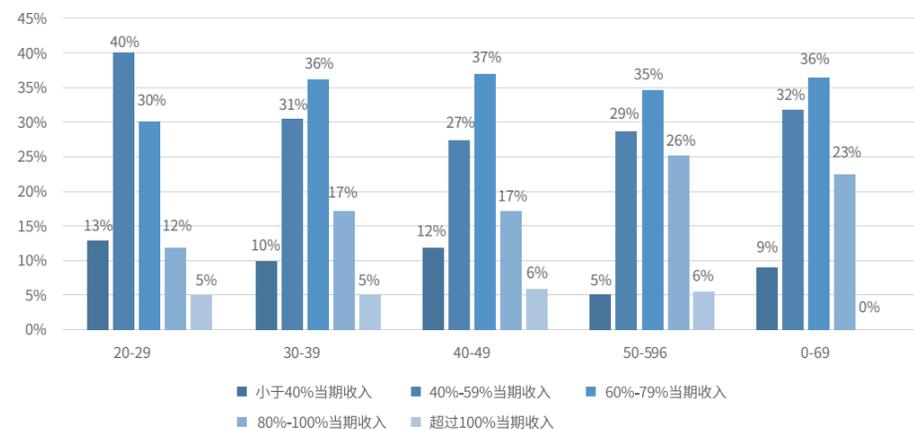


图 5.13 不同年龄水平居民对于退休收入的预期

我们也比较了各年龄段受访者期望收入占当前收入比例的情况。如图 5.13，随着年龄的增长，期望收入的比例先升高，在 50-59 岁时达到顶点，之后有所下降。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年轻居民倾向低估未来养老生活挑战，认为较低养老金水平就能够维持当前的生活水平。随着年龄增长，一方面居民会逐渐对养老退休挑战有更清晰认识，另一方面，职位的晋升使得他们对于未来收入预期趋向乐观，因此会不断上调期望收入。后期预期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因为职位晋升空间的缩小使预期更倾向保守，但最终仍高于年轻时（20-29 岁）的水平。

为加强异质性分析，我们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预期退休收入。如图 5.14，所有群体对退休收入的预期多集中在 60%-79% 之间，但最高收入群体的预期收入在 40%-59% 之间的比例明显上升。这一差异也是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原因是社会基本养老金是中国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退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并且由于退休前收入水平就比较低，所以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占比就会相对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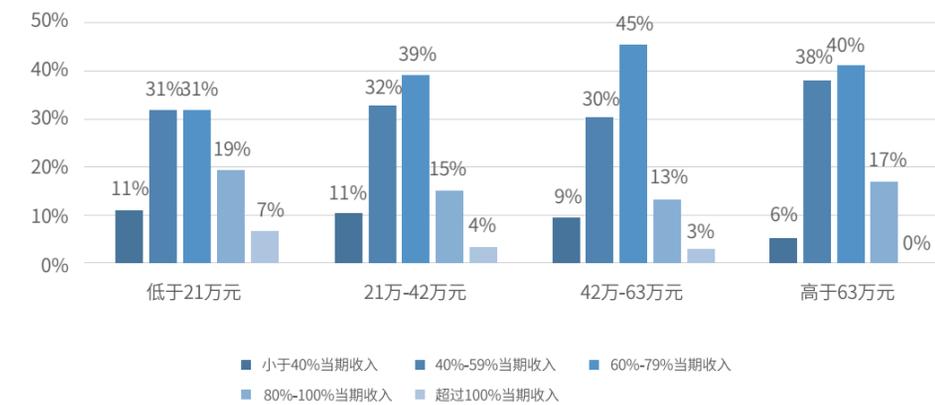


图 5.14 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于退休收入的预期



5.4.2 退休收入来源

将预期的退休收入来源进行细分，我们得到如图 5.15 所示的结果。可以看到，长期护理保险占比提升较快，而储蓄和社会养老金占比出现明显下降。总体来看，**社会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和商业养老金仍是居民预期的主要退休收入来源**，人寿保险、股票、债券、基金及企业年金、住宅次之，生意、遗产、护理保险等被选择的比例较低。这进一步说明，在我国养老体系中，政府提供的社会养老保险仍占据主要部分，但不足以覆盖全部养老需求，因此居民仍会较多地进行预防性储蓄，这也说明商业保险的发展刻不容缓。2017-2021 年对储蓄来源的认同度不断下降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企业年金、人寿保险、股票、债券及基金投资等不断发展，为养老财务准备提供了更多选择，产生了一定替代效应。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完善，中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转变，储蓄率降低，家庭逐渐将更多收入投入了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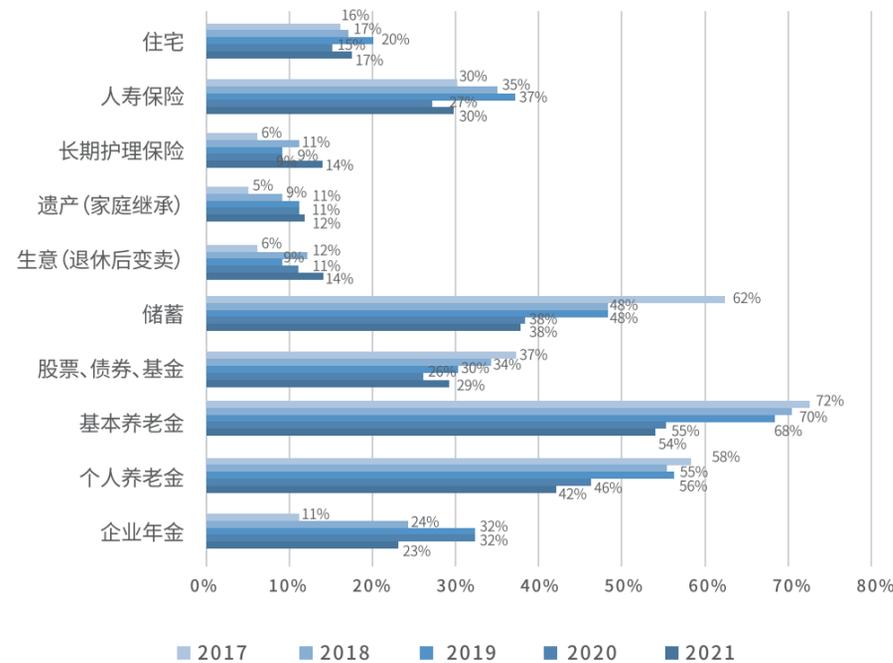


图 5.15 2017-2021 年受访者获得退休收入的财务方式

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是哪些因素会激励或抑制居民为退休进行储蓄准备。如图 5.16，2021 年激励居民为退休进行储蓄的最主要因素是年龄的增长、雇主支付的退休金、首次购房、成立家庭等长期因素；而短期冲击因素，如偿还助学贷款、失业、离婚等对于储蓄的激励作用不大。这表明退休储蓄是一种偏长期的决策行为。图 5.17 则显示，抑制居民为退休进行储蓄的主要因素为：“正在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赚的钱不够储蓄”和“其他应急需求挤占”。值得注意的是，19% 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对退休储蓄造成了抑制，而“无法获得金融教育”的比例从 2020 年的 10% 减少到了 0%。因此，**加快复工复产，做好疫情防控，将对居民为退休进行储蓄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金融知识的普及也初见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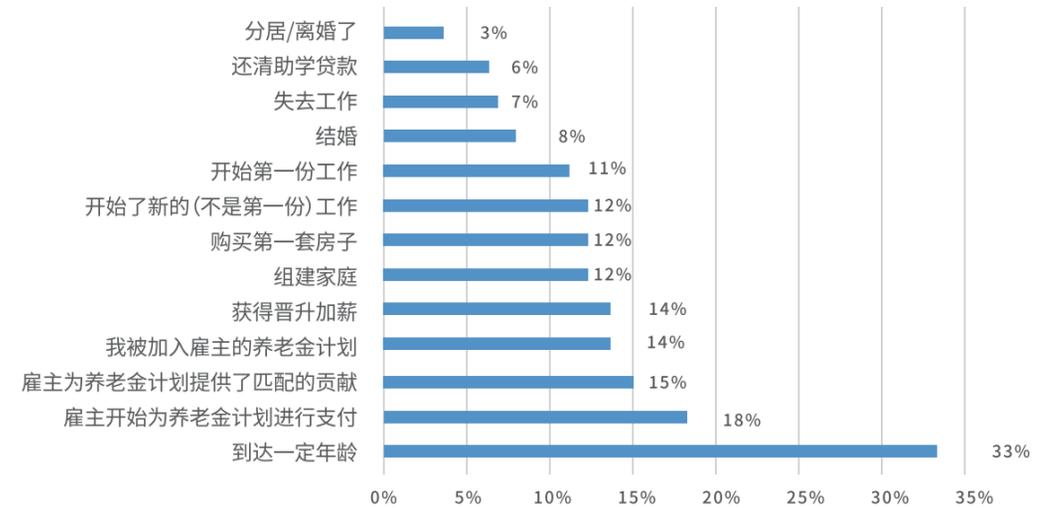


图 5.16 激励受访者退休做储蓄准备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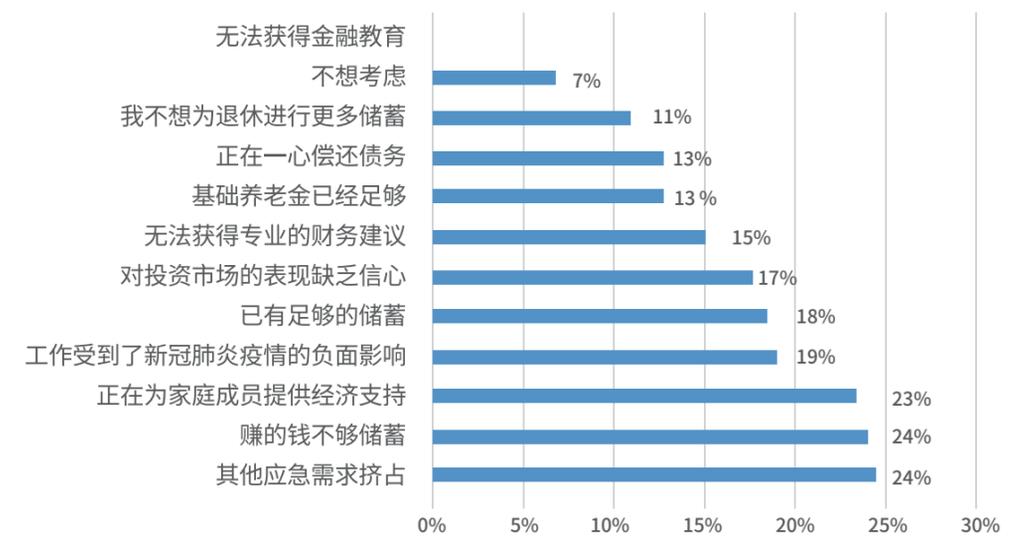


图 5.17 抑制受访者退休做储蓄准备的因素

进一步研究家庭对于已退休受访者养老的影响。如图 5.18，1% 已退休受访者会为 18 岁以下子女提供金融支持，而对于 18 岁以上子女，该比例上升至 20%，这因为中国居民的家庭结构特征和文化特征决定了父母为子女购房、结婚提供经济支持这一普遍现象。纵向来看，2021 年已退休受访者提供金融支持比例显著下降，56% 受访者未提供金融支持，只有对父母的金融支持上升了三个百分点，这是由于新冠疫情对居民储蓄造成了冲击，对未来的信心下降使得居民减少对亲人的金融支持，而父母比起受访者面临的金融压力更大，因此对父母的金融支持有所增加。

那么已退休受访者是否可以从除配偶外的家庭成员处获得养老财务支持呢？数据显示，大部分（78%）没有获得，从子女处获得占 6%，从配偶外的其他家庭成员获得占 10%。同时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已退休受访者获得的财务支持同比上一年显著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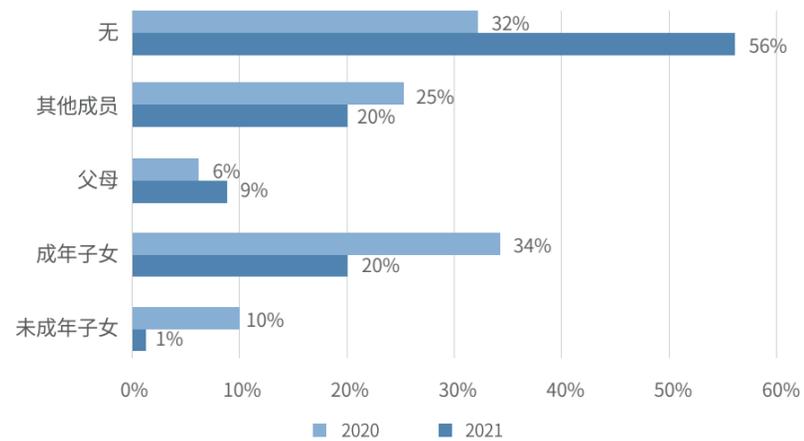


图 5.18 已退休受访者向非配偶成员提供金融支持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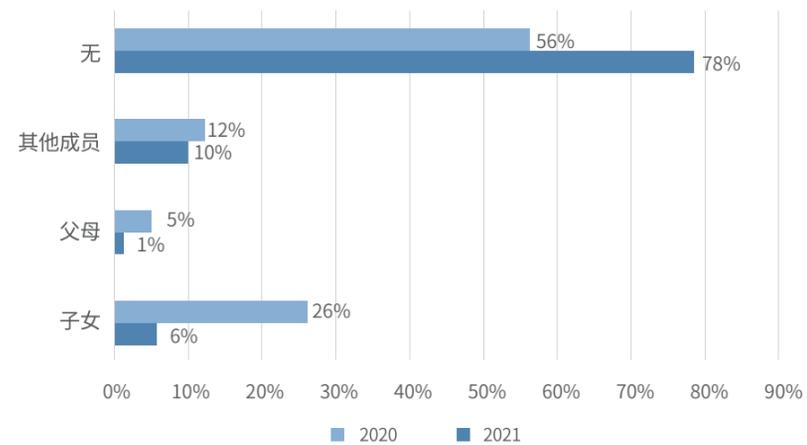


图 5.19 已退休受访者向非配偶成员接受金融支持情况

一个好的退休计划还应有应对突发情况如被迫提前退休的后备计划，新冠疫情的爆发和全球大流行更凸显了制定后备计划、为生活中不可预见的事件做好准备的重要性。后备计划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保险、应急现金储蓄等。图 5.20 显示，相对国际平均水平（37%）而言，中国受访者中有后备计划的人数比例（44%）更高，表明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计划具有较强的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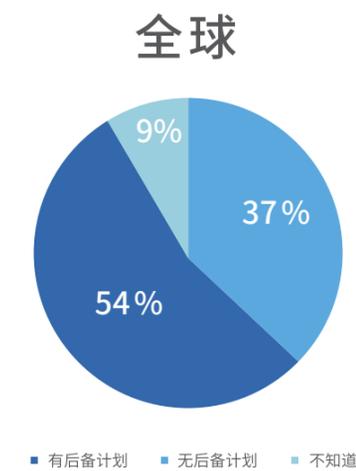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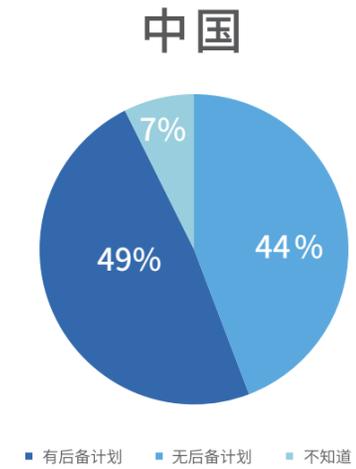


图 5.20 中国与全球受访者退休计划中有无后备方案的比较



06. 专题研究

6.1 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

6.1.1 中国居民金融素养客观上存在不足

本次调研继续对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进行了调查，希望通过了解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研究其对退休准备和退休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1) 受访者金融素养水平概览

金融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是指个体能够高效合理地管理和处理其所拥有的私人金融资产和金融事务的知识和能力，也是个体对各金融领域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国际上通用的衡量金融素养的方式是由美国学者 Lusardi 和 Mitchell 在 2004 年设计的三道选择题 (国际常称为“三大问题”)，分别考察被调查者对于复利、通货膨胀、风险分散三个方面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意识具备情况，从而做出对其金融素养的评估，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本次问卷中使用了这“三大问题”来衡量受访者的基本金融素养。受访者对这 3 个问题的回答情况如表 6.1 和表 6.2 所示。



专题研究

表 6.1 2021 年中国区问卷中关于金融素养的 3 个问题

关于金融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的 3 个问题	
题 1	<p>【复利题】假如您的储蓄账户中存有1000元人民币，储蓄利率为每年2%，若您将这笔钱放在账户中不做变动，您认为5年后您的账户中将有多少人民币？</p> <p>请选择：</p> <p>A. 多于1020元人民币 B. 正好1020元人民币 C. 少于1020元人民币 D. 不知道 E. 拒绝回答</p>
题 2	<p>【通货膨胀题】假如您的储蓄账户的年利率为1%，年通货膨胀率为2%。1年后您在账户中将拥有多少储蓄可用于消费？</p> <p>请选择：</p> <p>A. 比今天的储蓄多 B. 与今天的储蓄相等 C. 比今天的储蓄少 D. 不知道 E. 拒绝回答</p>
题 3	<p>【风险分散题】您认为以下的表述是否正确？“购买一个单一公司的股票往往比购买一个股票共同基金提供更加安全的回报。”</p> <p>请选择：</p> <p>A.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B.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C. 不知道 D. 拒绝回答</p>

对所有国家

表 6.2 中国受访者对 3 道金融素养问题的回答

题号	题目选项	选择该选项的人数	人数占比
1	a 多于1020元人民币 (正确)	1241	62.05%
	b 正好1020元人民币	409	20.45%
	c 少于1020元人民币	237	11.85%
	d 我不知道	104	5.20%
	e 拒绝回答	9	0.45%
2	a 比今天的储蓄多	460	23.00%
	b 与今天的储蓄相等	427	21.35%
	c 比今天的储蓄少 (正确)	1003	50.15%
	d 我不知道	103	5.15%
	e 拒绝回答	7	0.35%
3	a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683	34.15%
	b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正确)	804	40.20%
	c 我不知道	503	25.15%
	d 拒绝回答	10	0.50%

由表 6.2 可知，中国居民关于存款利率（题 1）和通货膨胀方面（题 2）的金融素养相对较高，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储蓄与通货膨胀是中国居民更为关注和熟悉的话题。而关于风险分散问题（题 3）的正确率仅有 40.2%，说明中国居民在权益类金融产品投资和风险管理方面具有的知识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如图 6.1 所示，近年来中国居民在回答金融素养三大问题时的表现并不稳定，在 2019 年的正确率最高，而在 2021 年相对最低；在去年有 20% 的受访者同时答对了三道问题，而今年只有 19% 的受访者同时答对。这可能与调研群体的抽样偏差有关，但数据也显示出居民金融素养的下降趋势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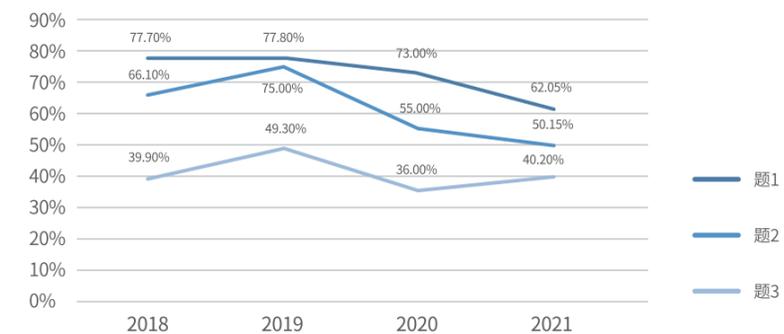


图 6.1 2018-2021 年中国受访者回答“三大问题”的正确率

(2) 居民金融素养的国际比较

如图 6.2 所示，不同国家受访者在金融素养“三大问题”上的表现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调研的 15 个国家中，德国的表现总体最好，而在中国同时答对三道问题的人数占比仅有 19.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5.0%，排在倒数第三位，而中国在 2020 年这一项指标中排在倒数第二，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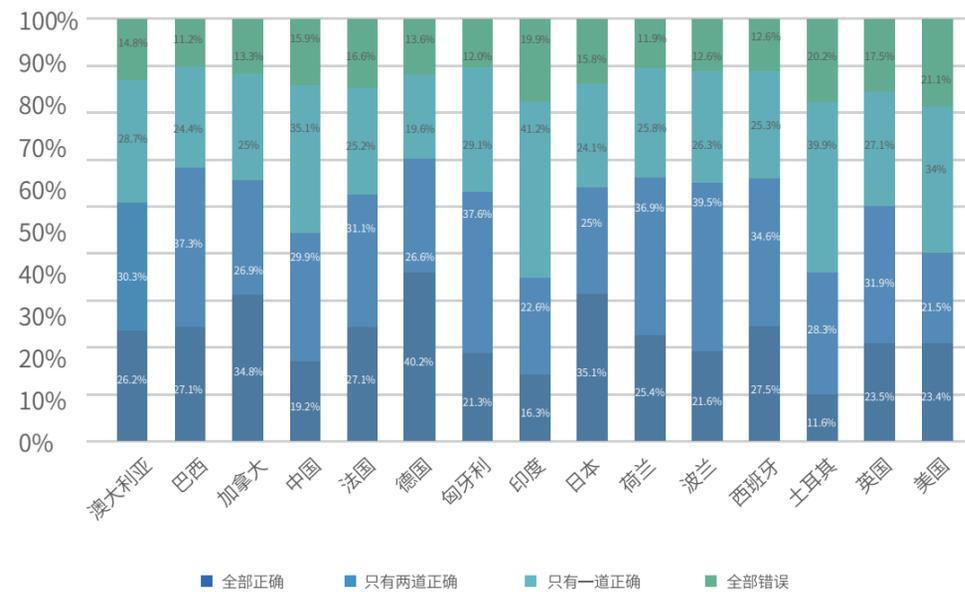


图 6.2 2021 年各国受访者回答“三大问题”的正确率

(3) 中国受访者金融素养的差异分析

我们对所有中国受访者按照不同年龄段、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和收入水平等进行了划分，分别来观察他们的金融素养，结果见表 6.3，表中加粗带下划线的数字为正确率比例最高的人群类型。

首先，从年龄结构和工作状态来看，5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金融素养表现好于其它年龄段的受访者，已退休的人群金融素养好于未退休人群，说明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的的增长有助于金融素养的提高。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较晚，但老年群体并没有因此缺乏对金融投资的关注，反而在退休后积累了更丰富的金融知识。

其次，男性与女性在金融素养方面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三个问题上的正确率均十分接近。在婚姻状况方面，离婚和丧偶群体的金融素养最好，这部分群体往往独居生活，需要对自身财务更多的负责。同时，已婚群体的金融素养好于单身群体，主要体现在关于风险分散问题上，说明稳定的婚姻关系下人们对风险的重视程度更高。

基于教育背景，我们将被调查者分为本科以下学历和本科及以上学历两类。总体而言，学历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展现出了更好的金融素养，说明教育对金融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从职位水平来看，中层管理干部和熟练体力劳动者的金融素养表现相对更好；而从收入水平来看，低收入群体反而表现出更高的金融素养。

表 6.3 不同特征受访者回答金融素养“三大问题”的正确率

	总人数	题1 正确 (%)	题2 正确 (%)	题3 正确 (%)	全部 正确	
年龄	18-24	304	59%	46%	43%	18%
	25-34	414	66%	43%	33%	15%
	35-44	447	59%	45%	43%	19%
	45-54	394	56%	51%	42%	19%
	55-64	327	70%	66%	35%	23%
	65+	114	69%	59%	55%	25%
性别	男性	1006	62%	51%	39%	19%
	女性	994	62%	49%	41%	19%
工作状态	未退休	1800	62%	49%	40%	19%
	已退休	200	67%	64%	46%	24%
	单身	272	63%	50%	35%	15%
婚姻状况	已婚	1622	62%	50%	41%	20%
	同居	71	56%	34%	41%	11%
	离婚	24	83%	79%	25%	21%
	丧偶	9	56%	67%	44%	22%
教育程度	本科以下	356	54%	40%	38%	11%
	本科及以上	1643	64%	52%	41%	21%
职位水平	高层管理人员	285	60%	36%	38%	17%
	中层管理人员	721	64%	53%	39%	21%
	基层管理人员	727	61%	53%	42%	20%
	熟练体力劳动者	104	66%	63%	45%	20%
	半熟练体力劳动者	62	66%	52%	26%	15%
收入水平	低收入	1357	65%	54%	40%	20%
	中等收入	369	63%	51%	42%	20%
	高收入	199	44%	28%	39%	12%
	超高收入	75	56%	37%	40%	16%

6.1.2 金融素养自我认知不足，存在过度自信现象

在针对中国居民的调查问卷中，受访者回答了关于金融素养的“三大问题”后，我们紧接着询问了受访者对自己的答案正确与否的看法：

请给下面每一种结果一个您认为的可能的百分率（百分率数字加总等于 100%）。

- (a) 三个问题都答对的百分率 -- () %
- (b) 只答对两个问题的百分率 -- () %
- (c) 只答对一个问题的百分率 -- () %
- (d) 答案都不对的百分率 -- () %
- (e) 我不知道 -- ()
- (f) 我不想回答 -- ()

在总共 2000 名受访者中，有 1527 名受访者给出了自己认为回答正确的题数的概率分布，417 名受访者选择了“我不知道”，56 名受访者选择了“我不想回答”。

(1) 中国居民对自身金融素养总体上过于自信

对所有给出了答对题数概率分布的受访者（共 1527 人），我们计算了他们对自己回答正确题目数量的期望值（四舍五入为整数），并与他们实际答对的题目数量进行对比，得到的统计结果如表 6.4 所示。

表 6.4 受访者认为答对与实际答对问题的数量对比分析

	期望答对n个题目	实际答对n个题目
n=0	0 0%	194 12.7%
n=1	103 6.7%	541 35.4%
n=2	963 63.1%	443 29.0%
n=3	461 30.2%	349 22.9%

表 6.4 给出的统计结果表明，**受访者对自己回答正确题目数量的估计与实际结果存在着较大偏差**。具体而言，没有人认为自己三道题的回答都不正确，而实际人数（194 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估计自己只回答对了一个问题的人数（103 人）远低于实际只回答正确一个问题的人数（541 人）；另一方面，认为自己回答正确两个问题的人数（963 人）大幅超过了实际回答正确两个问题的人数（443 人），认为自己回答正确三个问题的人数（461 人）超过了实际回答正确三个问题的人数（349 人）。整体而言，受访者对正确回答题目数量的估计要高于实际情况，超过 90% 的人认为自己至少回答正确了两个题目，而实际情况却仅有 41.9%，这说明**中国居民总体上存在对自身金融素养过于自信的现象**。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受访者实际答对的题目数量与期望答对题目的数量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说明**总体上金融素养更高的居民对自身的金融素养也具有更高的预期**。我们用受访者期望正确题目数量与实际正确题目数量的差值，作为衡量受访者对自身金融素养是否过度自信的指标。当差值大于零时，说明受访者存在过度自信；当差值小于零时，说明受访者过于保守；差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过度自信（过于保守）的程度越大，也代表着对自身的客观认知偏差越大。统计结果表明，在这 1527 名受访者中，有 945 名受访者对自身金融素养的预期过于自信，419 名受访者对自身金融素养的预期过于保守，只有 163 名受访者对自身有着准确、理性的预期；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为 0.54，中位数为 0.60，进一步说明总体来看，中国居民对自身金融素养存在过度自信。

(2) 居民金融素养越高时，过度自信程度越低，主观认知越准确

紧接着，我们将“过度自信的程度”作为因变量，“实际答对题目数”作为自变量，在不添加其余控制变量的条件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受访者过度自信程度与其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金融素养越高的受访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越低**。若再将“主观认知偏差”作为因变量，“实际答对题目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发现二者间存在十分显著的负向关系，由此得出结论，**金融素养越高的受访者对自身的客观认知也更加准确**。事实上，“三大问题”考察的都是极其基础的金融知识，不太可能存在实际具有金融素养而答题错误的偏差。在 163 名准确预期答对题目数量的受访者中，有 117 名都准确地回答了三个问题，这也说明扎实的金融知识是保障自身不会出现过度自信或者过于保守现象的基础。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居民来说，目前对自身金融素养的认知还十分不足，而对自身金融素养认知的偏差将会直接影响居民对退休准备的规划。

(3) 中国受访者金融素养主观认知偏差的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这种认知偏差是否会对退休准备及退休计划带来影响，我们首先对金融素养过度自信程度较高和较低的受访者群体分别进行画像。表 6.5 为 1527 名受访者在不同特征分类下的金融素养主观认知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对自身金融素养的主观认知方面，**不同特征的群体均表现出过度自信的情况**，各群体自我估计回答正确的题数均高于实际回答正确的题数，这与前文得出的结论相符，但过度自信的程度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金融素养过度自信程度较高的人群主要是 45-54 岁、受教育程度低、但收入和职位水平较高的未退休男性群体**；主观认知偏差较小的是 65 岁以上、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者，这部分人群表现出的金融素养也相对最高。通过与客观金融素养

题目的正确率对比可以看出，客观金融水平越高的群体，对自己的主观认知也更准确，过度自信的程度也更低。

表 6.5 不同特征受访者金融素养的主观认知情况

		总人数	平均正确题数	预期正确题数	过度自信程度
年龄	18-24	254	1.56	2.05	0.49
	25-34	313	1.50	2.16	0.66
	35-44	342	1.58	2.14	0.56
	45-54	303	1.53	2.23	0.70
	55-64	232	1.88	2.24	0.36
	65+	83	2.05	2.11	0.06
性别	男性	790	1.61	2.17	0.56
	女性	737	1.63	2.14	0.51
工作状态	未退休	1391	1.58	2.16	0.58
	已退休	136	2.03	2.19	0.16
婚姻状况	单身	203	1.60	1.90	0.30
	已婚	1241	1.62	2.19	0.57
	同居	61	1.34	2.14	0.80
	离婚	14	2.07	2.21	0.14
	丧偶	6	2.17	2.30	0.13
受教育程度	本科以下	273	1.32	2.14	0.82
	本科及以上	1254	1.68	2.16	0.48
职位水平	高层管理人员	234	1.35	2.13	0.78
	中层管理人员	569	1.66	2.15	0.49
	基层管理人员	544	1.65	2.21	0.56
	熟练体力劳动者	75	1.88	2.22	0.34
	半熟练体力劳动者	38	1.68	2.09	0.41
收入水平	低收入	997	1.73	2.22	0.49
	中等收入	292	1.60	2.13	0.53
	高收入	177	1.12	1.89	0.77
	超高收入	61	1.38	2.13	0.75

6.1.3 金融素养对退休准备的影响

理论而言，居民的金融素养会对其退休准备产生影响，金融素养水平更高的个体，不仅能利用更加科学、专业的手段进行投资理财，也具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因此其个人的退休准备应当更加充分。为了探究居民的金融素养是否会真正地影响其退休准备，我们将受访者关于“三大问题”的“实际答对题目数”作为自变量，退休准备的实际状况作为因变量，在控制年龄、性别、工作状态、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位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条件下，进行回归分析。

我们还选取了问卷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问题，来反映居民进行退休准备的实际情况。三个问题分别从三个角度体现个人的退休准备情况：第一个角度观察人们为退休养老进行储蓄准备的情况，即是否有退休准备的意识；第二个角度是观察个人是否为退休准备进行了可视化为个人未来资产的储蓄，即是否有退休准备的行动；第三个角度是观察人们对退休准备积累的资产价值是否清晰，即退休准备是否可靠，以及被调查者的退休准备能力是否较为成熟。选取的三个问题如下：

(1) 下列哪一项最确切地表述了您为今后退休采取的储蓄方式？

- (a) 我一直都在为今后退休储蓄，从不间断
- (b) 我只是偶尔才为今后退休储蓄
- (c) 我以前为今后退休储蓄过，不过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
- (d) 我还没有为今后退休储蓄，不过我有这个打算
- (e) 我从来没有为退休储蓄过，也不想这么做

(2) 以下金融手段中，你目前或过去采用了哪些财务方式来为退休做准备？

公司资助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个人养老金、社会保险、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储蓄账户、货币基金、定期存款、生意（计划在退休后出售）、遗产（从父母或其他家人朋友处继承）、长期护理保险、人寿保险、可变年金、固定年金、房屋所得收入、房屋净值（缩小房产或释放房产价值）及其他。

(3) 您对以下表述是否认同？“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我的个人退休准备储蓄和投资的资产总价值。”

- (a) 强烈反对
- (b) 有点反对
- (c) 中立
- (d) 有点赞同

(e) 强烈赞同

(f) 不知道

(1) 较高的金融素养有助于促进个人进行更充分的退休准备

首先，分别使用以上三个指标来表示退休准备情况，**居民的金融素养与个人退休准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金融素养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进行个人退休准备。**一方面，金融素养越高的人会具有更强的退休准备意识，会更早、更充分地为其退休进行储蓄；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采用除了社养老金外的多种其余手段来实现退休财务准备，包括运用股票等投资手段或购买养老保险等金融产品。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素养越高的人采用的金融工具数量也越多，因此具备更强的退休准备行动力。此外，金融素养更高的个体也更加清楚地了解自身投资储蓄的资产总价值，具有更成熟可靠的资产管理能力。由此可见，较高的金融素养对于居民进行退休准备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仅能够帮助居民形成更加深刻的退休准备意识，更能帮助他们完成合理的、科学的理财规划，保障养老金资产的保值增值。随着国家基本养老金开始出现缺口，在未来需要个人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在中国居民普遍金融素养偏低的背景下，这也启示我们未来应当开展更多的金融普及教育，在提升居民金融素养的同时也帮助他们完成退休准备。对于缺乏金融素养的个人来说，将养老资产委托给专业的机构来进行管理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

(2) 对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会抑制个人实际的退休准备

将受访者对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程度作为自变量，退休准备情况作为因变量，添加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后发现，**居民的过度自信程度与做出的实际退休准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具体来说，对自身金融素养越自信的个人，其为退休采用的金融工具数量越少，对自身养老金资产的认知也越模糊，说明居民对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会抑制个人退休准备的实际行动力，也不会激励自身对资产的价值变化进行更多的关注。前文的结论已经说明，人们普遍存在对自身金融素养做出过高的估计，尤其是金融素养较低的居民。具体到与退休准备的关系，金融素养较低的居民可能高估自己的投资能力，导致他们并未在退休前获得较理想的储蓄水平。而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对通货膨胀、复利增值和分散投资等投资观念理解深刻全面，往往会及时把握投资机会，坚持长期稳健和多元化的投资，在退休之前可以获得较理想的储蓄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素养的缺失加上对自身的过度自信，可能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自己可以准确预估养老投资收益，并按此规划退休生活，实际则不然。很多人会采用过于激进的投资策略，将大部分资产置于较高风险的投资上，黑天鹅事件一旦发生则血本无归；或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在不良投资机构和金融诈骗者的引诱下上当受骗，损失掉大部分本金。相反，金融素养较为完备的个体却能认识到这种偏误，并时时告诫自己可能会犯类似的错误，因此他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趋于更加谨慎，注重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以风险管理为例，每一个个体都存在因各种各样随机突发事件引起的巨额开销，如突然患有某种重大疾病或发生了交通事故后面临的赔付，这类事件难以实现精确计算，如果对此准备不足，就会极大影响已经规划好的退休投资计划。人寿与健康保险通常是应对这类风险的专业金融工具，我们的研究发现，**客观金融素养越高、主观过度自信程度越低的居民，会更倾向于将购买人寿保险作为养老准备的财务方式之一。**这也说明较高的金融素养与较低的过度自信程度会有助于人们进行更完善充分的退休准备。

(3) 居民的实际退休准备与主观认知存在差异

我们的研究发现，若使用“退休准备指数”代表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会得到与前面相反的结果，即金融素养越高、过度自信程度越低的居民反而退休准备指数越低。产生这一偏离的原因可能是：**个人退休准备指数包含了多个退休准备方面的指标，且其中大多为主观性问题，因此会受到受访者自评偏差的影响。**由于自评偏差，金融素养较低、过度自信程度较强的受访者，在回答主观问题时可能同样存在过于乐观的情绪，没有对自身退休准备的实际情况产生准确的认知，因此数据反映出的结果不一定能完全表示其实际退休准备的真实情况。为验证这一猜想，我们分析退休准备指数的构建中所包含的一道表现“退休财务问题理解能力”的问题（“当涉及到为退休养老做准备时，您认为自己有多大程度能够了解相关的金融财务事项？”）。结果表明，该指标的回答结果与实际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与过度自信程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说明受访者在回答问卷中关于退休准备的主观问题时的确存在自评偏差。从现实层面来看，完备的责任意识对居民来说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付出实际的过程去进行退休准备。这也启发我们，即便是拥有较高的金融知识水平，也对自身有着准确的主观认知，进行退休准备也不能仅停留在意识层面和规划层面，而应当通过具体的行动，在金融实践中不断地积累财富。

6.2 中国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

居民的退休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个人健康的责任和个人财务的责任。对个人健康的责任具体指居民对于退休后罹患重大疾病的较高可能性、身体失能较高风险存有防范意识，能够在退休前期重视个人健康，避免退休后医疗护理带来的高昂成本和生活质量影响。个人财务的责任指居民对于退休后收入及支出有提前的预期，从而在财务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的意识。以下我们将从健康责任和财务责任两个方面讨论。

6.2.1 退休健康责任

健康责任意识指居民主动承担退休后的健康风险和失能风险的意识。健康风险对应的防范成本即居民为疾病、医疗、失能收入损失和护理方面普遍性保障付出的健康险成本；失能风险对应的成本为居民退休后发生重大疾病、失能产生的长期护理保险成本。这两种风险的防范均成本高昂。**因此，退休前对个人健康具备责任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为退休后个人健康的准备可以降低此类成本，尤为重要。**

其一，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整体不乐观，因此居民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意识，去积极主动地关心和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对自我健康的责任意识主要体现在居民对于自我健康的关心程度和具体的健康生活习惯上。责任意识的强弱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的因素包括性别、教育经历和新冠疫情期间工作状态等。

首先针对“您在多大程度上担心自己老年后的健康状况”，及个人健康关心程度的问题，我们发现**女性对于退休后的自我健康更加关心**，女性对于“健康担心程度”平均分为 3.07，明显高于男性的 2.93，12% 的男性受访者表示完全不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教育方面，受到高水平教育的人群更加关心自我健康**，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对于健康的担心程度平均分为 3.06，而本科学历以下的受访者仅为 2.73。这可能和受访者在教育经历中接受的相关知识有关。

此外，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特殊时间节点，中国居民自我健康担心程度与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工作受到影响的程度有关。根据我们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受到影响处于待业状态且至今尚未返岗的人群，自我健康担心程度明显降低，仅为 2.57，33% 的待岗人群都表示不关心自己退休后的健康状况；而返岗或重新找到工作的人群具有明显更强的危机意识和更充足的精力，更加担心自己退休后的健康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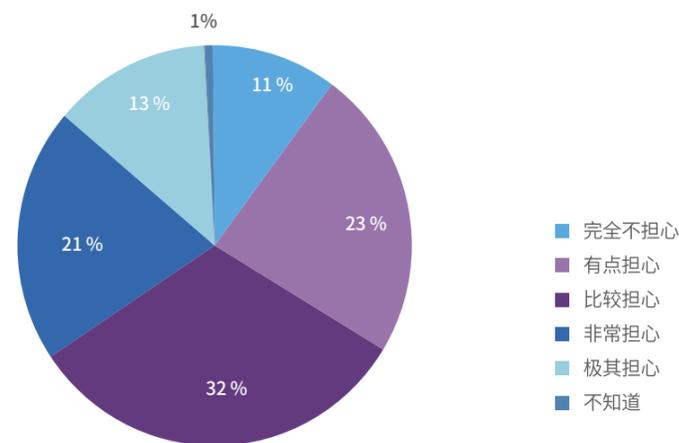


图 6.3 受访者自我健康状况担心程度

其次，采用问题“以下哪些与健康相关的态度和行为适用于您”来衡量居民在具体行动上对自己健康的负责程度。我们发现健康行为方面，**注重饮食、锻炼身体和避免身体伤害仍是居民维护自身健康的主要做法**，采用这些做法的受访者占比与上年度基本持平。除此之外，正念练习这样的心性健康调节方法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采用正念练习的受访者占比由上年度的 21% 提升至本年度的 26%。从健康生活习惯来看，中国居民较为积极地承担起自身健康的相关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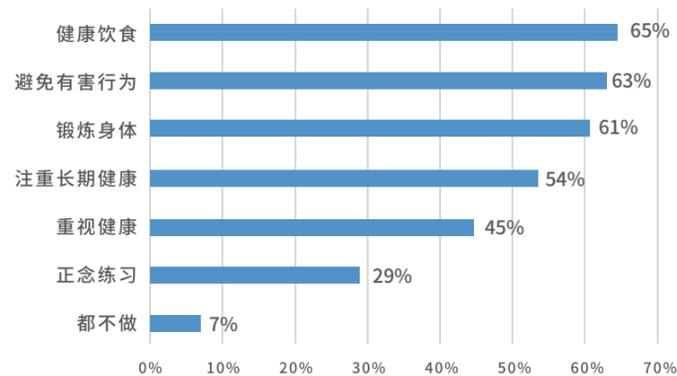


图 6.4 受访者健康习惯

其二，中国老年人失能和发生重大疾病的比例较大。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截止 2014 年，60 岁以上的 2.1 亿老年人中，有将近 4000 万是失能或半失能的老人。预计到 2035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 4 亿人，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长期护理成本进一步加大。**因此，居民需要增强对于重大疾病和失能风险的防范意识及应对能力。**在调查中，我们主要考察居民对于退休后医疗费用相关的财务规划。

居民医疗费用准备的充分程度有所下降。本年度 67% 的受访者在退休储蓄计划中考虑了未来的医疗费用，30% 的受访者没有将其纳入考虑，考虑医疗费用的人群占比相较于上年度的 72% 明显降低。这可能受到这一年中各个家庭经济实力普遍性变化的影响，国家和社会机构提供的医疗保障服务日益完善也可能降低居民为医疗费用的准备激励。但总而言之，从医疗费用财务规划来看，我国居民对自身的健康状况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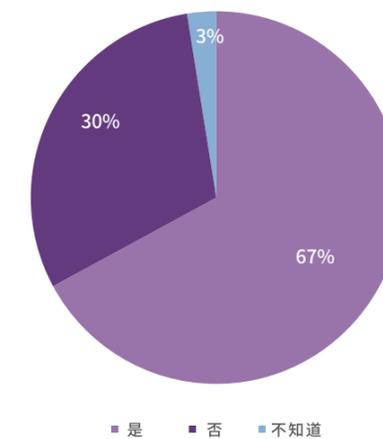


图 6.5 受访者是否将医疗费用纳入退休储蓄

6.2.2 个人财务责任

总体而言，中国居民退休收入责任意识较强。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随着年龄增长，退休责任意识呈逐渐增强的趋势。在被问及“您在多大程度上觉得您自己应当负责并确保退休后有足够的收入”时，65 岁以上的受访者均认为自己应该“一般负责”、“很负责”或者“完全负责”。退休责任随年龄的提升主要由于年长的居民对于退休收入和退休花销有更加充分的认知，且在其他方面的责任程度开始降低。接下来我们将从几个方面详细分析收入责任的背后因素。

(1) 收入依赖程度

下图描述了中国受访居民实现目标退休收入过程中对于外力的自我依靠程度。仅有 2% 的居民表示，退休收入的实现主要依赖子女、配偶或其他家人，而基本不依靠自己；表示“基本依靠自己”和“完全依靠自己”的受访者占比很高，这表明**中国居民在退休收入筹备方面具有较强的自立意识和责任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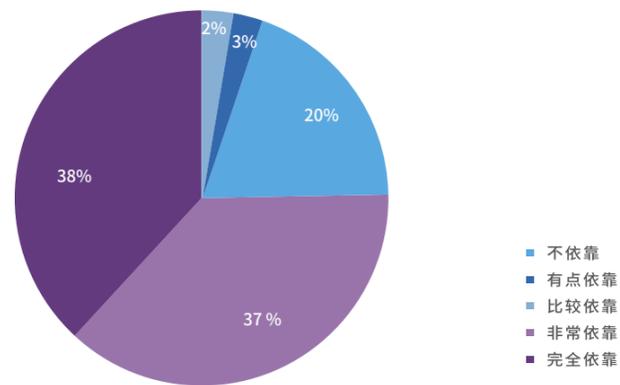


图 6.6 受访者达到目标退休收入的依赖情况

有时，居民退休时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理想的退休生活，不足的部分可能需要依靠自身或外部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需要接受财务支持，少部分从亲人处接受。面对退休收入不足以支持理想退休生活的情况时，34%的受访者表示将会自主解决不足问题，仅10%的受试者表示会主要依赖家人的帮助。由此看出，中国居民的责任意识较强，但是具体落实情况不理想，退休收入准备指数仍较低，收入责任意识和收入责任的实现之间，仍需要财务知识素养和财务规划能力搭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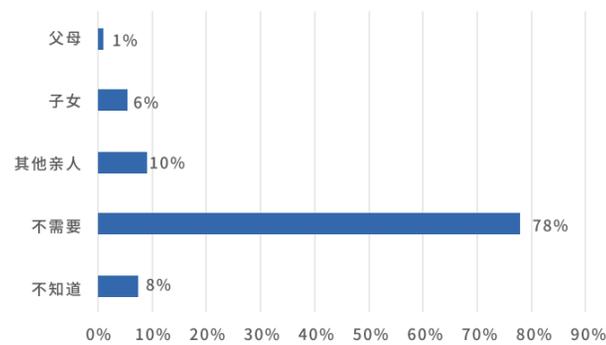


图 6.7 受访者退休期间财务支持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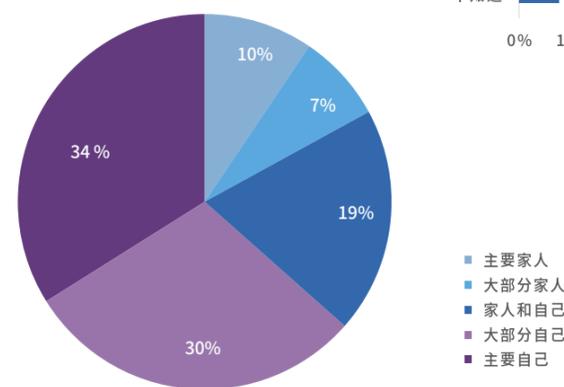


图 6.8 受访者退休收入不足时依赖情况

(2) 财务支持程度

中国居民为配偶外家人提供的财务支持有所缩减。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大多数不向配偶外的家人提供财务支持，在受访者中占比56%，而2020年仅有46%。**这部分财务支持主要缩减在面向子女的部分。**2020年，共有3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为成年、未成年的子女提供财务支持，而这一比例在2021年下降至22%。中国居民整体为子女提供的财务支持正在降低，为家庭成员承担的财务责任变小，退休居民的财务支配可能更加自由，更有能力承担自身的财务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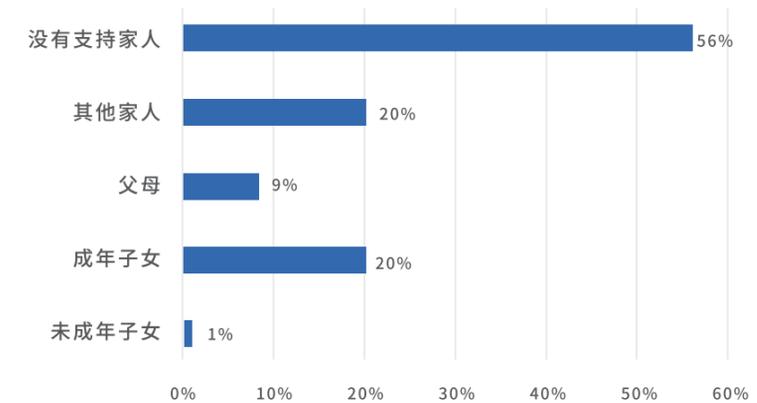


图 6.9 受访者为家人提供财务支持的情况

中国居民对重大意外事件财务准备程度一般。所有受试者中，仅17%有充足的财务准备来支持重大意外事件的发生，68%的受试者有一定程度的准备，11%的受试者毫无准备。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只有较少的居民能够完全承担财务方面的责任，大多数居民仍需要来自其他亲属或是外界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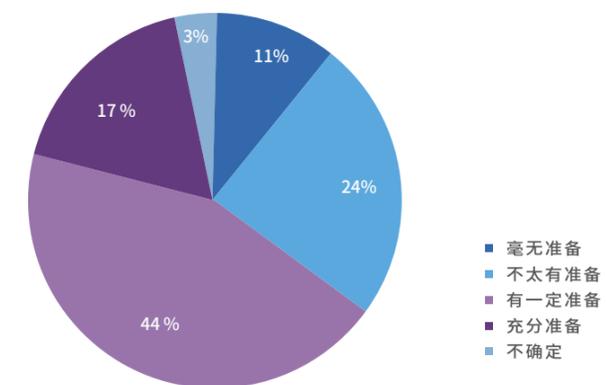


图 6.10 受访者对重大意外事件的财务准备情况

(3) 财务规划目标

财务规划目标指居民对于退休后收入来源、收入水平以及收入用途的提前规划，体现了退休前居民对于退休后收入的负责程度。对退休收入越负责的居民，其退休前越有可能对其退休后收入进行更缜密的规划和思考。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显示，我国居民财务规划水平一般，主要体现在对收入规划的思考频率和财务目标明确性。

居民对退休财务规划的思考频率一般，目标明确性一般。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2% 的受访者每日对退休收入问题进行思考，占比明显较低；多数受访者选择每季度或每年考虑一次有关退休收入的问题，22% 的受访者从未思考过。此外，在退休收入目标方面，12% 的受访者尚完全不明确自己应该积累多少退休收入来支持退休后的生活，多数受访者对目标收入有一定的概念，仅有 22% 的受访者表示对于收入的目标非常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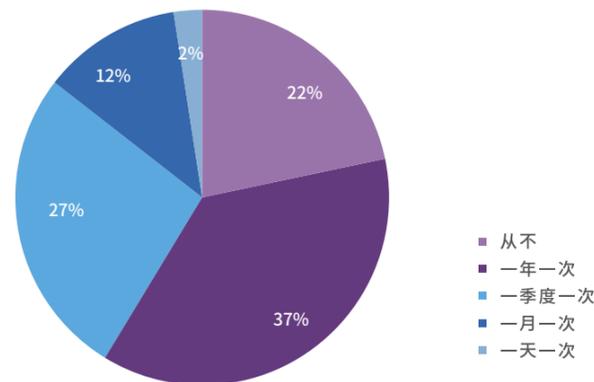


图 6.11 受访者退休收入问题思考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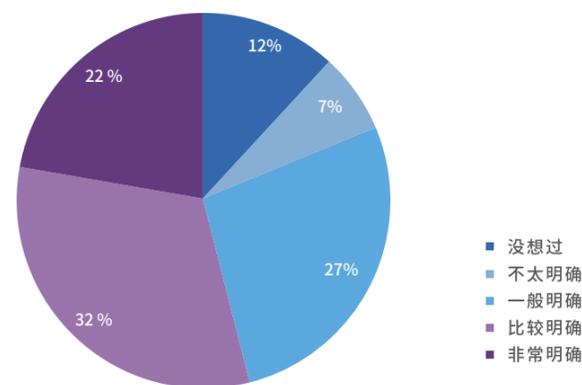


图 6.12 受访者退休收入积累目标明确度

供养家人、支付生活基本费用和享受生活仍是居民认可度最高的退休财务规划，分别有 40%、39% 和 40% 的受访者将其纳入财务规划目标之内，与上年度基本持平。此外，在新冠疫情爆发和蔓延的一年中，**医疗保健和退休储蓄明显获得了更多受访者的重视**，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疫情影响的结果。我国居民在大范围流行病爆发的局势下开始关注健康方面的花销，在疫情带来的工作不稳定的情况下更加关注退休储蓄的充分度，分别有 38% 和 35% 的受访者将其纳入财务规划目标范围内，超过上年度的 34% 和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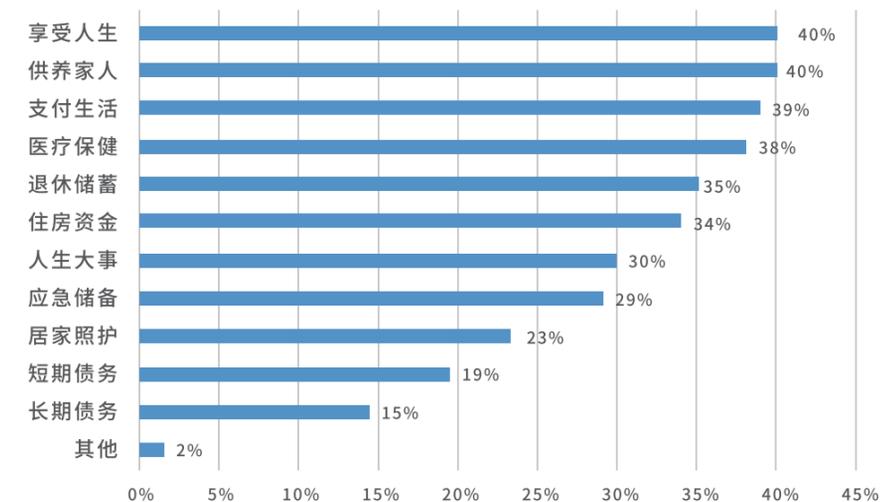


图 6.13 受访者退休财务规划目标

我国居民最重要的财务规划目标是享受生活。 18% 的受访者选择“享受生活”作为其最重要的财务规划目标，13% 的受访者认为退休储蓄是最重要的目标，而各有 12% 的受访者选择了支付住房和基础生活。“享受生活”成为中国受访者最重视的部分，但此选择占比相较于上年的 20% 有所下降，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居民对于退休后生活质量的重视程度仍然较强，另一方面体现出居民开始更加注重其他方面的花销，如重视程度增长的退休储蓄、对于突发大事件的应急储备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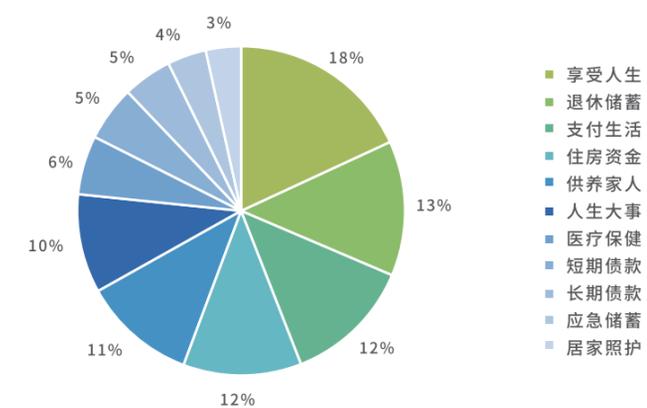


图 6.14 受访者退休财务规划最重要的目标

6.3 中国居民对延迟退休的态度

中国政府正在计划适时推出延迟退休政策。202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虽然延迟退休政策尚未正式公布,但社会舆论已经关注很久,广大群众逐渐加深了解并趋近认同。

通过本项目近年的调研数据显示,受访者支持延迟退休的比例从 2016 年的 63% 逐渐增长到 2021 年的 80%,认为退休年龄应保持不变的人数比例从 2016 年的 35% 逐渐下降到 2021 年的 16%,如图 6.15。同时,支持延迟退休的受访者对具体方案的制定具有不同的态度和建议,约 23% 的受访者认为退休年龄应当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而延长,约 31% 的受访者认为延迟退休可以对危险行业工作者、体力劳动者之外的人员实行,约 26% 的受访者认为退休年龄可以延长,但应具有一定的上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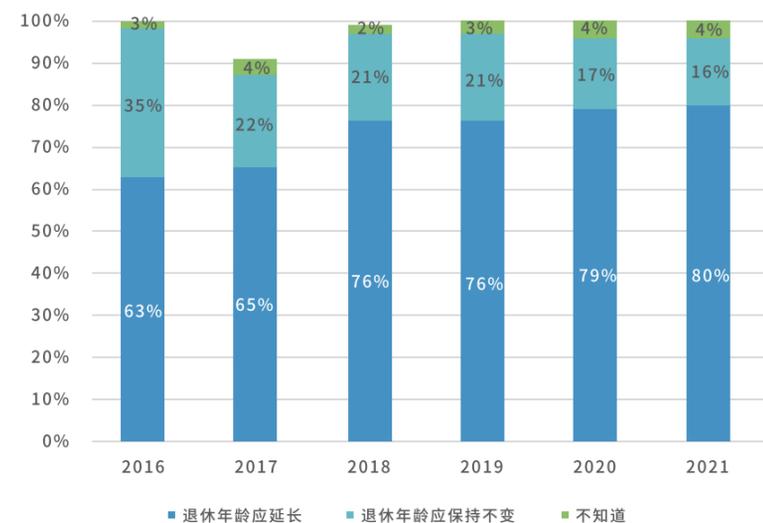


图 6.15 受访者对于延迟退休的态度

另一方面,当我们询问未退休受访者预期的退休年龄时,得到的结果却与其表明的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有较大的差异。我国目前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要求是,男性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当受访者预期的退休年龄晚于法定年龄时,我们认为受访者具有真实的延迟退休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尽管 80% 的受访者对延迟退休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支持,但实际具有真实延迟退休意愿的受访者仅有 34.9%。由此可见,居民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与其真实的退休意愿存在较大的差异。未退休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57.4 岁,其中男性受访者的平均预期年龄是 58.6 岁,女性受访者的平均预期年龄为 56.2 岁,均与法定要求的退休年龄十分接近,说明中国居民预期退休年龄较强度地受到政策规定的影响,且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延迟退休的倾向。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特征的受访者对于延迟退休态度的差异,对于目前尚未退休的 1800 名受访者,我们分别按照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位级别和个人收入等方面对他们对于延迟退休的政策意愿与真实意愿进行分析。

在性别方面,如图 6.16、6.17 所示,受访者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在不同性别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但明显更多的女性受访者预期自己会延迟退休。这可能与过往女性法定退休年龄过早、当代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有关,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投身于工作中,在社会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她们也期望自己能够工作更长时间,更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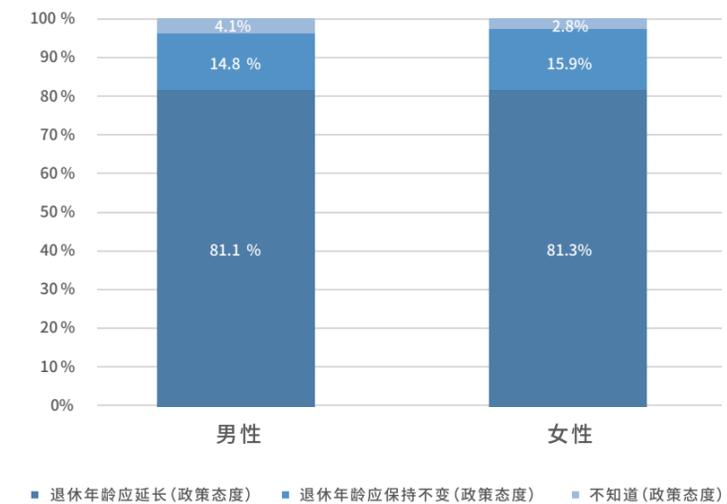


图 6.16 不同性别受访者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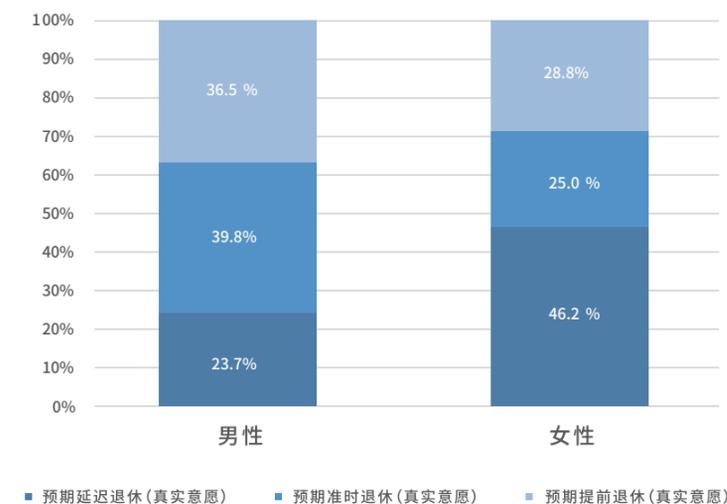


图 6.17 不同性别受访者的真实退休意愿

在年龄方面，如图 6.18 所示，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差别不大，35-44 岁的中年群体对延迟退休政策相对最为支持，而 55 岁以上的受访群体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率相对最低，由此可见，**即将退休的群体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可能更加消极**，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更加期待即将来临的退休生活，不愿意在此时迎来延迟退休的政策。而从受访者对自身退休时间真实的想法来看，55 岁以上的受访者反而普遍预期自己会面临延迟退休，因为国家目前已经多次强调将适时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因此处在即将退休阶段的受访者能够理性预期自己的退休年龄，尽管他们对这一政策的支持率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如图 6.19 所示，在 45 岁以下的各年龄群体中，受访者均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提前退休想法，预期自己会提前退休的人数超过预期自己会延迟退休的人数，**说明对于中青年群体而言，在预期到老龄化来临的时代背景下，尽管对延迟退休政策有着包容和接受的态度，但其内心对提前退休还是具有强烈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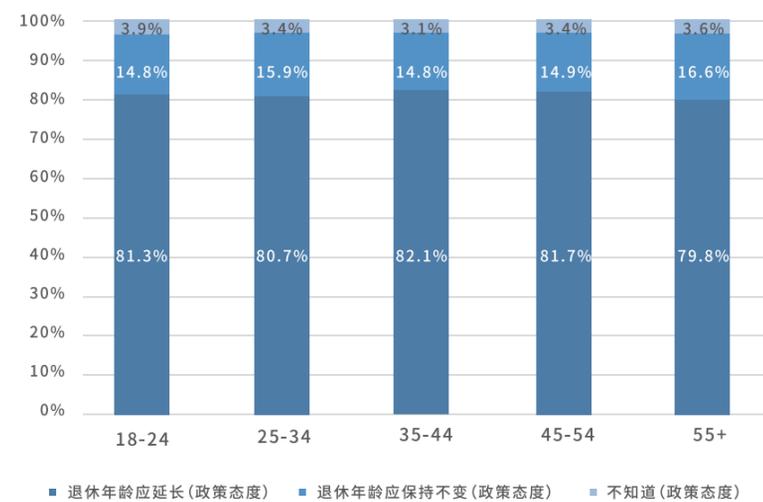


图 6.18 不同年龄受访者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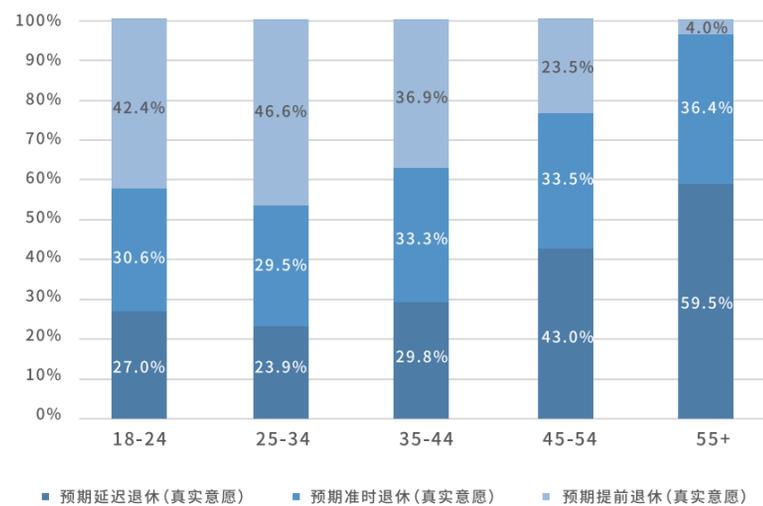


图 6.19 不同年龄受访者的真实退休意愿

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受访者支持延迟退休的比例明显高于单身受访者，也具有相对更加强烈的延迟退休愿望。**这说明处在相对稳定家庭环境和亲密关系中的人对延迟退休的接受程度更高。在教育背景方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与本科学历以下的受访者差别不大，但他们更多的预期自己会提前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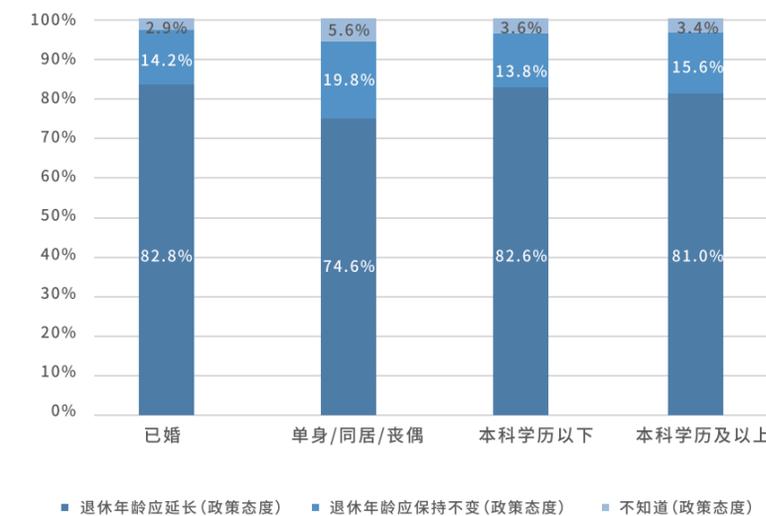


图 6.20 不同婚姻状况与教育背景受访者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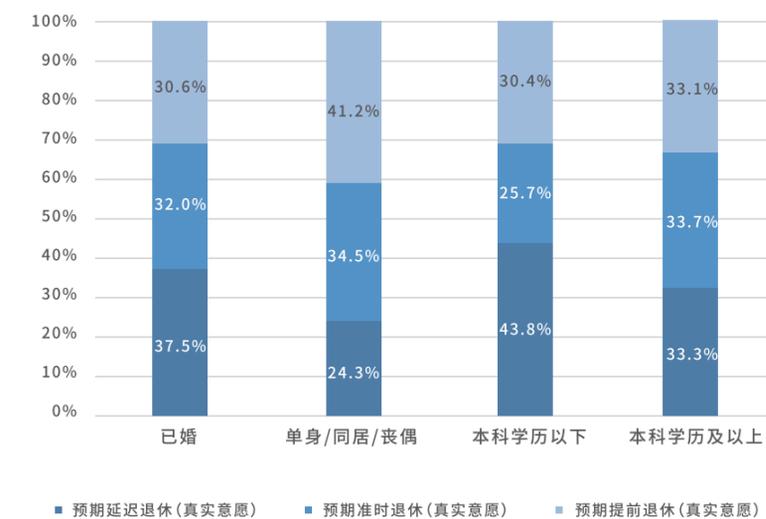


图 6.21 不同婚姻状况与教育背景受访者的真实退休意愿

在职位级别方面，如图 6.22、6.23 所示，**不同职位级别的受访者对延迟退休的态度不同，且并未观察到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与其职位水平的高低存在必然的联系。**具体而言，

职别相对较高的中层管理人员与基层管理人员对延迟退休的支持程度最高，可能的原因是这一群体更多从事管理、技术指导等工作，在延迟退休的几年内工作量并不会有明显提升，工作年限的延长反而为他们带去更高的收入用于退休准备，因此这一群体对延迟退休最为支持。半熟练或不熟练体力劳动者、服务业人员支持延迟退休的比例最低，这一群体的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相对较低，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和生活压力；常年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得他们的健康状况持续下降，预期寿命也相对较短，随着年岁增长还将面临被行业淘汰的压力，因此他们更希望能够尽早进入退休生活。另一方面，从图 6.23 可以看出，体力劳动者预期自己会延迟退休的人数比例多于其它群体，因为蓝领工人早年间的收入相对较低，财富积累较少，因此客观上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来进行退休准备。相比之下，在管理人员中，尽管职别最高的高层管理人员对延迟退休的支持程度相对最低，但他们却相对更大比例地预期自己会延迟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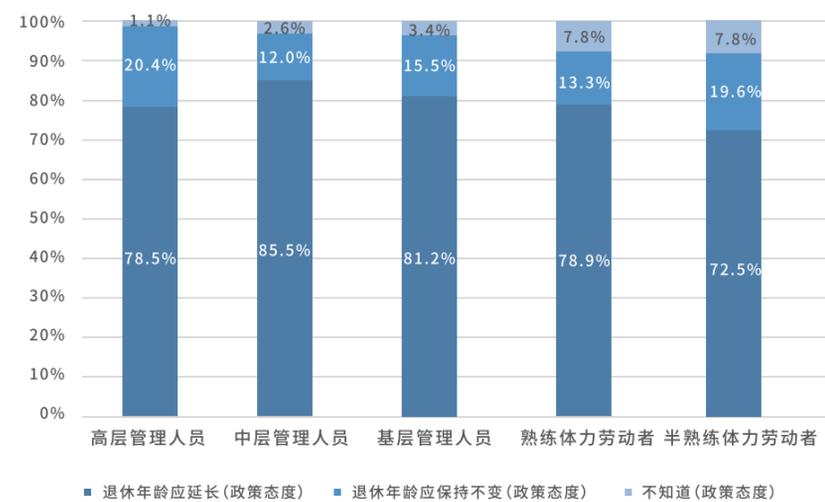


图 6.22 不同职业级别受访者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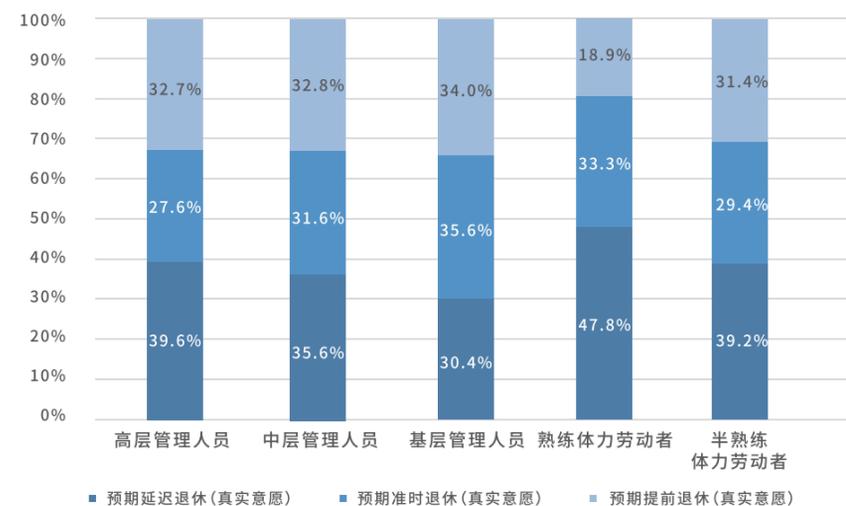


图 6.23 不同职业级别受访者的真实退休意愿

在个人收入水平方面，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与其个人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收入水平更高的人也更大概率地预期自己会延迟退休，结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依旧成立。**高收入群体对延迟退休具有较高的支持态度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继续工作能够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积累更多的财富；也可能源于这一群体本身对工作的热情，对事业的热爱为他们带来了较高的收入，也使得他们不愿意过早退休。

综合上述分析，近年来支持延长退休年龄的受访者比例明显提升，在基本养老金制度面临压力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适时推出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另一方面，受访者真实的退休意愿与其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可能有所不同，**单一的退休制度可能难以满足所有人的意愿，“一刀切”的改革可能受到较大社会阻力，因此延迟退休要有一定的弹性，**例如允许职工在一定年龄范围内自由选择是否退休。有关政策要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进行评估和调整，使其逐步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

6.4 对青年群体的特别分析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重点关注了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目前年龄低于 35 岁的青年群体，他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工作精力充沛、事业不断上升的黄金时期。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来临，未来退休的压力也逐渐呈现在他们面前。我们特别关注这一部分人群，希望了解他们在退休准备方面的想法和行动，以及存在怎样的需求。

6.4.1 青年群体的退休生活预期

在询问青年群体对自己退休后能过上舒适满意的生活具有多大信心时，仅有 48% 的青年人表示具有较大信心，约 16% 的青年人持有消极的态度，表示没有信心。将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与 35 岁及以上的中年、老年群体相比，**青年群体对未来享有舒适退休生活的信心有所不足，尤其是 18-24 岁的青年人对退休生活的预期最为悲观。**在对退休生活的愿景和联想方面，“更长时间地陪伴家人朋友”、“旅游”、“培养新的爱好”是青年群体在退休后最想拥有和完成的事情。与 35 岁及以上的群体相比，青年群体还在“学习”、“开展新的事业”、“继续工作”等方面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愿望。但另一方面，“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孤独和无人陪伴”、“不能保持精力充沛”也是青年群体最为担忧的问题，对这些因素担忧的程度超过了 35 岁以上的中年、老年群体，其中 18-24 岁的青年人还对“没钱”、“失去独立能力”、“缺乏社交”等因素感到极其担忧。由此可见，**尽管青年群体对退休生活有着相对美好、积极的愿景描绘，但也受到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对未来感到担忧，从而对退休生活信心有所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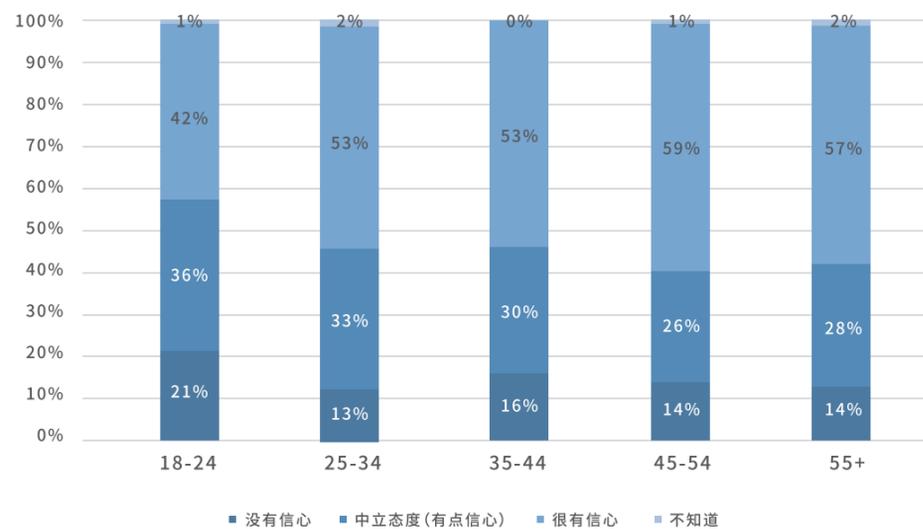


图 6.24 不同年龄受访者对于退休生活的信心

青年群体对退休生活的信心不足，首先是由于**当代青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标准提高，满足更高标准物质生活的经济压力增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逐渐缩小、改革进入调整和深化期，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也为保障民生就业、居民收入提升带来了巨大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 80、90 后进入社会，成为推动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在经济机构转型和调整期，他们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和压力。以购房为例，过去 10 年间，房价大幅上涨，一线城市房价相比与十年前上涨了约 300% 至 400%，近五年上涨约 100%，平均价格超过了 5 万元 / 平米。相比之下，近五年来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工资水平增长却较为平缓。根据麦可思公司《2020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提供的 2015-2019 届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数据显示，2019 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 5440 元，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五年来本科生起薪涨幅为 23.6%；而高职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 4295 元，五年来起薪涨幅为 15.7%。其中稳居高校薪酬榜首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毕业五年后平均月薪数值也稳定在 10000 元至 15000 元之间，即使考虑其薪资逐年稳定增长，其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买房的压力也十分巨大。由此可见，青年一代的收入水平与房价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尽管他们对退休生活有着相对美好的愿景，但在预期自身未来的大部分收入将用来偿还住房贷款时，便对退休后可能出现的“疲惫”、“贫穷”状况更为担忧。

其次，**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导致青年人对社会保障体系信心不足**。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养老金存在潜在缺口，未来社会养老压力将逐渐转移到这一代青年人身上，致使他们将承担更大的社会抚养压力和经济压力。这一代青年人大多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家庭生育数量的时期，作为独生子女，在未来要承担独自赡养老人的义务。同时，面临着逐步提升的生活成本和子女教育成本，这一代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低下，近年来我国的新生儿出生率不断下降。倘若人口结构问题不能在近年内得到改善，青年人可以理性地预期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

将面临更加严重的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尽管国家近年来先后提出了坚持“全面二孩”、“三孩”、“房住不炒”、义务教育“双减”等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要缓解青年群体在未来长期面临的经济压力、鼓励生育，提升青年群体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国家和社会还需要共同做出更多的努力。

其次，**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导致青年人对社会保障体系信心不足**。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养老金存在潜在缺口，未来社会养老压力将逐渐转移到这一代青年人身上，致使他们将承担更大的社会抚养压力和经济压力。这一代青年人大多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家庭生育数量的时期，作为独生子女，在未来要承担独自赡养老人的义务。同时，面临着逐步提升的生活成本和子女教育成本，这一代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低下，近年来我国的新生儿出生率不断下降。倘若人口结构问题不能在近年内得到改善，青年人可以理性地预期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将面临更加严重的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尽管国家近年来先后提出了坚持“全面二孩”、“三孩”、“房住不炒”、义务教育“双减”等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要缓解青年群体在未来长期面临的经济压力、鼓励生育，提升青年群体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国家和社会还需要共同做出更多的努力。

此外，由于青年人距离退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导致青年人更加保守地预期自己的退休生活**。

6.4.2 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和退休准备情况

在关于金融素养的“三大问题”上，**35 岁以下的青年群体整体表现有待提高，仅有 17% 的青年人答对了全部三个问题，低于全体受访者的平均水平**。具体而言，青年群体在关于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问题上的正确率较低，可能原因是缺少长期投资的经验，有限的年龄导致青年人疏于对宏观经济态势的关注，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识。相比之下，35-55 岁的中年群体在风险分散问题上正确率最高，说明中年人对于股票市场和风险投资最为关注；而 55 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正确率最高，反映出这部分群体对宏观经济的重视程度最高，因为年龄和阅历的优势而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由此可见，对于青年群体而言，还需要在提高金融素养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询问受访者进行退休规划时对财务问题的理解能力时，相比于中年、老年群体，有更大比例的青年群体反映出对理解财务问题的困难和不自信。由于这一代青年群体面临着更大的社会老龄化问题和经济压力，他们应当承担更大的个人养老责任，也更应当提升金融素养，学会利用金融工具来进行退休准备。社会应当面向公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开展更多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企业也应当承担更多的雇主责任，帮助和指导年轻员工进行财务规划。此外，青年群体由于进入社会的时间较短、储蓄存款较少，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许多青年人由于收入增长空间有限、渴望追求财富，便希望通过股票市场或者风险投资的方式而快速致富，但往往风险防范意识的缺失、对自身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会将自己带入更加困难的处境，我们的研究也显示中国居民总体上存在着对自身金融素养过度自信的心理现象。

在退休准备方面，我们发现**越接近退休年龄的受访者，退休准备指数越高，因此青年一代的退休准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 35 岁及以上的中年、老年群体相比，青年群体在退休准备方面的差距主要体现在“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准备充分度”两个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自己目前财富的积累以及未来收入的预期都会有更理性的认知；同时，随着时间跨度的缩小，不可预见的个人状况波动也会减少，因此青年群体对于财务规划完善度及退休准备成熟

度的信心可能会稍显薄弱。而对于年长群体，他们已经拥有一定的储蓄，对未来也有更成熟的判断，因此退休准备指数在各个维度上都提升。

现实中，国内大多年轻人也的确存在着职业规划不清晰、自身定位不准确的问题，而职业规划将直接影响养老和退休规划。我国的就业形势复杂，收入增长缓慢，高薪岗位更是稀缺。青年人尤其是 90 后步入社会的时间较短，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与严峻就业形势，容易产生浮躁焦虑的情绪、盲目追求高薪、被社会舆论所绑架，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年轻人频繁跳槽、更换工作，热衷于网红、主播等流量性质的工作，追求挣快钱、挣热钱等等。因此难以形成对自身财富和未来收入水平的理性预期，更难以去制定、完善养老退休计划。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理解这一代青年人承担的责任与压力，承认他们本身面对着收入水平有限、生活成本较高的客观现实。即便是拥有充分的风险防范和退休准备意识，**缺乏收入、难以形成储蓄也成为阻碍青年群体完成退休准备计划的重要原因。**

6.4.3 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青年群体产生的影响

随着居民预期寿命的延长与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面临的劳动力资源约束与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2021 年 5 月，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发布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 2015 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转变为将实施三孩政策。2021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宣告了我国三孩时代正式来临。

三孩政策的出台背景是我国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跌，尽管全面二孩政策对提升二孩比例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对缓解生育率下降的效果仍十分有限，尤其是难以提高年轻一代中的一孩生育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生育观念问题。因此，**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对象，三孩政策将对青年群体的婚姻家庭决策以及更长远的人生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从短期来看，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的推行有助于降低青年群体的生活经济成本，缓解年轻人对“疲惫”、“贫穷”的焦虑情绪，从而提升了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与生育意愿，也增强了他们对未来退休生活的信心。三孩政策的出台目的方面是鼓励目前有能力、有意愿的二孩家庭继续生育三孩，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向社会释放经济调整的信号以及中央计划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心，尤其是切实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成本与生活经济压力，从而提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为此，在今年 7 月中央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将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尤其是要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明确指出的措施包括：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以住房为例，2021 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多地对房地产市场加严宏观调控，通过限贷、限购等方式打压住房价格的非理性上涨，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避免房价持续上涨为年轻人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10 月 2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在国内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试点，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房产税的征收将有助于降低社会生育成本，缩小贫富差距，对青年群体而言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政策，除此之外，今年中央也颁布了多项政策积极开展教育行业改革，对长期课外培训、民办校办学带来的高昂教育成本进行了打击、限制，目的在于控制子女抚养成本，促进社会公平。因此，从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出，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真正降低长期以来年轻人所负担的过高经济成本，从而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其次，从长期来看，三孩政策有助于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从而优化人口结构、缓解社会

老龄化程度，使得这一代青年群体在未来能够享受到更加充分的退休保障。对国家政府而言，三孩政策促进人口结构的优化可以降低未来社会基本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对企业而言，三孩政策有助于降低未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激励。对于居民个体而言，由于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帮助年轻人降低了生活成本与生育成本，青年群体因此拥有更充足的资金用于进行退休准备。尤其是对于女性群体，三孩政策后她们的就业、工作权利能够更加充分的保障，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助于她们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进行更充分的退休准备。此外，三孩政策鼓励青年群体生育，尽管“养儿防老”不再是当代中国社会主流的家庭观念，但子女所带来的家庭责任感将有助于提升青年父母的退休责任意识，帮助他们更好地履行个人退休准备责任；而子女在未来也不仅是为父母提供养老财务支持，更重要的是为父母提供精神方面的陪伴，从而缓解居民对退休后“孤独和无人陪伴”的担忧。

6.4.4 针对青年群体的建议

基于以上对青年群体退休生活愿景与退休准备现状的分析，我们对青年人完善退休准备与养老规划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青年人应当尽早明确职业规划与发展路线，结合时代背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找准自身的定位，对个人的未来与退休生活产生理性的预期。青年一代面临着飞速的时代变革与激烈的社会竞争，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容易陷入浮躁焦虑的情绪，对生活失去信心。明确职业规划与自身定位可以帮助青年人平衡、缓和自己的心态，以更加积极、稳定的情绪去面对生活上的挑战。相比于总是不满足于自身现状、频繁地更换工作，选择一个职业方向、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地工作可能更有助于青年人实现财富的积累和人生的价值。

其次，青年人应当不断地提升自身金融素养以及对财务规划的认识，尽早为自身养老与退休计划做好准备。面对着较大的收入与经济压力，青年人更应具备个人财务责任意识，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切忌浮躁与冲动的情绪、陷入社会消费主义浪潮。良好的储蓄计划不仅帮助青年人完成自身的退休准备，也形成一笔不小的资金池以期应对可能发生的损失风险。风险防范意识的缺失、对自身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常常使青年人遭受巨大的投资损失，更高的金融素养帮助青年人选择正确的投资和理财产品，提升风险管理的意识。在退休准备方面，青年人也应注意采取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以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适当购买一些商业养老与健康保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青年人应当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为国家改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升社会保障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人口老龄化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尤其是给居民养老和社会保障事业带来了巨大挑战，青年人也因此产生了责任压力以及对未来退休生活信心的不足。事实上，近四十年以来国家的经济、物质生活高速发展，老龄化社会是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进程，青年人应当对此产生正确的认识。改善人口结构、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仅是国家政府的任务规划，更是这一代青年人的责任担当。青年人可以积极响应国家的生育政策，也可以自身投入到养老产业的创新发展与健康经济的建设事业当中。相信通过这一代青年人的不懈努力，养老与退休问题在未来必将得到改善。

6.5 新冠疫情对中国居民退休准备带来的影响

2020 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造成了全方位巨大冲击，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各国的封锁措施一度使经济大面积停摆，失业率飙升。具体来看，上半年，疫情相继在东亚、欧美、拉美、非洲等地区蔓延，各经济体采取的防控措施阻断了人员、资本、货物、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流动，社会恐慌情绪严重，经济运行面临供需萎缩与金融动荡的双重冲击。下半年，伴随着部分经济体疫情形势好转、推动复工复产，加上史无前例的纾困政策发挥作用，全球经济触底回升。**2020 年的全球经济形势可以用“大起大落”四个字来概括。**全年 GDP 增速为 -4.9%，同比下降 7.4 个百分点。

从国际上看，本次疫情及复苏的不平衡将对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但整体表现仍好于多数发达国家；欧洲疫情暴发早于美国，各国政府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社会隔离措施也普遍严于美国，欧洲同样出台了规模超过金融危机时期的宽松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但受限于欧盟和欧元区的成员集体决策机制，政策力度不及美国，这些因素导致欧洲经济在疫情中的收缩幅度超出美国，复苏之路崎岖漫长；同样，东盟经济也遭疫情重击，但复苏势头强于欧美；除中国外，其他金砖国家 2020 年经济均大幅萎缩，恢复元气任重道远。

从我国来看，2020 年从第三季度开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已逐步恢复正常，消费者、企业家对经济的信心均明显好转，2020 年中国成为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是，受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大国政治经济博弈、国内经济改革走入深水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内外部不确定性。直观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以及中国经济内外部不确定性，将会反映在居民对退休收入的信心与退休储蓄上，从而影响居民退休准备情况。本次调研在问卷中加入了相关调查，希望了解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退休准备和退休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6.5.1 新冠疫情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疫情对居民生活产生明显影响。首先，疫情期间政府采取了封城、停工、隔离等措施，基本停止了必需品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经济陷于停滞。其次，新冠疫情带来的短期收入减少与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居民对于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可能下降，从而被迫降低生活质量。第三，疫情还影响了全球投资者预期，国际金融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发，3 月份美股大幅下跌四次触发熔断机制，4 月 20 日国际原油期货结算价历史上首次跌至负值，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低迷叠加共振，居民的投资标的、资产配置也会做出调整。第四，受外部输入性风险的持续冲击，国际贸易受阻的状况难以改善，外需的下降也会对居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在问卷中，我们调查了受访者对新冠疫情的感受，选项包括正面的形容词如“机会”、“个人成长”和负面的形容词如“焦虑”、“孤独”等。图 6.25 展示了受访者对新冠疫情的感受。总体而言，**受访者对新冠疫情的感受以负面为主，其中感受到最多的负面情绪是“焦虑”与“没完没了”，感受到最多的正面情绪是“个人成长”。**从性别差异上看，女性感受到的负面情绪要少于男性，她们感受到主要的负面情绪是“焦虑”，而男性最主要的负面情绪来自于疫情的“没完没了”，这与男性通常扮演家庭支柱的角色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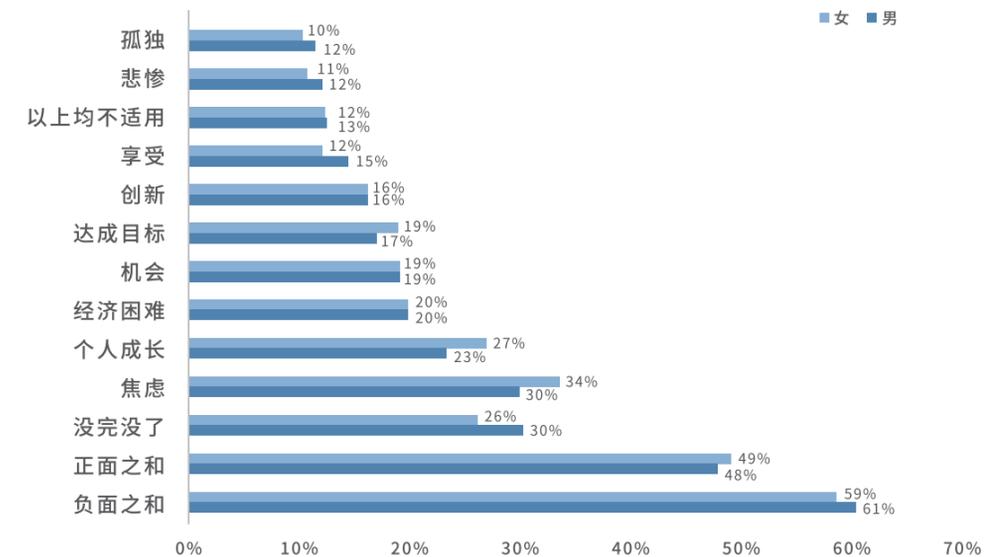


图 6.25 不同性别受访者对新冠疫情的感受

我们同时调查了其他国家受访者对新冠疫情的感受，并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中国的结果及全球平均结果呈现在图 6.26 中。我们发现，全球普遍对新冠疫情持负面态度，其中“焦虑”在各个国家都是受访者的最大感受。从国际比较上看，**中国受访者感受到的负面情绪明显小于全球平均，感受到的“焦虑”情绪也比美国受访者少得多，这说明了我国防疫的成功与人民对未来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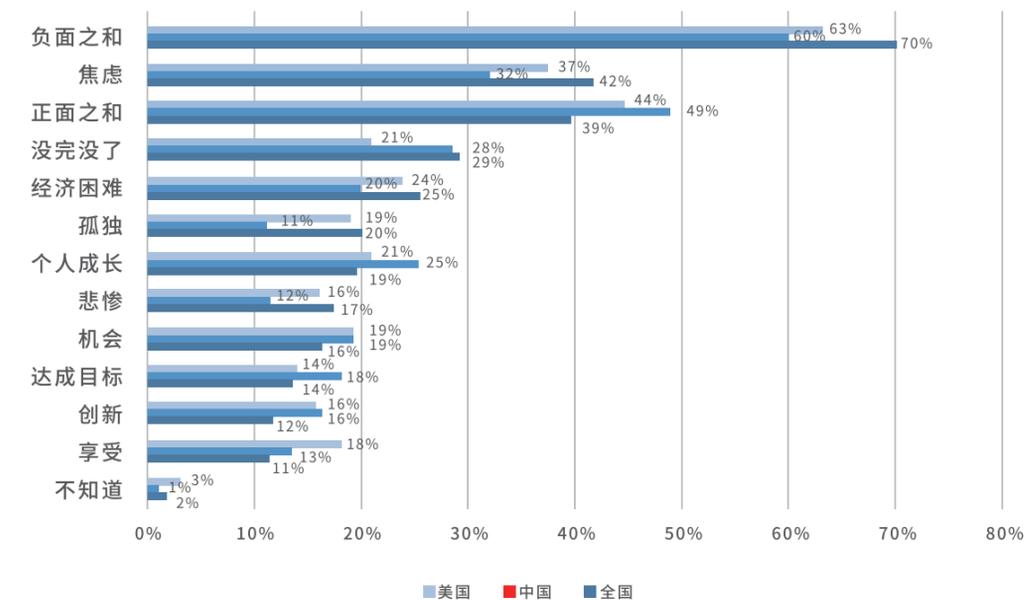


图 6.26 不同国家受访者对新冠疫情的感受

我们进一步调查了新冠疫情对受访者生活方式的影响，方法是向其询问，“您在多大程度上赞同下列陈述：‘由于疫情，我生活中的主要方面（例如工作方式、社交生活）将永远发生改变’”。图 6.27 显示的是不同年龄受访者的回答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将永远发生改变，其中 **35-44 岁受访者的最为认同自己的生活将永远发生改变**，这一年龄段的人大多正处于事业高峰期，同时肩负着教育子女、赡养父母的压力，相对年轻群体对未来也有着更加成熟的判断，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同时我们也观测到，随着年龄增加，人们更加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生活不会发生改变，这是由于老年人的工作、社交等相对固化，抗风险能力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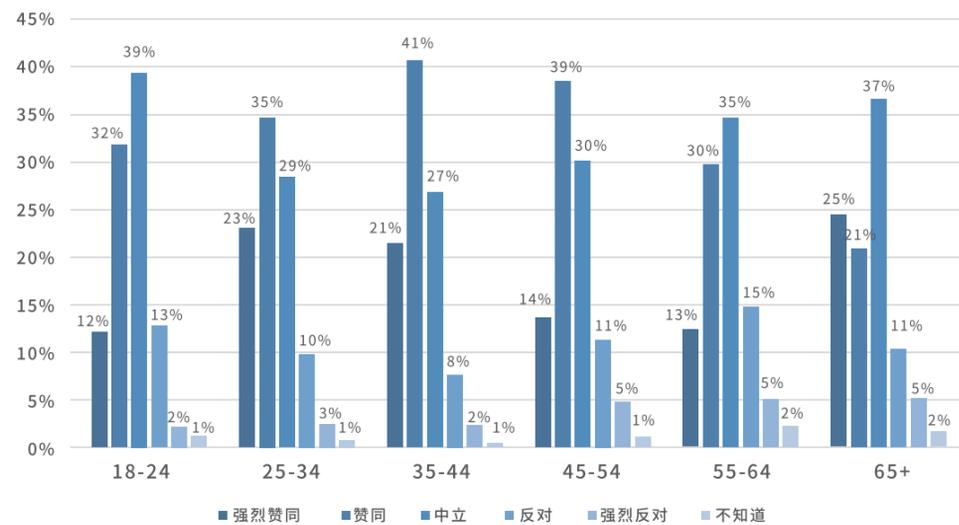


图 6.27 受访者对“生活中的主要方面将永远发生改变”这一表述的赞同程度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新冠疫情对受访者当前年收入的影响，新冠疫情会在短期内降低大部分受访者年收入，从而减少受访者的退休储蓄。图表显示，对于个人收入变化，大部分受访者（56%）表示保持不变，28% 受访者收入减少了，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短期明显冲击导致的；在收入波动性方面，有 40% 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收入波动性更大了；对于年收入变化幅度，大部分（78%）的受访者年收入变化幅度在 20% 以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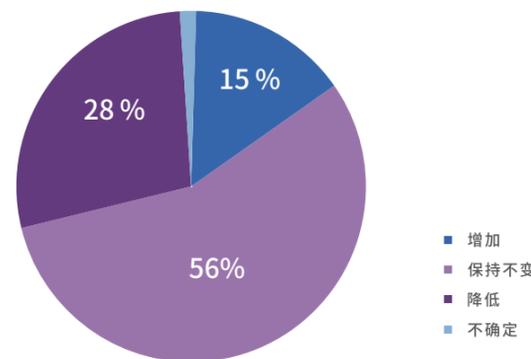


图 6.28 受访者个人收入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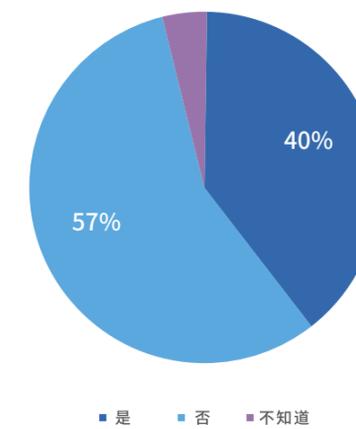


图 6.29 受访者个人收入是否更加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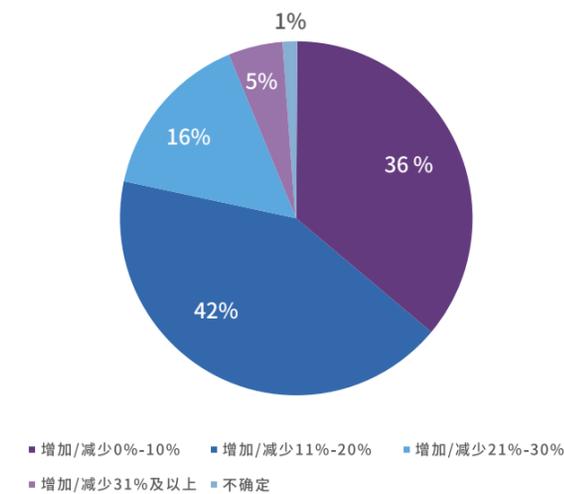


图 6.30 受访者个人收入变动幅度

6.5.2 新冠疫情对退休生活预期的影响

为了了解新冠疫情对人们退休生活预期的影响，我们向受访者询问：“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您对自己过上舒适退休生活的信心有何变化？”图 6.31 显示了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对该问题的回答情况。我们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未来退休生活的信心并没有降低**，这或许是为此次调查发生时，2020 年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步消除，从 2020 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就已逐步恢复正常，消费者、企业对经济的信心明显好转，2020 年中国成为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高收入受访者有一部分人（30%）出现了对未来信心的增加，这或许是来源于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进一步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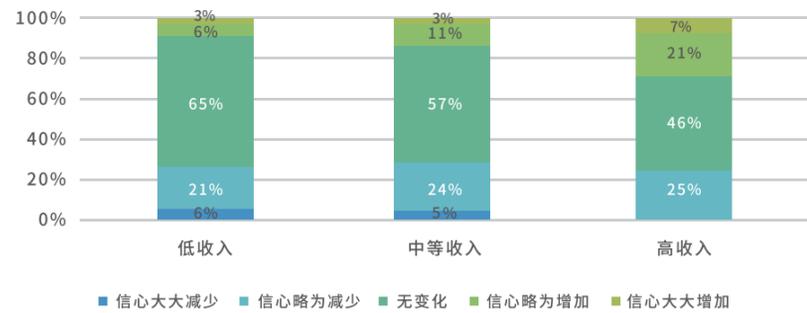


图 6.31 不同收入受访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

6.5.3 新冠疫情对退休储蓄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退休储蓄的影响有两方面：由于疫情导致的工作时间减少、失业增加，居民收入急剧下降，全球贫困状况恶化。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显示，2020 年前三季度，全球劳动力收入同比下降 10.7%（相当于全球 GDP 的 5.5%），储蓄是收入与消费的差额，收入的减少会降低居民的储蓄，同时新冠疫情带来的大额支出可能会使得居民挪用自己的退休储蓄，减少退休储蓄总额；另一方面，即使经济已经重启，出于对未来下行风险的担忧，居民会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增加了新冠疫情对储蓄的影响与居民对退休储蓄的预期。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调查新冠疫情对居民退休储蓄预期的影响。图 6.32 显示了“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您或您的家庭成员造成的经济压力，您做了以下哪些事情”这一问题的结果，可以观察到，在新冠疫情的压力下，大部分受访者选择减少日常开支、动用储蓄账户以度过危机，这印证了我们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猜测。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而言，中国居民更多地减少日常开支、动用储蓄账户，这是因为中国储蓄率相对更高，储蓄账户准备充足，并且对降低日常开销接受度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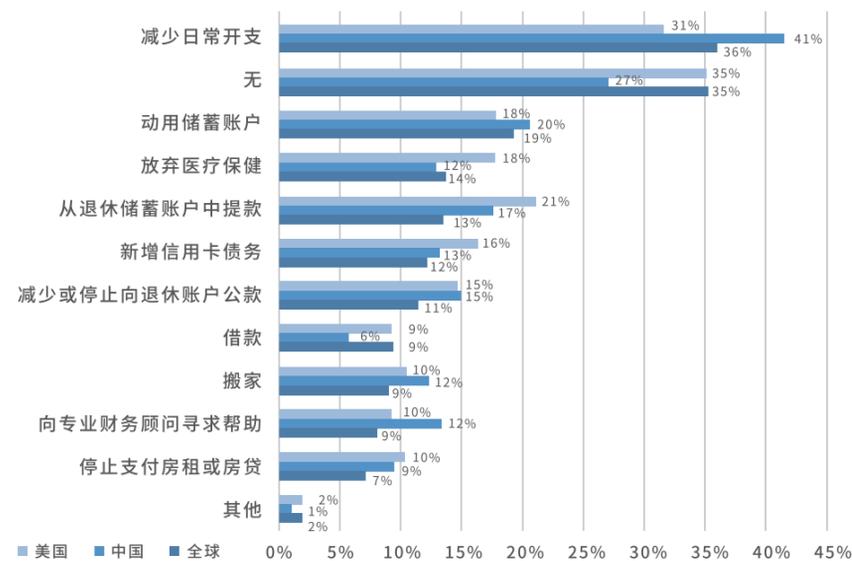


图 6.32 受访者鉴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压力所做的行为

我们调查了受访者对退休储蓄何时能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的预期。我们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退休储蓄能在一年内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其中认为六个月的比列最高，也有小部分受访者持悲观预期，认为恢复的时间在两年以上甚至永远不会恢复。国际比较上看，中国的预期时间要短于全球平均，表明中国居民对退休储蓄的未来具有较强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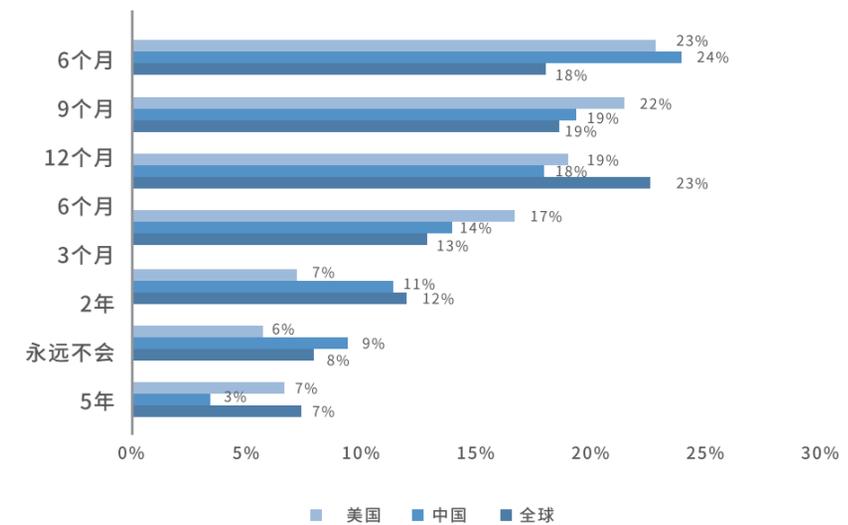


图 6.33 受访者对退休储蓄恢复的预期

6.5.4 后疫情时代对退休准备的相关建议

首先，从国家层面，应当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稳定居民信心，优化医疗体制及退休保障制度，在疫情导致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政府更应引导居民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困难，合理规划消费和投资，避免退休居民过度乐观或悲观；疫情之下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要警惕债务风险外溢蔓延至养老金的第一支柱；

其次，在企业层面，应当为员工提供专业的退休准备指导、支持和建议，在疫情之时为员工提供适当的福利与救济；

最后，在居民层面，应当积极提高金融素养，制定合理的退休后备计划，重视个人与家庭的财务规划与风险管理。对年轻人而言，更应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不断提高对退休规划的认识，因疫情影响而及时调整心理预期，避免因对未来退休状态的预期过于乐观而导致准备不足的情况发生。



建议

07. 建议

7.1 政府可发挥的作用

在改善居民退休生活预期方面，政府应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面，引导居民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防止居民出现过度乐观或悲观的预期。应对养老金缺口问题，政府应当建立养老金优先保障机制，并积极采取调取国企利润等应对措施，提高居民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信心。对于延迟退休政策，单一的退休制度可能难以满足所有人的意愿，“一刀切”的改革可能受到较大的社会阻力，因此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出要有一定的弹性，更加审慎。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政府在推出“三孩政策”鼓励生育的同时，还应切实保障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真正降低青年人生育成本，保障妇女生育和就业的权利。

在鼓励个人作好退休准备方面，政府应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建设，特别是积极鼓励以个人承担主要责任的第三支柱的发展。具体来说，一是认真作好发展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比如税延型养老保险、养老目标基金等代表性金融产品的框架设计；二是密切关注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关养老金融产品的实施进展和市场状况，制定合理的监管政策并适时修正。同时，应完善各项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保障措施，积极解决老年人医疗保健、精神慰藉、子女关怀等问题。

在帮助个人进行退休规划方面，政府应加强对国民的金融教育，提升居民金融素养。研究表明，金融素养水平更高的个体不仅能利用科学、专业的手段进行投资理财，也具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去进行更充分的退休准备。因此，在老龄化时代，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提升国民金融素养、帮助居民履行个人养老责任十分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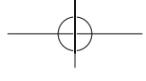
7.2 企业应做出的改善

在帮助员工做好退休准备方面，企业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计划为员工提供退休后的经济保障，还可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退休准备帮助，比如开展金融教育、提升员工退休责任意识等。企业可以利用其与商业金融、保险机构合作的优势，丰富企业退休计划多样性，加强与员工在经济上的联系，为员工提供专业、有针对性的理财建议和管理服务，满足员工个性化的养老保障需求。此外，企业也应当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状况，为员工提供环保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充分的医疗保健服务，多方面履行雇主责任。

对于老龄化背景下可能推出的延迟退休政策，企业应当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建立弹性化退休制度，鼓励员工适当延迟退休时间，让其在岗位中体会到被需要的价值感和工作的幸福感。对于中青年员工，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额外的专业技能培训，帮助其保持并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对于女性员工，企业更应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保障妇女生育和就业的权利，辅助国家生育政策的推行。

7.3 个人应做出的努力

在退休预期方面，个人应在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家庭条件、个人经济与健



健康状况等，更加理性地认识退休计划的完善程度、退休储蓄的充分程度和获得预期收入的信心，并且随着变化及时调整。尤其是对青年群体而言，距离退休还有较长的时间，人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更应尽早明确自身职业规划与发展路线，不断地丰富和提升自我技能，同时做好财务积累，抵御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

在退休准备方面，个人应理性地预期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避免形成过于乐观或者悲观的情绪；个人应当提高金融素养和退休准备的责任意识，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选择正确的投资理财产品，并备有后备计划以应对风险。居民应当重点关注政府退休政策的变化，做出积极调整；也可以抓住企业提供的机会，如财务建议、技能培训等，提升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在长寿时代下赋予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在退休规划方面，个人应不断提高对财务规划问题的认识理解能力，结合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确定个人建立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策略选择。在建立个人养老金的过程中，应注重选取资产的多元化配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最大化自己的福利，例如适当购买一些商业养老健康保险、积极关注养老目标基金等。

7.4 保险可作为的领域

老龄化时代背景下，商业保险机构在帮助居民作好退休财务准备方面具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吸纳风险、实现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同时，也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产品设计和提升服务方面，商业保险应当注重对近年来蓬勃发展、具有新功能的险种及其他金融产品的参与。2018 年以来，税延型养老保险在国内成功启动试点并逐渐推广，首批养老目标基金也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登陆市场，有着不俗的收益表现。保险公司应当抓住新

险种产品带来增量市场的历史机遇，重视对税延型养老保险、养老目标基金等产品的参与，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个性化的选择，辅助国家做好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的建设。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需要从单一的“资金保障”模式向“资金保障+服务提供”模式拓展。财务之外，居民在养老过程中最大的忧虑是健康风险和失能风险，对充足的医疗资源和细致的护理服务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因此，保险公司在设计养老保障产品时应当充分地将“资金保障”与“服务提供”两种功能相结合，建立并完善“保险+医养”多维驱动模式，保障居民在老年阶段面临的风险，满足居民的健康护理需求。

在获取客户和目标市场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应当重视不同层次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机会，采取不同方式拓展“下沉市场”和“高端市场”中的客户。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升级”主要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下沉市场”崛起，中小城市居民消费能力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大型城市居民在新兴消费品牌增多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之下，转向“精品化”“品牌化”的消费。保险公司可以传统的保险业务拓展到中小城市，让“下沉市场”居民拥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也可以在大城市树立更具有企业特色的、具有鲜明品牌标识的形象，开展高端的、面向高净值人群的养老业务，向“精品消费”时代转型。

在业务拓展和营销渠道方面，在传统代理人、金融机构渠道之外，商业保险公司应当重视线上业务的宣传，积极拓展财经网站、自媒体、短视频等新兴渠道，采用意见领袖营销、事件营销等方式丰富营销手段，让更多数的消费者对保险产生正确的认识。尽管传统的专业机构、专业的理财顾问，仍是年龄较大、收入水平较高且对退休保障服务需求较为迫切的居民群体的首选，但在互联网时代下，青年群体更加频繁地与网络接触，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财经媒体和短视频、公众号等自媒体正成为未来主力消费群体的新选项。通过互联网渠道向社会普及金融知识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退休责任意识，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金融产品，并认识到保险在退休准备和风险管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青年群体距离退休还有较长的时间，退休愿景相对保守，退休准备尚可提升，因此商业保险机构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影响和教育年轻消费者，使其在未来拥有更为成熟的风险管理意识。



08. 附录

8.1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方法

为了直观地描述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荷兰全球人寿定义了退休准备指数。将退休准备方面三个态度层面的问题以及三个行动层面的问题作为自变量，将居民为今后退休采取的储蓄方式作为指数因变量，计算退休准备指数。首先将每个问题的选项由准备不充分到充分进行打分，分值分别为 0、2.5、5、7.5、10，然后将自变量问题与因变量问题得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权重对每个问题的平均得分进行加权，最终得到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根据中国区 2000 份问卷，我们计算六个问题的相应权重如下表所示：

表 8.1 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权重

变量	退休责任意识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退休计划完善度	退休储蓄充分度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权重	8.0%	17.9%	15.3%	23.3%	24.7%	10.9%



退休准备指数 = 退休责任意识 × 8.0% +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 17.9% +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 15.3% + 退休计划完善度 × 23.3% + 退休储蓄充分度 × 24.7% +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 10.9%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退休准备指数只需对这六个问题的具体分数进行加权，而城市退休准备指数则需先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数求平均值，再进行加权。

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六个自变量问题依次平均得分为 7.50、7.54、7.06、6.05、5.99、5.23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江苏省退休准备指数等于：

$$7.50 \times 8.0\% + 7.54 \times 17.9\% + 7.06 \times 15.3\% + 6.05 \times 23.3\% + 5.99 \times 24.7\% + 5.23 \times 10.9\% = 6.49$$

退休准备指数结合了三个态度层面问题和三个行动层面问题的回答，适当调整加权后得到了一个衡量总体退休准备水平的指数，是对居民退休准备程度的合理估计。在所赋权重中，“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问题，更偏向于衡量居民退休准备的实际行动。